

# 低欲望社会

『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

HOW TO IGNITE THE LOW DESIRE SOCIETY

KENICHI OHMAE

[日]大前研一 著

姜建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

作者：【日】大前研一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9月

ISBN：9787532779529

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低欲望社会

## “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

[日]大前研一/著
姜建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版权申明

TEIYOKUBO SHAKAI

By Kenichi OHMAE

© 2016 Kenichi OHMA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U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图表提供：BBT综合研究所

日版编辑协助：中村嘉孝



新版前言

# “28万亿日元经济对策”反而搅动了不安

# 安倍经济学的悖论

安倍政权在参议院选举[1]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为此决定出台规模为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但我认为这绝非是精神正常者所为。虽然政府估算这个对策能提升1.3%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过，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经济对策最终会以“如意算盘打得响”而告终！

这是因为日本的失业率目前仅为3%（2016年7月为止），几乎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而之所以能达到充分就业，则是因为包括建筑业在内的饮食、零售、酒店、旅馆、护理、保育等多数业界，都曾遭遇严重的人手不足的困扰。而在这样的时刻，诡称是经济对策而乱撒钱，据我所知是历史上的首创。而且这种做法违反了所有的经济理论。自凯恩斯以来，所谓乱撒钱的经济对策，一般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得不增加雇佣的情况下才采用的。而日本经济无法增长的原因，则在于设备投资及个人消费没有得到改善。

设备投资难以增加的一个原因，则是今后少子化、高龄化趋势将越发加速，人口越发减少，从而导致日本失去将来性。因为并不存在有将来性而不愿投资的经营者。据我的判断，如若投资者现在投资，首选并不是日本，而是印度、越南、泰国、缅甸等海外国家。

而个人消费难以增加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如今的日本，人人丧失了欲望不说，还对将来抱有不安。为此，即便是微涨薪金，也与消费无关，而是转向了储蓄。因此，为了刺激消费，就必须消除人们对将来的不安。

不过，如果安倍政权越是为自己做不着边际的宣传，国民就越对日本经济的未来，抱有灰心丧气的想法。诸如“让安倍经济学这台发动机最大限度地转动起来”，或是“没有瑕疵的经济对策”，以及“28万亿日元，属第二次安倍政权以来最大规模”等。这恰恰才是即使实施了安倍经济学，也无法使得景气有丝毫回升的悖论，同时也是我倡导“心理经济学”的最佳时点。

## “最后有国家来照料”的安心

无论是安倍晋三首相，还是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或者还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宾·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教授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他们都信奉“20世纪经济学”：如果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GDP就会大增。

但是，这个经济理论在日本已不再有效。这只要看“马歇尔K值”（Marshall K）的推移，就能明白。所谓“马歇尔K值”就是指：对表示一国经济活动总量的GDP来说，用指标判断货币供应量是否在一个适当程度的常数。不过，这个K值在日本则是不断上升。这也就是说，即便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对处于少子化、高龄化的日本来说，若仍用过去一样的效率，就无法被市场吸收（等于GDP无增长）。但是安

倍首相和黑田总裁们则对此不能理解，他们提出了28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大量买入国债向城市增发货币量，并实施导入负利率金融政策等。这分明是人人“欲望”满满的“20世纪经济学”。如今的日本，即便向市场抛出再多的资金，都无法被“低欲望社会”所吸收。这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将来的不安”。对这个现实必须要充分理解。

安倍首相认为，只要上涨工资，国民的钱就能花在消费上，因此要求企业上调薪资。但问题在于，如今口袋里有钱的并不是领薪水的上班族，而是退了休的高龄者们。这些高龄者的子女那一代，如前所述，即使工资略有所涨，但在房贷及教育经费等方面却有过多的花费。这些人由于对将来抱有非常大的不安，也就绝无可能掏钱滋润消费市场。而高龄者自身也有莫名的不安，为此也在控制消费。换言之，日本现在是不分男女老幼，都在抑制欲望拼命存钱，以此想把对将来的不安降至最小化。

反观而论，如果能消解面向将来的不安，国民就会自然而然地掏钱推动消费。为此，政府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计划。要让持有个人金融资产1 700万亿日元的一大半高龄者，吃好喝好玩好，对于一些尚属健康的高龄者，要打造让他们继续工作的环境，或者为他们致力于义工及社会活动等创造条件。如果由于患病或受伤等原因无法参与这些活动，政府要给予国民这样的信心：“国家会照料到你们最后，因此请安心。”

## “改变生存方式”将成为经济政策

这并不是说想单纯地优待老人。由于超过了平均寿命，因此如果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只有干脆从容地接受死这一事实。为此，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我认为，需要制订属于自己的明确的人生计划。

这也就是说，将漫长的人生分为四个时期："学习期"、"工作期"、"退休后享乐的夕阳期"和"迎接往生的准备期"。清晰地掌握各个不同时期的节律，制订好不同的人生计划，那么，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你就能说"我的人生是最棒的"。虽然根据人生计划必须制订相应的财政金融计划，但是许多不同年龄层的日本人，都是为了"一旦有事"而一味储蓄，他们并不设定使用这些储蓄的明确基准和计划。

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曾针对只顾存储金融资产的高龄者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要他们更多地花钱，并称："在电视上看到一位90岁的老人，还表示担心自己的未来，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活多久啊？"虽然这个发言引发热议并招致了批评，但我认为大体意向没有错。退休后还一直抱有"不安"，还维持"低欲望"的生活，这怎么能行？显然，只有改变日本人这种活法的改革，才是当前最为必要的经济增长政策。

但是，第三次登场的安倍内阁，却提出了所谓的"劳动方式改革"，真是糊涂透顶。这种以缩短长时间劳动和上调最低薪资为目标的改革，想做一个事无巨细的微管理者，恰恰显现了安倍政权的恶习。绝不是这种"高高在上"的事无巨细，而是借由废除一些根本性的规则，得以诞生一种自由的学习方式、自由的劳动方式、自由的赚钱方式和自由的生存方式，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种投入巨额税金的经济对策，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就是，下一代人向国家贷款会越来越多，国民也就越发显现不安的态势——我的这本拙著《低欲望社会》，论述的就是如何摆脱这种"安倍经济学的悖

论”，如何才能让日本经济迅速反转掉头。这本书，在2015年出版了单行本，2016年10月又出版了经过扩充修改的文库本。

让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对基于古典经济理论的安倍经济学，大声说个“不”字。我衷心期待着，纵然只多出一名读者，也难能可贵。

2016年10月

大前研一

---

(1)　指2016年7月的大选。也是安倍政权2012年年底执政以来的第二次参议院选择。——译者注（以下不再标明）



## 前言

# 不再以《坂上之云》为动力的日本人

## 为什么经济学家预测的都不准

前些日子，从长野县停车场经营者那里，听闻了颇耐人寻味的一段话。停车场投币机里投入的纸币币种，经济景气的时候，10 000日元纸币和平整如新的纸币居多。经济不景气的时候，1 000日元纸币或100日元硬币以及皱巴巴的纸币居多。情况不好不坏的时候，则是5 000日元纸币和500日元硬币居多。这就非常有趣了。而2016年的夏季，10 000日元纸币和平整如新的纸币奇少，1 000日元纸币和100日元硬币，甚至是10日元硬币和皱巴巴的纸币奇多。这是包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年代以及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经济危机在内，从未有过的现象。

虽然这只是单纯的地方城镇街坊聊天的谈资，但是比起专业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测”，这些谈资有时更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状况。

2012年年底诞生的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借由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承诺今后10年内实现经济增长。让名义GDP增长率平均达3%，实际GDP增长率平均达2%。

虽然2013年实际GDP增长率为2.1%（全年为1.6%），但在增加消费税后的2014年4—6月期间，换算成年率实质减少7.1%。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民间主要的经济学家们在同年度7月调查中预测，

调高消费税的快速实施及反弹作用，将使GDP减少4.9%。但实际的跌幅却大大超过了预期值，其结果显示了日本经济的急度减速。另外，在同年度10月调查中，经济学家们又预测7—9月期间，实际GDP以年率换算将平均上扬3.66%。但这回又大大颠覆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换算成年率的结果，则是萎缩了1.9%。接着在11—12月期间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在2015年1月调查中，预测经济增长将由负转正，GDP修正为增长3.4%。但其结果只增加了1.5%，虽然GDP时隔三个季度转为正增长，但与事前的预测值相比，下挫近二个百分点。

2014年实际GDP增长率为负0.03%，是2011年遭遇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时隔三年呈现负增长。但民间调查机构在前一年所预测的平均数值，则是正增长0.9%（0.2%—1.8%）。二者还是有一个百分点的相差。

为什么经济学家们的预测都不准呢?

一些经济报刊将其原因归结为在预测时，由于各种经济指标本身的误差等，造成分析上的技术因素。然而，这些分析并没有触及本质。

比如，经济学家们分析，2014年4—6月期间GDP大幅下挫的原因，是因为调高消费税前，消费者大量消费后的一个市场反弹的结果。但我认为其理由并不限于此。同年9月，从日本央行公布的全国企业短期经济观察调查来看，显示企业景气状况的业绩状况判断指数（DI），从6月份开始调查后就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就其结果，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在10月份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加以说明：“比预想的要好。业绩状况判断指数维持在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他并表示

“景气持续处于回稳的基调，消费也朝稳态推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当时零售界的两强永旺（AEON）和7&I控股公司（Seven & i Holdings），在2014年8月发表中间决算报告。报告显示两家企业的超市业务都呈萎缩状态。同年9月，四家大型百货店的营业额，除了三越伊势丹，其他三家都低于去年同期。就算偏袒而言，经济状况也最多是原地踏步，手头紧，消费低迷则是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安倍首相在秋天召开临时国会的施政演说中，仍然不忘强调安倍经济学的效果：“有效招聘倍率（理论上招聘倍率可以反映统计周期内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当招聘倍率大于1，说明职位供不应求；如果招聘倍率小于1，说明职位供大于求。）达到了时隔22年的最高水准。”“今年春季，许多企业将会上调薪金。”另外，安倍首相还进一步主张经济的“良好循环论”：“股价上扬与消费相连。消费有所增加，企业收益就有所提高，薪金也因此上调；而薪金上调，消费就进一步增加”。显然，想藉由“良好循环论”将安倍经济学正当化。但问题在于，日本与美国不同。日本人个人几乎不持股票。所以因股价上扬带动市场良好循环这个现象，至今没有出现。而因股价上扬薪金也上调的说法，也是首次耳闻。恐怕只有压低薪金，企业收益有所提高，股价才能上扬吧。

虽然不知道为安倍首相撰写这份施政演说讲稿的是谁，但也呈露出对日本经济构造的无知，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 史无前例的“低欲望社会”的出现

即便如此，安倍首相仍然在国会大选时，持续主张安倍经济学，并打出“唯有这条路”的宣传口号，选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原本，许多自民党议员为了阻止被“增税派”的财务省“劫持”而主动计划大选，但从结果看则演变成了对安倍经济学投上信任票的大选。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日本经济终要步入真正的危险水域了。

为什么说是危险的？一言以蔽之，原因在于安倍首相无法理解目前日本经济直面的根本问题。而一直主导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智囊们也有责任。担任内阁官房的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浜田宏一，静冈县立大学教授本田悦朗，还有特地受邀来日本、并被引见给安倍首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因他们提出通胀目标论等误导性政策，招致经济的大混乱。

真正成为问题的是：支配20世纪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不再适用21世纪的日本经济。那些大肆挥舞过去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学者们，他们的想法与这个世界渐行渐远。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低欲望社会的出现”。

因日本央行的“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日本一直处于异常的资金过利状态中。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以惊人的低利率就可以向银行贷款。明明所谓的资本成本如此低廉，却没有人向银行贷款。此外，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 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金约为380万亿日元。即便有如此雄厚的资金，但就是不想使用。这就是问题所在。

针对我提出的“低欲望社会”等话题，读者当中或许会有人认为，如今日本经济不景气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或许还有人这样认为，经过“失去的20年”，在长期的通缩状态中，由于便宜的商品到处随手可得，便无需购买高价商品，这样就必

然导致以低价格、最少量的物品，就可以维持生计了。不过，在日本出现的这种现象，并非是暂时的。

诚然，日本已经不可能重拾曾经的高度成长期或像泡沫经济时期的好景象了。但是，低欲望的形成，不单纯是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在上调消费税和“安倍/黑田泡沫”下，通货紧缩也逐渐转向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导致物价上涨也随处可见。因此，也并不全是通货紧缩造成的低欲望。更进一步说，我无意指责年轻人欲望低下。年轻人无欲本身，如同本书所解析的那样，从某种层面来看，也是合理的选择。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身处这样的社会，日本企业和个人应该如何应对才是?

这种低欲望社会的出现，是人类从未经验过的现象，日本先于世界各国进入了低欲望社会。正因为如此，全新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安倍政权所实施的，则是过去自民党十年如一日的乱撒钱政策。

虽然这只是黑色幽默，但这种行为本身就如同在被阻断的轨道线上，列车还朝着绝壁断崖超速疾驶。安倍政权也正朝着破产突飞猛进。

## 日本年轻人的DNA发生了变异

后面要详细分析，除去公共事业这一块的经济效果，我认为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几乎没有带来经济浮扬效果。20世纪的经济学，可以大致分为“金融”“财政”“成长战略”这三部分。安倍经济学的特色就是对这三部分进行政策组合，并大规模实施。但是这些做法并不适用于21世纪的经济了。

说起来，如今的消费萎缩，是整个日本已经成了无消费意欲的国家所致。具有代表性的就是“FLAT35”[(1)]。这是住宅金融支援机构与民间金融机构协作，提供的一种长期固定利率房贷。然而即便利率只有1%上下，堪称史上最低，新申请的房贷金额并没有因此而增加。连长达35年的贷款再搭配不到2%的固定利率，都乏人问津，这在世界上算日本独有的现象吧。日本人（特别是从开始懂事之时遭遇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如今35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未来抱有不安，不想背负贷款重荷，是对利率毫无反应的国民，也即反向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国民。这样来说，是多数日本年轻人的DNA发生了变异，欲望渐渐衰退。因此，当下日本，即使政府再出台怎样的经济刺激方策，都无法期待消费的增长、经济的好转。

作家司马辽太郎在小说《坂上之云》里，描述了一群为了让日本成为匹敌欧美列强的近代国家奋力拼搏的年轻人的故事。即便经历战败，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成熟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公司后，都是以能够成为公司高层主管或领导者为目标，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而且坚信这进而也直接关联到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而且，那时很多国民结婚生子，即便是超8%或10%的利率，也照样贷款盖房买房。如今，放眼世界，与当时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中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国，他们也是与当时的日本人一样，纵使利率再高，也要贷款盖房买车，为自己的梦想而拼命工作。

然而，已经迈入成熟的先进国家行列的今日日本，我认为，国民对自己应该瞄准的目标与理想——也即《坂上之云》中为了国家的奋斗精神，已经再难复现。面对从未有过的现实，我们并不是要像以前一样大肆挥霍税金煽动消费，而是藉由驱动人的心理层面活络经济的

方法还有多种。低欲望社会出现的背景是什么，今后应如何加以应对——对此加以论述，就是撰写本书的目的。

诚如后续各章所述，今日日本的“惨状”，我在25年前付梓的著作中就有所预测，并也提出过解决方策。当时我就强调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搁置至今。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

大前研一

---

(1) 就是贷款的20年至35年间，利率固定不变的一种贷款。



# 第一章
# 现状分析 “人口减少+低欲望社会”的冲击

## 如何解读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和少子化，无欲求的年轻人不断增加……毫无疑问，日本比世界各国早先一步面临这些问题。恕我孤陋寡闻，目前还没有一本经济学教科书能够给予我们令人信服的处置之术。即便是我阅读了近年成为话题的经济学名著也是如此。

比如，就拿成为世界级畅销书的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教授的《21世纪资本论》（日译本2014年由三铃书房出版）这本著作来说，作者用了15年时间，收集了二十多个国家，时间跨度为三个世纪的“所得与资产”的庞大数据，并对此加以分析归纳，最后完成一本厚达七百多页的巨著。

这本书的要旨在于：长期以来由于资本收益率（r）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g），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富者更富，贫富差距扩大，资产的不平等将通过世袭，跨越世代而持续下去。为了正视这个“r>g”的不平等，必须强化世界范围内的对资产而非对所得的课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等人还联名为这本书写下评价颇高的推荐文：“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是近十年来最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克鲁格曼教授语），“这是一本适时且重要的书”（斯蒂格利茨教授语）。

虽然我的看法与克鲁格曼教授完全相反，但我还是赞同这是一本重要著作的说法。不过，如果硬加以评说的话，我认为该书的分析本身只不过是论述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已。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若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哈佛大学基金等这些世界级的庞大基金的收益率来看的话，有钱人的回报平均约达10%。这也就是说，富者更富。而穷人即使把钱存入银行，现在也几无利息可生出，更何况在发达国家也不见上调薪金。照这样下去，利用资产获利的人与靠工资积蓄的人，这之间的差距就会自然而然地越扩越大。《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之所以引发关注，就在于作者认真分析了庞大的数据，从而得出富者越富，穷人被置于一边越发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的结论。

回顾历史，产业革命后的英国，由于贫富差距惊人的扩大，爆发了激烈的工人运动，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后还用了二百年时间进行财富再分配（因而是主张取消规则限制，转向民营化的撒切尔主义，复兴了停滞的英国经济）。

此外，俄罗斯和中国也在短时间里扩大了贫富差。根据瑞士大型金融集团“信贷瑞士”汇总的《财富垄断状况》报告（图表1）来看，2014年财富垄断状况最严重的国家是俄罗斯，约达85%。中国是从2000年的49%上升到64%，成了这14年来财富垄断进展最快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国营企业民营化之际，一部分人乘机占据了财富。

图表1　日本是财富再分配最为均等的国家之一

◆ **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的财富垄断率**

（所得排行前位的10%人口拥有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

| | | |
|---|---|---|
| 财富分配不均程度较低的国家/50%以下 | 比利时 | 47.2 |
| | 日本 | 48.5 |
| 财富分配不均程度中等的国家（举例）/50%以上 | 澳大利亚 | 51.1 |
| | 意大利 | 51.5 |
| | 法国 | 53.1 |
| | 英国 | 54.1 |
| | 芬兰 | 54.5 |
| | 荷兰 | 54.8 |
| 财富分配不均程度极大的国家和地区（举例）/70%以上 | 印度 | 74.0 |
| | 美国 | 74.6 |
| | 泰国 | 75.0 |
| | 菲律宾 | 76.0 |
| | 印度尼西亚 | 77.2 |
| | 香港 | 77.5 |
| | 土耳其 | 77.7 |
| | 俄罗斯 | 84.8 |

资料来源：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4*
James Davies，Rodrigo Lluberas and Anthony Shorrocks

## “田园调布”沦为普通街区的理由

总而言之，作为全球现象的贫富差距问题，我认为皮凯蒂教授所进行的分析和观察是准确的。但是我不同意他主张的对资产实施累进课税作为解决贫富差的方策。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看看日本的情况就会明白。

从全球范围看，日本确实是财富再分配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由于推进累进课税制度，日本和英国一样，不断地将社会主义国家化。依据前面提及的信贷瑞士的报告显示，财富再分配推进最好的国家是比利时（47%），第二位就是日本（49%）。在被调查的国家中，财富垄断率在50%以下的只有这两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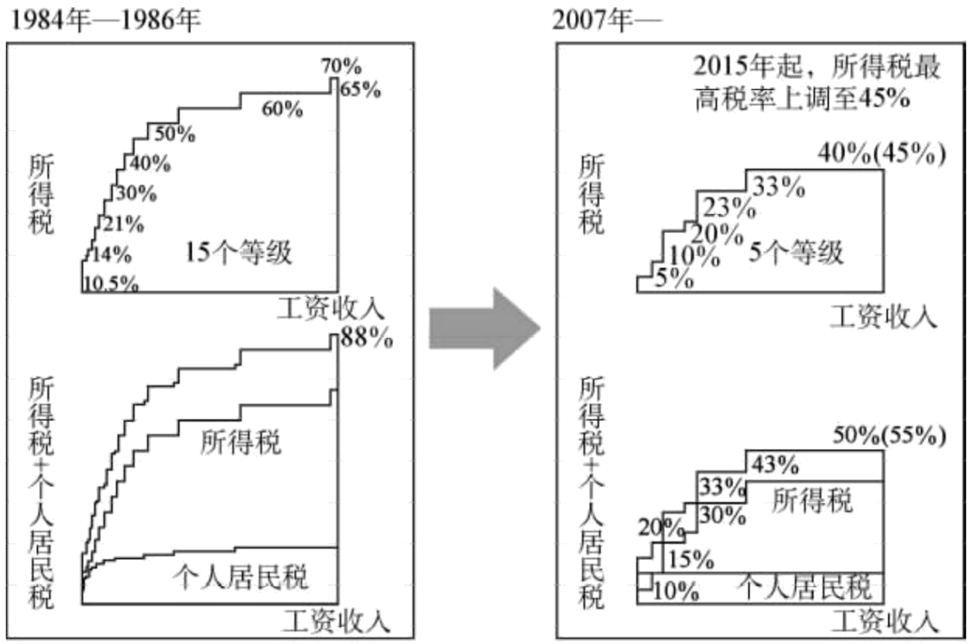
在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包含居民税在内的所得税，最高超过了80%（参见图表2）。虽然现在最高已经下降至55%，还是比江户时代的“五公五民”（一种租税征收的比例：农民收获的一半作为年贡交付于江户幕府，剩余的一半归属自己）来得高。但就其结果而言，日本成了世界上财富集中程度较低的国家。

与其他各国相比较，日本的遗产继承税偏高，其最高税率甚至超过了50%。为此，我有一位在东京田园调布拥有房地产的朋友，听信了财产继承顾问的建议，为应对遗产继承税，以贷款的方式在自己的用地上建造出租公寓。然而，不久泡沫破灭后地价下跌。这位朋友死后，遗产继承税确实变零了，但贷款额超过了继承的财产。结果造成留下债务给子女的悲剧。由于同样的事例还很多，因此即便是曾经的高级住宅区田园调布，如今也是格局变小，遂成普通的街区了。

自2015年1月1日开始，遗产继承税的最高税率上扬至55%。与此同时，基础控除额也从原本的5000万日元+（1000万日元×法定遗产继承人数），减至3000万日元+（600万日元×法定遗产继承人数）。这样一来，有更多的人被纳入了遗产继承税的课税对象范围。有了这项苛酷的税制，原本还算能获得收入和资产的人群想要获取更多收益的刺激，则荡然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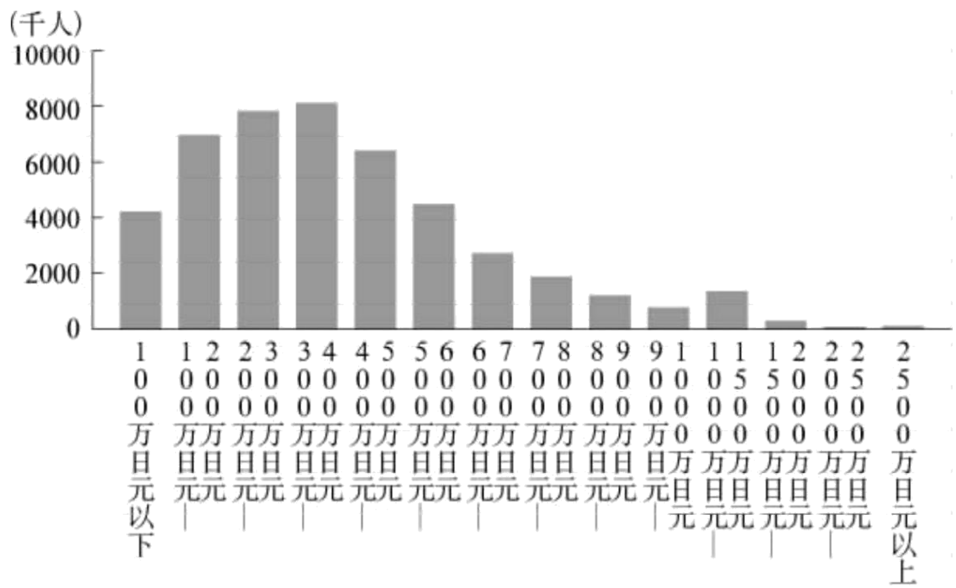
图表2　所得税＋居民税的最高税率曾经高达88%

◆ 所得税及个人居民税的税率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网站《关于所得税等(个人所得课税)的资料》

◆ 工薪阶层薪资所得人数及构成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国税厅长官官房企划课《2013年度民间薪资实态统计调查》

这就是皮凯蒂教授主张的财富再分配的一个形式。不过，为了解决拥有财富之人与未拥有财富之人之间的不平等，导入类似日本的累进课税制，向容易收取税金的富人下手，我认为这是悲伤的物语。因为在日本，纳税负担并不平等。在税制方面给予了医生或农民极大优惠。而所得税起征收入金额，单身者是114.4万日元，一对夫妇是156.6万日元，夫妇与两名小孩（大学生与中学生）是261.6万日元。从所定起征收入金额看，无需缴纳税金的人可谓众多。

在我看来，依据职业的不同而在税制方面给予优惠，或是由于收入少而免缴所得税的做法是奇怪的。因为这种做法脱离了共同负担、共享利好的民主主义原则。为了维系有活力的社会，应该是这样一种制度：按照所得负担税金，享受国家和地方自治体的公共服务。如今，应该有很多日本人对“人人均贫”的现状感到郁闷。果真是这样好吗？我们要反躬自问。

## 违反民主主义哲学的累进课税制

如前所述，就以认真分析庞大数据这一点而言，托马斯·皮凯蒂教授的《21世纪资本论》这部著作是重要的。但是托马斯·皮凯蒂教授主张用累进课税制，作为贫富差距扩大的解决方策，其结果就是缩减了人们的欲望与渴求。而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一个没有利润动机就没有赚钱动力的社会。

而且，极端的累进课税制是违反民主主义哲学的。因为民主主义是“一人一票”。若像日本那样，收入高的人包含居民税在内最高可课税55%，收入低的人（课税最低限以下的人）则可不课税的话，会形

成这种状况：明明选举投票时大家的权利是相同的，纳税义务却有如此大差。我认为，保有活力社会的一个界点是：即便是收入低的人群，也应最低缴税5%，即便是累进课税制的高收入人群，最高税率也应控制在25%左右。

问题还在于，政府和国会议员向持有组织票源的团体讨好谄媚，反复承诺对票源数居多的低收入阶层的服务。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原本高收入者应该能为社会做出更多样化贡献的，却因为自己缴纳了高额税金，已经尽了相当义务，这种意识催生了一批缺乏社会公益精神的“心胸狭窄的富裕阶层”。

不过，我认为，如果没有“越能赚钱就越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个动力欲望，社会就不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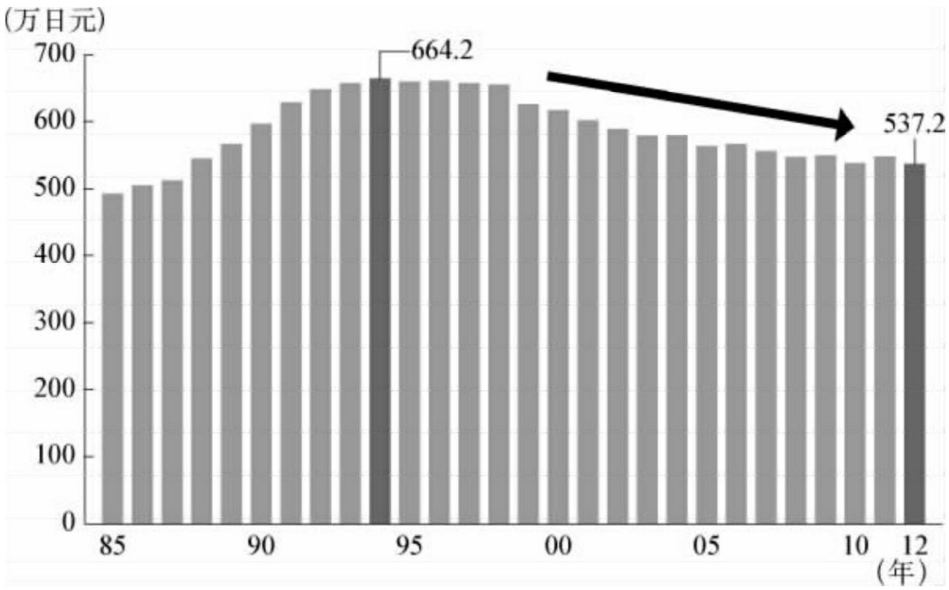
## 日本成了人人皆贫的国家

与民主主义最为搭配的税制是“单一税制”。虽然世界上导入所得税率10%—15%的单一税制国家为数不少，但若是所得税一律以15%课税，收入200万日元的人要缴纳30万日元，收入2亿日元的人要缴纳3000万税金。在这个时点上，两者负担的税金差已达2970万日元。累进课税制则更是扩大了这个税金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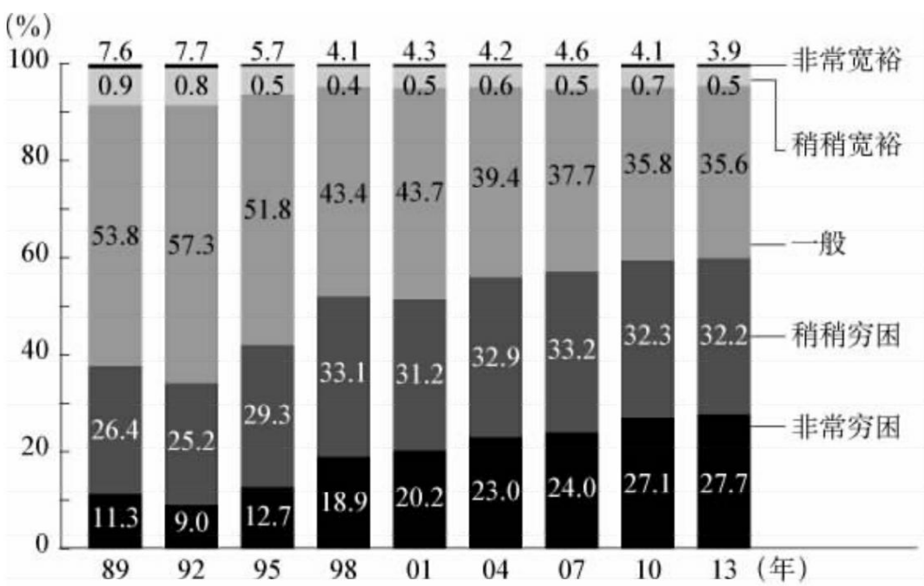
假设把《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第一章的主题归为展开现状分析，第二章是提出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第三章的主题则是：“那么，怎样做才能让富裕阶层为社会做出贡献？怎样做才能让国民充满活力？”恰恰是在这点上，今日日本的税制，毫无作为。

图表3　日本走向人人均贫

◆ 平均每户减少 127 万日元——平均所得金额的年度变化




◆ 国民生活意识与家庭户数构成比例的年度变化




资料来源：2014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所谓21世纪的国际竞争，也即优秀人才的争夺战。在这方面，恐怕日本连参赛权都没有吧。只要一听说日本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和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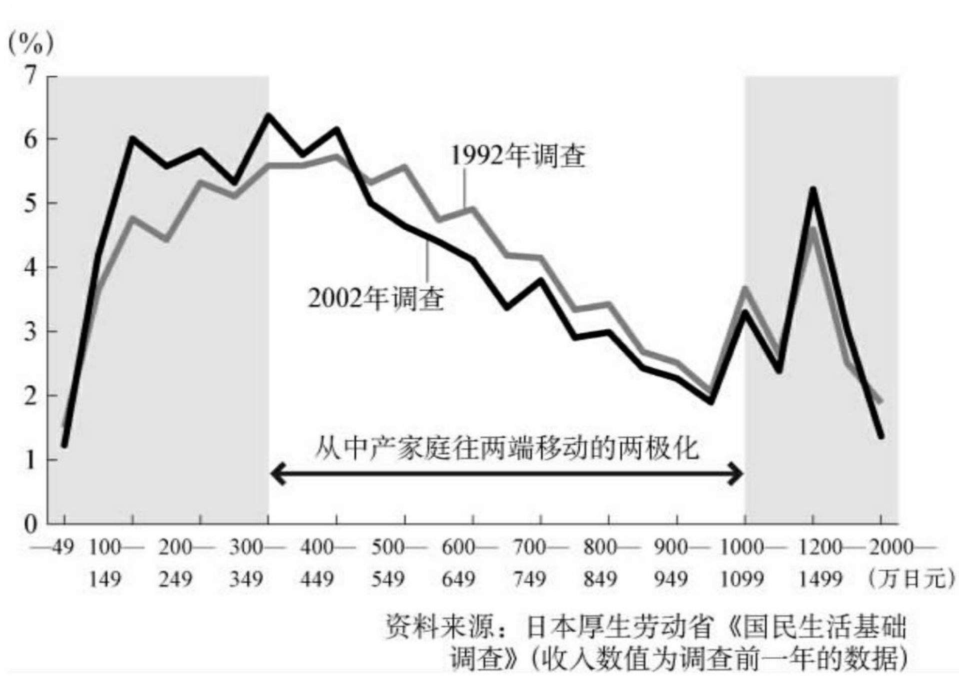
继承的税率，想在日本居住的优秀外国人，应该是没有的。2015年遗产继承税再次调高，连日本的富裕阶层也都要相继移居海外了吧。

说起来，当今日本不景气的原因在于，明明个人金融资产达1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资金达380万亿日元，但这些资金就是不流入市场。虽然安倍首相不顾调高消费税是否会使经济进一步恶化，在国会大选中打出这张增税牌，但其实只要将未流动的金融资产课上1%的税金，国库就会增收20万亿日元。像日本这样发展处于停滞的发达国家，资产税是适合的税制。我对此加以提案的理由，也正是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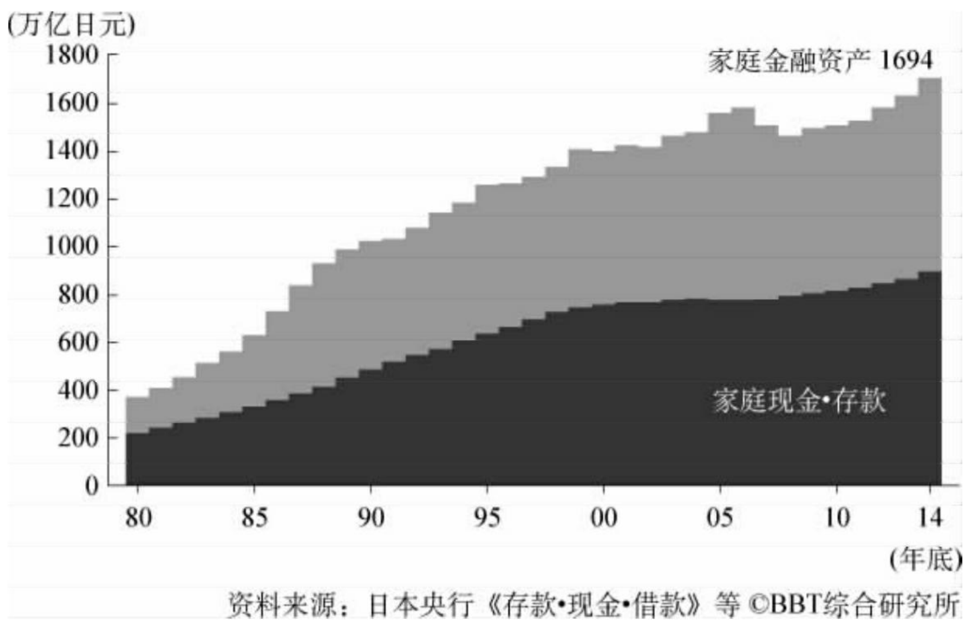
虽然对经济增长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年年上涨薪资，所得税采取累进制是可以的。但对已经成熟、经济不再增长的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不再上涨薪资，针对所得的累进课税制，只能与“赚钱欲望”的丧失相连。另一方面，正如皮凯蒂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利息和投资回报率高的发达国家，富人会将收入资产化，并用其资产衍生资产，因此对资产课税是合理的（至少在日本，由于采用累进课税制，国民并没有运用资产获利，因此我提案采用单一税制）。

图表4　“M型社会”，个人储存越来越多的资产

◆ 年收阶层与家庭户数比例的变化




◆ 家庭经济的金融资产・现金・存款的变化




就国民所得而言，日本在这十多年间，无论哪个阶层的年收，都减少了约100万日元。我从以前就开始分析“M型社会”，但就算处于M右侧，年收超1200万日元的高收入人群，也出现同样情况。处于M型

中间的中产阶级在减少，低收入阶层大量膨胀，连平均所得都是往左偏移（参见图表4）。即便是高收入者，他们也感到赚得越多纳税越多，因此也就丧失了“变得更有钱”的强烈动力与活力。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沉沦于人人皆贫——今日日本无可辩驳的现实。这样果真很好吗？《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就是探讨这个话题的很好起点。

## 还是皮凯蒂对日本不够了解

2015年1月，皮凯蒂教授访问日本。并针对著作里未曾涉及的日本贫富差距问题，陈述见解。比如，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他指出“日本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中”，“即使消费税上扬，也不会产生太好结果”，并提出“应该采取累进课税制，对拥有资产的高收入阶层，课以高额税金，下调无资产的年轻人与中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等看法。

如前所述，皮凯蒂教授的学术观点是：在发达国家，由于资本收益率（r）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g），因此导致富者更富，贫富差距扩大。借由世袭，这种资产的不平等，跨越时代被持续了下去。要拨正这种不平等，政府的做法是必须强化对资产而不是所得的课税。由于大家都推崇“皮凯蒂理论”，就连国会开会时“贫富差”也成了争论焦点之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皮凯蒂教授对今日日本还是不够了解。

之前我曾有说过，虽然皮凯蒂教授的数据分析有洗耳恭听的价值，但很难同意他所主张的把对资产采用累进课税制作为解决贫富差的方策。我的这一立场基本没变。这是因为在日本，资本收益率极低，所以贫富差别也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日本不动产大幅升值，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泡沫时期的事了。从那以后，几呈持平状态，而很多非都市地区都在下跌。金融资产也在90年代后半，其利率徘徊在约4%—5%左右，但现在定期存款利率却低于0.2%。而高于这个利率的金融商品，不是短期的特例就是有风险类的。这也就是说，日本从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不分上下，几乎为零或为负数。因此，在日本国内“资产增值”就变得难于上青天。

确实，好像也有一些数据让人产生怀疑：日本的贫富差距是否在扩大？如“相对贫困率”（所得水准低于“中间值”一半的人口比例）和“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配不均的指标。用从0到1的数值来表示，越接近1，收入差距就越大）等经济指标。不过，在日本并没有出现任何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而在海外，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中国，都能看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如在这些国家的大都市，既有宫殿般的高级住宅，同时也有贫民区的广泛存在。但这样的状况在日本很少看到。城市里也并非到处都是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另一方面，如果要问日本近年来，都是哪些人成为有钱人，主要是公开募股（IPO）的企业创业者，或是从父母那里获得转让股票，以资本获利者，但均属极少数人群。如此而言，我们只要不是从宏观经济的指标而是从微观经济的视点出发，观察现实的社会状况，就会明白日本的贫富差距，其实并没有想象中扩大。而且我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公平，财富集中状况最为少见的国家。换句话说，日本是世界上“最为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对此，我的思考点在于：皮凯蒂教授主张对有钱人采用累进课税制，课收高额税金的做法，完全不适合于日本。

## 资产课税一律采用单一制

皮凯蒂教授进而还针对日本政府不论国民收入高低上调消费税的做法提出批评，声称这样做“不会产生太好的结果”。为此，他亮出自己的提议：纠正日本贫富差的处方，就是要强化对富裕阶层在世界各地的资产课税。针对皮凯蒂教授的这一提案，安倍首相给予了否定的意见：称对全球资产强化课税，就“执行而言有非常困难的一面”。

从财务省的视点来看，当然也是这个结论。在我看来，目前财务省最想做成的一件事，就是上调消费税至10%。强化资产课税则是其次的。安倍首相的这个发言，或许也是听取了财务省的意见。

关于消费税，我与皮凯蒂教授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应该按照预定的计划提高至10%。同时我又认为，并不应该针对末端消费课征消费税，而应该针对伴随着经济活动产生的附加价值（财富创造），导入在所有流通阶段一律广征增值税（VAT/Value Add Tax）的做法。这个税率如果是10%的话，日本的附加价值总额相当于GDP的总额，也就是约500万亿日元，因此税收可达50万亿日元。

此外，皮凯蒂教授提出应该改为对资产课税的意见，我在20年前就有所提及。由于日本对资产的课税既不均等也不公平，表现出过轻的倾向，因此我赞同这个说法。不过，我反对针对资产金额采取累进课税制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会削弱人们增值资产的动力。

我的提议是：针对拥有存款、股票等流动资产和不动产等固定资产的所有人，包括遗产继承人在内，一律采用单一税率制课税。如是这样的话，就能对有钱有资产的高龄者及继承人课以较多的税金，对不太富裕的年轻人课以较少的税金。这种并不针对收入而是针对资产

课税的税制，对已进入成熟发达国家行列、收入不再增加但资产总额庞大的日本而言，是最为适合的制度。在经济还在增长、收入还在增加的国家，对所得课税，针对已进入成熟发达时期，收入不再增加的国家，则改为对资产的课税，这是常识。

日本的个人及法人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合计约为3000万亿日元。若以时价的1%加以课税，税收就达30万亿日元（企业为了生产和经营所拥有的资产不予课税）。增值税和资产税合计约为80万亿日元，而国家一般会计预算约为100万亿日元，若能从中削除20%，即便废除所得税、法人税、遗产继承税等其他所有的税金，也能达到收支平衡。为了减持国债，或许有必要度过一段“苦涩的黑暗期”：诸如在一定期间内资产税从1%增至1.5%，增值税上扬至15%等。

不过，皮凯蒂教授提出“用累进制强化全球资产的课税”主张，从现状看则难以实施。即使能实施，我认为只会在全球增加富人专属的避税天堂。相较之下，比如日本这样经济成熟的国家，废除遗产继承税，改对包括继承人在内的资产所有人，实施“单一的资产课税”，不仅能提升消费（即经济），也是纠正贫富差距的有效处方吧。

## 从危机的教训中什么也没有学到的美国

不了解当今日本经济的，并非皮凯蒂教授一人。继《21世纪资本论》之后，被评为“最右翼”畅销书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阿迪夫·米安（Atif Mian）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阿米尔·萨菲（Amir Sufi）教授合著的《房债》（*House of Debt*，日译本2015年由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一书。这本书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该书收集了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的资料并加以分析，力证借贷高额房款的购房者们，一旦房价下跌，就必定严格控制消费，使得市场经济更低迷，并且还指出中低收入阶层的借款增加，将招致经济不稳定。

为了防止这些现象的出现，两位教授提出一种叫做“SRM（责任共有型房贷）”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房价下跌时，认可借贷者还款金额的减额；当房价上升时，调升借贷者还款金额。但我认为，这正是学者们喜爱的“纸上谈兵”而已，毫无现实的指导意义。更何况《房债》这本书的背景，原本就与当今日本经济状况不符。

现在，美国的经济景气度在回升，道琼斯平均股价不断刷新史上最高值，美元汇率也一枝独秀，以企业设备投资和住房为中心的个人消费也在持续扩大。其中，受惠于汽油价格的下跌，包括大型汽车在内的销售势头看涨。2014年新车贩卖数为1652万台，超过了2007年的1615万台，恢复到了次贷危机前的水准。2015年也达到了1747万台，刷新了过去最高纪录，持续保持良好势头。

但是，由于伴随而至的次级车贷数量激增，其他领域的次级贷款也达到高峰，市场感受了“第二次次贷危机”的恐惧。这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从上回的次级房贷危机中习得任何教训，这回才引发了次级车贷，不过转换视角来看，美国就是一个如此的“欲望过剩社会”。

## 年轻人不愿背负危机

问题在于，日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如前所述，提供长期固定利息的房贷“FLAT35”，其利息即使为1%，贷款人数也未见增加。车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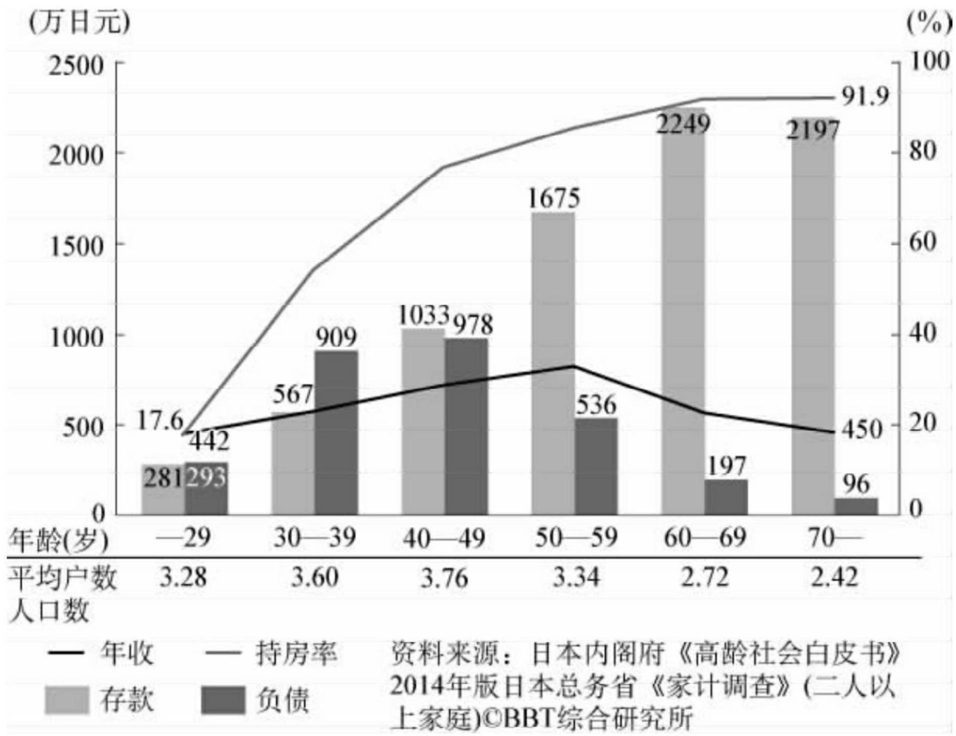
利息是2%左右，然而2015年新车贩卖台数，与赶在调高消费税前的2014年相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减少了505万台。特别是反响巨大的轻型汽车，与2014年比下跌至83.4%。

在美国，房贷和车贷利息，即便是高级贷款利息（信用等级高的消费者），也约为4%。一般而言，利息若为5%以下，贷款人就会蜂拥而至。但在日本，利息即使再怎么低，也没有人来贷款。其理由就像我先前说的那样，因为日本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低欲望社会”。

当然，日本的家庭收支中也有负债的。不过，依据内阁府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统计，平均而言，每户负债金额最多的是四十多岁的978万日元（但储蓄也高达1033万日元）。随着年龄的增加，负债金额趋递减，储蓄金额趋递增。到了70岁以后，负债金额将至96万日元，而储蓄金额则增加了2197万日元（参照图表5）。

图表5　由于担心老后生活，高龄世代的储蓄额巨大

◆ 户主的年龄阶层与每户存款・负债额・年收・持房率




最近，由于退休后开始支付养老金的年龄有所推延，出现了无法还房贷或坐吃储蓄老本的“老后破产”现象，但是，还是有大半日本人，在其临终之际，都是无牵无挂的无负债状态。而且在日本，三十多岁两人以上的家庭，持房率超过了50%，四十多岁的持房率超过了75%，五十多岁的持房率超过了80%，六十岁以后则达到了90%。持房率如此高的国家，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吧。

日本的持房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其原因在于非都市地带，现在用500万日元左右就能买到二手的一户建房（独幢楼房），或得到父母的资助，或重新装修父母房子的人也很多。即使东京等大都市现在也是如此，继承从地方上东京打拼的第一代人所留下的房子，或是将其转手用其资金购买其他房子的第二代、第三代也不在少数。因此，像以

前一样不啃老独自购房，背负3000万日元至4000万日元房贷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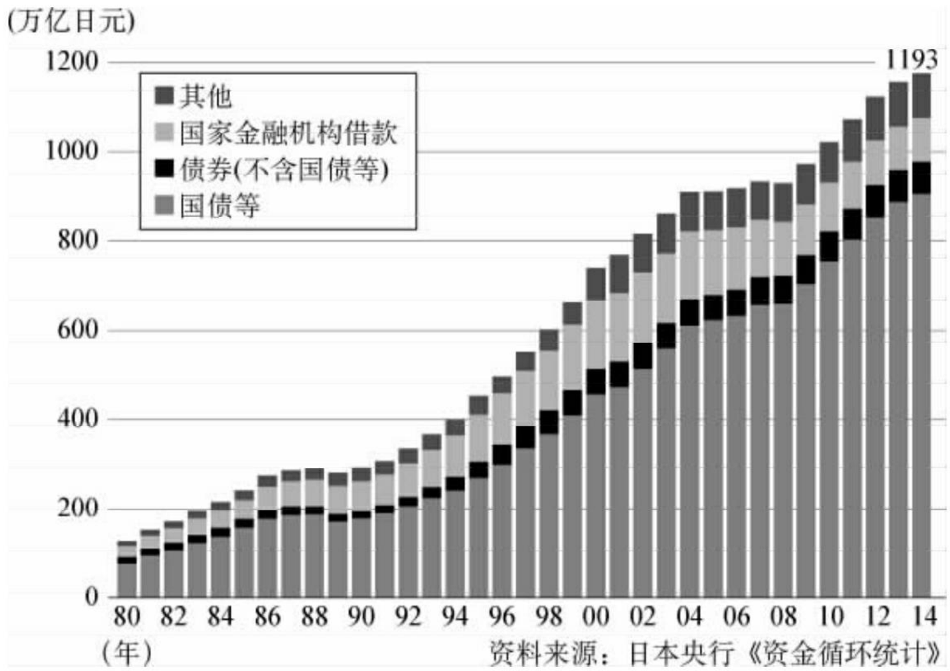
另外，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由于自开始有所追求的时候，就经历了“失去的20年”那通缩不景气的黑暗时代，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不只是房贷，连结婚生子等所有的风险和责任，都不想承担。

在公司上班也是如此。工资基本不涨，自己想干的事又不能干，而只有责任变重的职务，令人失去干劲，这样的年轻人在增加。在我们那个年代，谁都想崭露头角，最终目标是能成为公司总经理。但这样的理想抱负，已经在日本大部分年轻人身上丧失殆尽。再加之今后人口减少和超高龄化趋势越发加剧，经济规模的缩小不可避免。由于能潜在地感觉到这种危机，所以都不想背负风险。

现在日本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金膨胀至380万亿日元。而在另一方面，国家的借款（政府债务余额）则是GDP的两倍，早已突破100万亿日元大关（参见图表6）。概言之，日本的问题并不是房债（House of Debt）而是国债（Country of Debt）。转换视角来看，就是国家一个劲儿地使用个人和企业的储蓄。而当国债暴跌，个人储蓄将瞬间消失殆尽。可以说日本就处在这样的危险状态中。

图表6　国家债务最大问题点就是对现实的危机意识偏低

◆ 一般政府金融负债余额的变化（万亿日元，年度）




在我看来，日本这种“低欲望社会”现象，恐怕是阿迪夫·米安教授们完全不能理解的。用调侃的话来说，《21世纪资本论》也好，《房债》也好，都突出描绘了日本面临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异常状态。仅此而言，这两本书是有其价值的。除非能理解这种“低欲望社会”，并对症下药（如新版序言所言，回归“坂上之云”年代积极进取、雄心勃勃的日本），否则日本经济的好转绝无可能。

## 媒体盛传的“稍贵”消费

安倍经济学自起航以来，市场呈现股价上扬、日元走低的局面。媒体争相报道价格稍高的商品好卖，“稍贵”消费坚挺。如据2013年8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3年4—6月决算数据表明，假发制造公司Artnature，推出20万—50万日元的高价定制假发，销售行情见涨。日本星巴克咖啡，推出中心价格为500—600日元的商品以及价格

稍贵的甜食风味饮料“星冰乐”，其销路也相当不错。比人均消费不到600日元以及自助式咖啡店，价格稍贵的“咖啡店雷诺阿”，其总店银座雷诺阿也增加了许多商务客，公司净利得到大幅增加。此外，便利店7—11的“Seven premium”等价格稍贵的自有商品，麦当劳1000日元的汉堡，牛肉盖浇饭连锁店的稍贵菜单，戴森（Dyson）无风叶高级电扇等，当时媒体都作为“稍贵”商品作了报道，一时成为话题。

不过，针对这一话题，我在杂志连载的专栏文章中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认为这种“稍贵”的消费现象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用不了多久，就会像当时聚集人气的内脏火锅和烧酒一样，变成“稍便宜”的代名词吧。这就是有高有低，经济的不断循环。报纸和电视新闻只抓住三四个事例和现象，立马轻率地用“流行”字眼加以报道，对此我提醒各位的是，决不能随风而舞。

此外，虽然工薪族的奖金有所上涨，因春斗（每年2月至4月，日本工会组织的为提高劳动者工资而进行的罢工）工资标准也有所调整，但除部分大企业之外，多数劳动者的工资并未看涨。这样一来，在购买“稍贵”商品的同时，几乎所有的消费者就会在其他方面节约，购买“稍便宜”商品或“特价”商品，以此取得支出平衡。总之，一般消费者只是在支出的“分配”上作些微调，而能消费所有“稍贵”商品的，只限于有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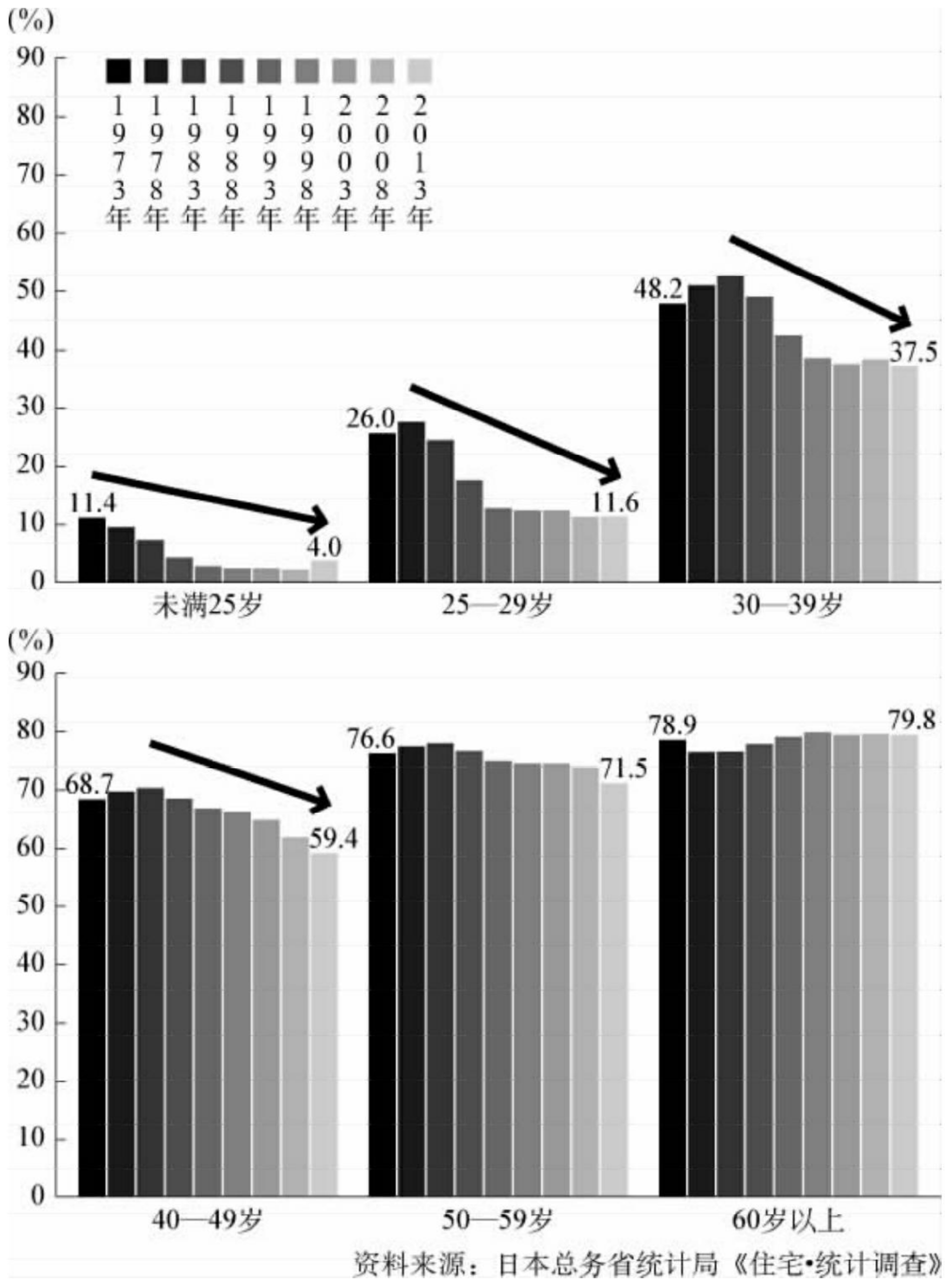
不过，相对而言，日本是个有钱人较少的国家。虽然东京被认为是世界上拥有超过1亿日元资产人数最多的城市，但主要集中在不动产。如果一旦将资产金额拉到10亿日元或100亿日元以上水准，人数就一下顿减。相比纽约、伦敦或新加坡，就显得特别少。这也就是说，想要超过“稍贵”阶段，达到真正的高价消费倾向，是不可能的。

说起来，安倍首相表示“要让国民看到物价至少上涨2%”之后，日本央行导入了2%的物价上涨率目标（通胀率目标）。因此，较之以往，不管愿意与否，日本的物价不得不变得“稍贵”起来。而且由于日元走低，依赖进口的食材等也纷纷涨价。再加上从2014年4月开始上调消费税至8%，所有商品都自然而然地变成“稍贵”，国民生活尽显艰辛。

就在这种状况中，最近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年轻人持房率下滑的统计报道。根据2012年度《国土交通白皮书》的显示，从1983年到2008年的25年间，30岁至39岁的持房率从53.3%降至39%，不满30岁的持房率也从17.9%降至7.5%。与此相反，不满40岁的借租民营出租公寓的比例，则从39.7%上升至59.7%（图表7为总务省的统计）。另一方面，根据总务省家庭开支调查的显示，2012年两人以上的家庭持房率为81.4%，较前年度增加了2.5个百分点，创下近四年来的最高纪录。总括这些数据，表明的一个问题是：40岁以上的持房率有所上升，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持房率有所下降。在我看来，这与“稍贵”消费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又显现出“低欲望社会”的另一面。

图表7　未满40岁的持房率下滑

◆ 户主的年龄阶层及持房率（1973—2013）




## “选择不拥有”的合理理由

我曾在1990年《文艺春秋》月刊杂志上撰文警告：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的不动产要跌至仅剩十分之一的价格，因此不能买房。自那以后，虽然我持续提醒国民，日本的不动产价格不会上扬。但还

是有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为主的人，在不动产高价时买房，现在则陷入还款的千辛万苦之中。

为什么他们要焦急地买房呢？这固然有被住宅金融公库（现为住宅金融支援机构）的“宽松房贷”和养老金住宅融资（现已废除）的“阶段型房贷”（两者都属于终身雇佣、定期加薪为前提的房贷商品。即在最初5至10年间压低还款金额，在宽松期结束后追加支付所剩的部分。）哄骗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还是这批购房者认为“现在不买，以后会更贵”。这里的问题在于：年纪轻轻就背上25年至30年的房贷买房，人生一开始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负债数千万日元。

今后，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的房产价格，除东京中心地带有上涨空间之外，其他地方恐怕永远不会上涨了吧。实际上，现在大部分公寓房，房贷金额超过了出租金额。这也就是说，如果是同等条件的房屋，用房贷买房，相比每月的还贷额，可以租借到比还款额更便宜的房屋。或许有人认为买房最终能成为自己的房子，有一种安心感。但到那个时候卖出，就变得三钱不值两钱。若想置换房屋，以匹配自己的退休生活，也变得无法如愿。

至于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持房率下降的原因，据国土交通省和媒体的分析，在于薪金上涨迟滞，非正规雇佣（临时工）增加等因素影响下，无法申请房贷或无力支付房贷的家庭户数在增加。不过，从结果来看，他们不选择持房而选择租房，则是战后日本人首次对“不拥有住房”，作出了极具合理性的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拥有住房也是适合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做法。这是因为一旦拥有住房，当被公司调离工作，特别是被派驻海外的时候，就会成为一大累赘，收窄了人生的选择。反过来，若是不拥有住

房，其自由度就高得多。相较于持房者，若能住上租金便宜，通勤时间较短的出租房，其金钱和时间就会更充裕。这一方面提升了生活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使得“稍贵”消费或稍稍的奢侈享受，变得可能。

而“选择不拥有”，更是加速了低欲望社会的到来。

## 日本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减少”

经济学者或经济学家之所以经常预测失误，是因为用宏观经济指标，已经无法预测未来。而能够正确预见未来的指标，其实只有一个：即人口统计学。

若持续照现在这个状态，可以预测的是：即使再过三四十年，日本劳动力人口（15—64岁）也不会增加，高龄化将会持续加剧。人口减少，才是日本直面的最大问题。

问题在于哪里呢？那就是，虽然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严重的人口减少，但日本政府还没有拿出一个能够改善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案。

当被预测未来会出现人口减少的时候，其他国家都推出各种对策应对，这多少有助于控制人口减少。正如后面要讲到的那样，在法国和瑞典，为了鼓励国民多生多育，政府提供丰厚的育儿津贴、减免税金等福利。或者，也有很多国家选择从海外接受移民的做法，用以支撑本国日益减少的劳动力人口。但是在日本，这些做法都没有被真正实施。

安倍在2014年10月众议院大会上，回答在野党的询问时明言：“安倍政权尚未考虑采取移民政策。”虽然针对扩大接受外劳问题，也正在

推进有关议论，但应对太迟缓，而且总给人杯水车薪的感觉。

关于人口减少这个问题，目前日本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户籍制度。现在所谓的“未婚先孕”数占了结婚数的半数以上。由于日本有户籍的束缚，一旦怀孕后面临着是“奉子成婚”还是被迫“堕胎”的选择（其实，在日本也有堕胎数是否已超过生育数的推测）。此外，虽然也有不结婚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妈妈这个选项，但在如今的社会状况下，难以避免的是生活贫困化。

在法国或北欧国家，早在40年前就废除了户籍制，事实婚姻被社会普遍认可。说起来，从世界范围看，还保留户籍制的只有中国、韩国和日本了。而且，户籍这个制度还对提高生育率造成了阻碍。过去在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有“人口红利”这个说法。即以团块世代[1]为中心的人口较多的家庭世代，他们的就业和纳税等，支撑了国家的财政。即使国家负债，但将来偿还这些债务的人群基数也是较大的。但是现在不要说人口红利了，由于人口增长已过峰值，加速的是人口减少，锐减的是纳税人数，偿还国家债务也就越发变得困难。

都认为国债暴跌是很严重的事，但究其原因，也是人口持续减少所致。除非设法采取措施，解决人口减少的问题，否则国家借款和国债信用度的下滑，也是无法避免的。

我曾在《新·大前研一报告》（1993年讲谈社出版）等著作里，就主张废除户籍制以及引进稳定的移民制度。而且我当时还与地方政府、现在的总务省等官方机构多次交涉过，但从结果看，没有任何变化。

面对人口减少这个难题，该如何应对为好？——很早之前我就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但如今的政府，绝对不想认真应对。因而，也只有

靠个人和企业各自努力了。

下面，我们将从制度和数据这两面，就人口减少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 团块二代没有下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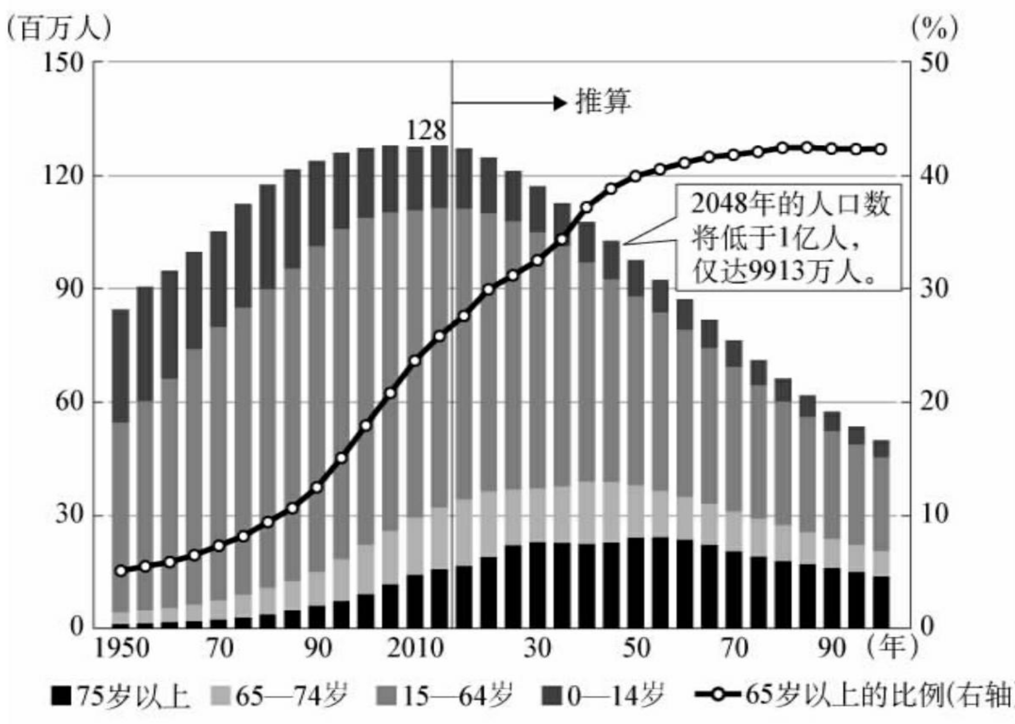
首先请看图表8。

2010年，日本的总人口数达到1亿2806万人的峰值，然后转向减少。今后的减少幅度，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预测将会急剧加速。大约到2048年，总人口数将会低于1亿，高龄者和儿童人数，将多于劳动者人口。社会要负担的人数，也将多于贡献社会的人数。

如是这样，国家的正常运作将难以维系。作为一个国家，由于必须确保警察、消防、国防等领域的人员，故企业可聘用的人才将会枯竭。反过来，如果这样的人才进入了企业，国防所需的年轻人就难以招足。虽然谁也无法预知今后的经济将如何变化，但只要看一下人口统计的数据，就会明察多少年后的变化。请参见图表9。

图表8　日本总人口数的减幅，今后将会越发扩大

◆ 日本总人口数的变化（100万人、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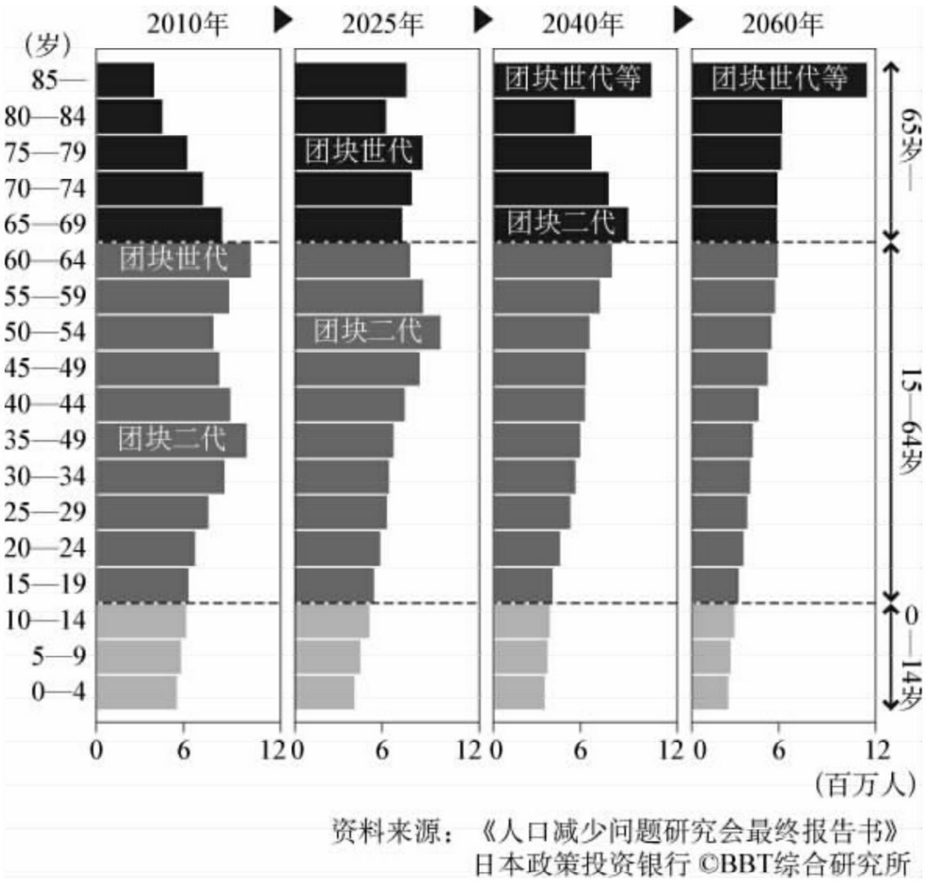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 · 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未来推算人口》（2012年1月推算）、日本内阁府《高龄社会白皮书》（2014年版）

从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来看，不难看出团块世代（60—64岁）人数最多，其次是团块二代，形成第二个人口高峰期。然而到了2025年又将如何？虽然随着团块世代、团块二代各自年岁的增长，形成人口峰值，但团块二代至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结婚。换言之，由于少子化、晚婚化的持续发展，可以得知20岁以下的世代，其人口数完全没有增长。就算我们多么期待，但“团块二代的下一代”还未出生，明摆着是结果。

图表9　从人口统计学预测未来

◆ 从人口金字塔观察人口构造的变化

各年龄层人口(每5岁一个年龄层,男女合计,100万人)




更有甚者，到了2040年，85岁以上的人口数变得最多。到那时，团块二代也都超65岁，进入高龄者行列。但在另一方面，支撑绝大多数高龄者世代的人口数，则在减少。这些人口统计数据，可以说是明确地向日本发出了“警告”。但在这个关键点上，政府还没有推出任何有效的对策。

总人口的减少和高龄化的推进，将导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和潜在增长率的低下。同理，由于消费者人数的减少，消费与住宅的需求规模，也会趋于缩小。地区人口的减少招致地区经济疲软。在乡镇，人

口数一旦跌破1万，维持行政服务就变得困难。这样一来，就会引发经济规模缩小的漩涡，国家税收也会锐减，财政风险持续提升。

国债的暴跌也开始进入倒计时。这并非盛世危言，而是必将如期而至的事。如前所述，随着今后人口的减少，足以偿还债务的人口，也变得稀少，而国债又无法永久持有而不抛售。由此故，日本的国债什么时候暴跌——是明天还是几年后？——虽然难以预测，但暴跌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 动用高龄者和女性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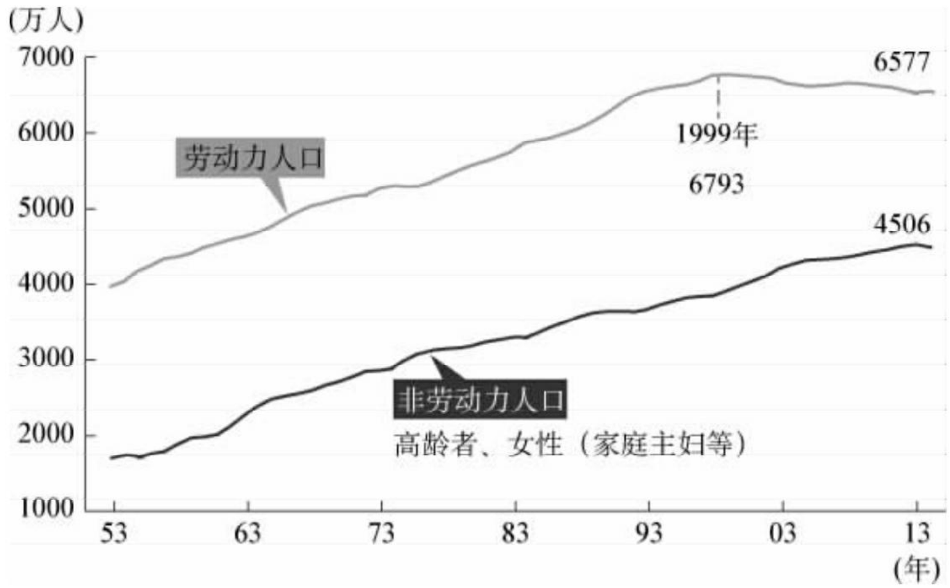
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在1999年创下6793万人记录之后，呈递减趋势（参见图表10）。而由高龄者、儿童及家庭主妇等女性构成的非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3年超过了4500万人，之后呈持续增加之势。安倍政权成长战略之一，就是要将这类高龄者和女性，作为劳动力加以“动用”。

但其实早已开始动用高龄者了。如若按原来规定60岁退休，每年会预定减少80万劳力。但现在只减少约40万劳力。单纯计算不难看出，每年有40万人，即便过了60岁还在职场继续工作。但问题在于，即便动用高龄者和女性，到2030年仍约有300万劳力缺口。到2060年，更高达1800万劳力不足（参见图表10）。这样来看，就算动用了高龄者和女性，也不足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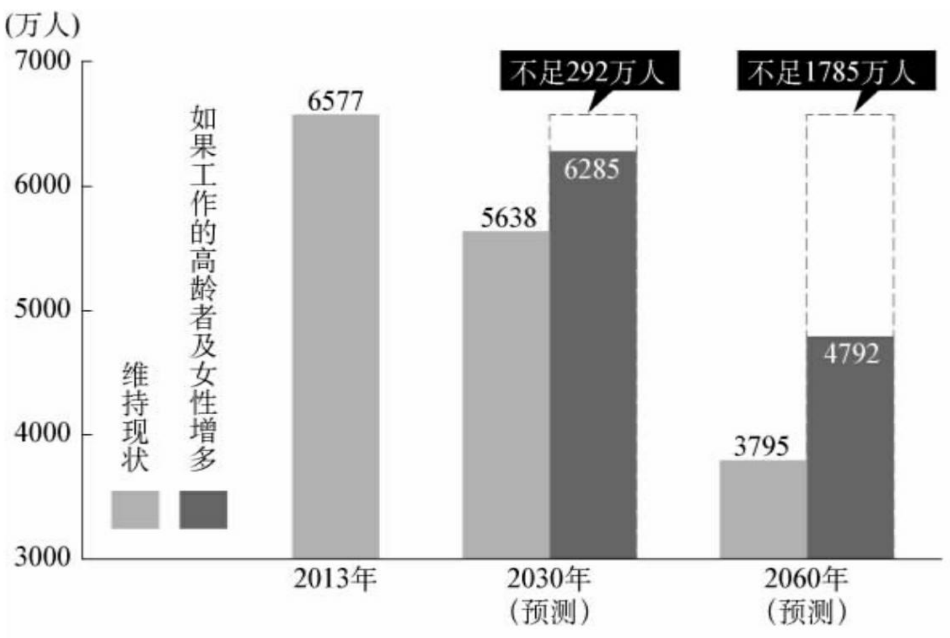
图表10　仅仅启用高龄者及女性，也难以应付劳动力不足

程，就应该学习法国和瑞典的做法，对产子育儿施以有力的支援，而

◆ 劳动力人口的变化（万人）




◆ 未来劳动力人口的预测（万人）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劳动力调查》，《日本经济新闻》2014年9月27日
©BBT综合研究所

这样一来，政府选项就十分有限。要想增加人口，阻止少子化进

且要在废除户籍制的基础上，认可更为自由的婚姻形态及家庭形态。如果这些都难以做到，只有走大量接受移民之路。

另外，要想阻止经济规模缩小，就必须激活人口数量明显减少的地区。不过放眼世界，用国策激活地区的成功案例几乎没有。我曾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公共政策课。在讲述“地域国家论”这个课题时，发现让地方经济成功扭转的案例一个也没有。对此，后面各章还会详述，这里只想指出的是，多数国家致力打拼的并不是地方，而是都市。如何让都市再生？这样来看，目前政府为振兴地方经济，推进所谓的“地方创生”政策，恐怕也难以期待多大的成果。很有可能就是两手空空，以白忙一场而告终结吧。

再者，整个国家呈现“不增长也坏不到哪里，粗茶淡饭的生活便可心满意足”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一亿全低欲望社会”。当然这也是一个选项，但这样下去国家税收会越来越少，抱有庞大国家债务的日本，终将面临国债（债务）不履行、恶性通胀的风险。

## 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差

图表11（截至2012年）汇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成员国的总生育率。日本在2005年曾一度下滑至1.26，后来稍有回复至1.41（2015年达到1.46）。由于经合组织平均数值为1.7，故人口减少也呈较缓慢趋势。而如果平均值为2.0，即便不接受移民，也能维持现有人口数量这个水准。那么，其他发达国家，又是如何应对人口减少的呢？请看图表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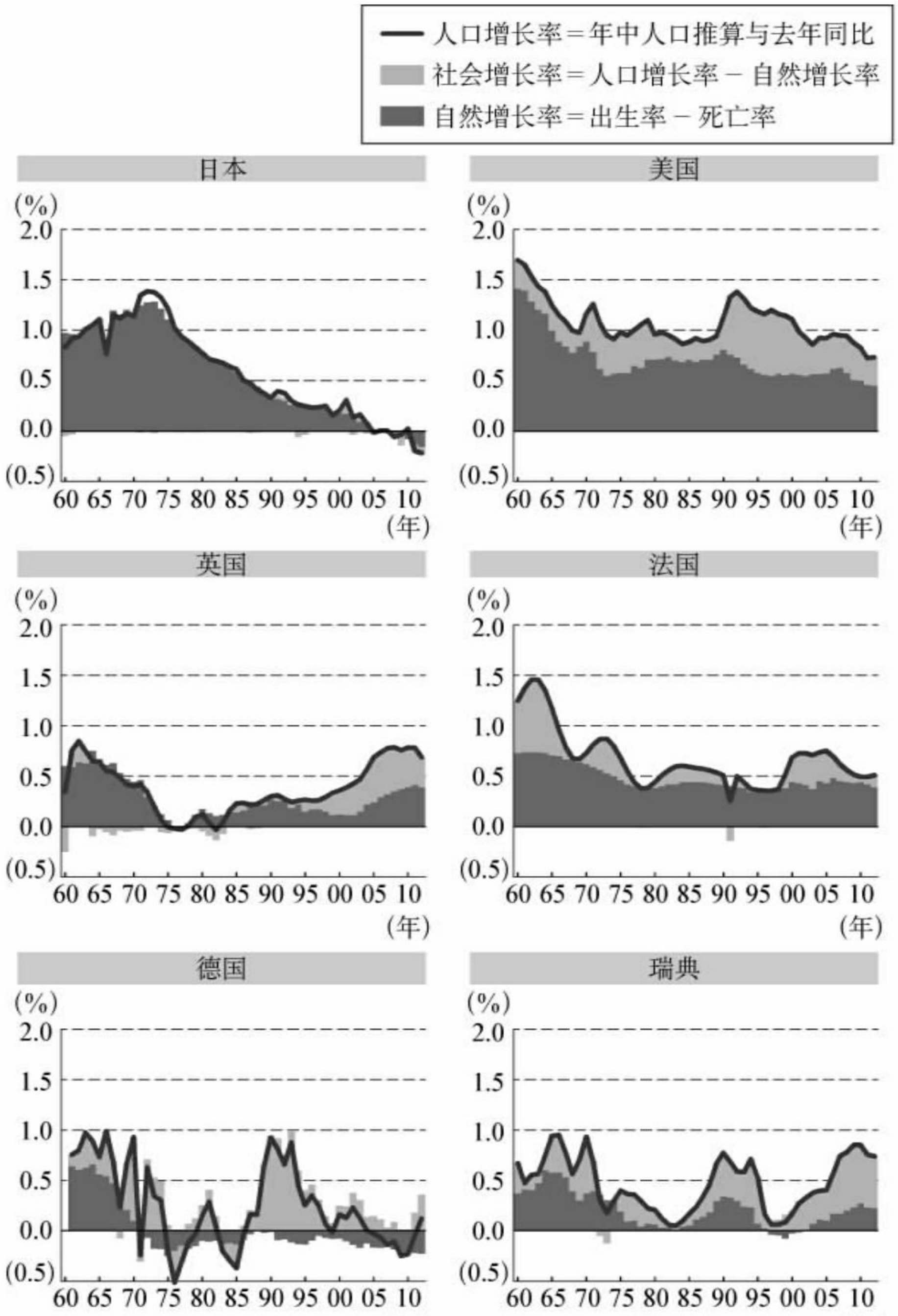
图表11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出生率排行居下位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各国总出生率（%，2012年）




图表12　除日本之外的发达国家，以自然增长或社会增长的方式增长人口

◆ 主要国家人口增减率变化




资料来源：World Data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国势调查》©BBT综合研究所

深色图块代表自然增减率，浅色图块代表社会增减率，即表示移民。从图表12就可得知，只有日本几乎没有接受移民，人口自然增长

率就转为负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都属移民国家，各有特点。

就美国而言，每年接受移民的同时，人口的自然增长也一直持续。英国最近增加了移民数量，也开始致力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法国因为接受移民引起了诸多问题，所以在人口数量上有所起伏，但可以看出致力于人口自然增长的决心。德国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呈负值，最近也从欧洲其他国家接受移民。瑞典也同样维持着移民政策，这几年来人口自然增长部分，也呈快速回升。

若再参阅图表13，大概就可明白日本式制度的特殊性了吧。这张图表汇总了有关少子化问题的各种指标。不同的实际状态从中可以得到解读："在日本，以平均年龄而言，女性婚后约过一年才生第一胎。相较之下，除日本以外的其他诸国，都有在婚前就怀孕生子的。""在日本，非婚生子比例极低，但在其他国家，则为三人中有一人，或两人中有一人是非婚生子。"

这是因为日本还保留户籍制度，有不认可非婚生子的社会背景。为此，就算婚前怀孕，也只能选择或是堕胎或是奉子成婚。其结果就表现出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此外，图表数据还显示出日本男性受困于长时间工作，无法参与育儿的实态。

**图表13　在欧美国家，即使是事实婚或单身母亲也想生育，政府提供丰厚的育儿支援**

◆ 少子化关联指标的国际比较

| | 日本 | 法国 | 英国 | 瑞典 | 德国 | 美国 |
|---|---|---|---|---|---|---|
| 女性平均初婚年龄 | 29.2（2012） | 30.8（2011） | 31.8（2009） | 33.0（2011） | 30.2（2011） | 25.8＊1 |
| 母亲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 | 30.3（2012） | 28.6（2006） | 30.6（2010） | 29.0（2011） | 29.0（2011） | 25.1（2005） |
| 非婚生子的比例（2008年） | 2.1% | 52.6% | 43.7% | 54.7% | 32.7% | 40.6% |
| 长时间工作者的比例（每周超49小时）（2012年） | 计22.7%<br>男性31.6%<br>女性10.6% | 计11.6%<br>男性16.1%<br>女性6.5% | 计12.0%<br>男性17.3%<br>女性5.8% | 计7.6%<br>男性10.7%<br>女性4.2% | 计11.2%<br>男性16.4%<br>女性5.0% | 计16.4%<br>男性21.8%<br>女性10.2% |
| 丈夫分担家务及育儿时间（2008年） | 1小时 | 2小时30分钟 | 2小时46分钟 | 3小时21分钟 | 3小时 | 3小时13分钟 |
| 政府对家庭关系的支出占GDP比例（2009年）＊2 | 0.96% | 3.2% | 3.83% | 3.76% | 2.11% | 0.7% |

*1美国的数据是从2006年到2010年的平均值

*2仅支出的数值，不包含税制相关的扣除额

资料来源：日本选择未来委员会《对未来的选择》　©BBT综合研究所

另外，各国政府对家庭相关支出占GDP比例来看，日本不到1%仅为0.96%。与英国的3.83%和瑞典的3.76%等欧洲各国相比，属低水准数值。

## 在法国，孩子越多津贴就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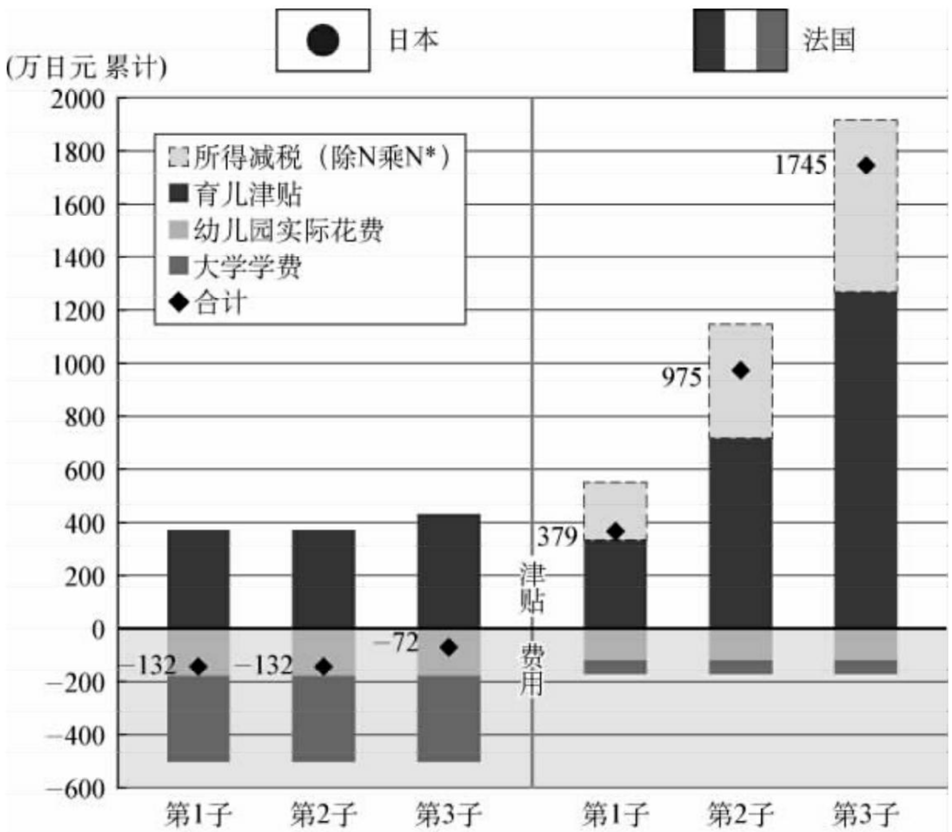
欧美各国为了鼓励国民多生小孩，逐步放宽制度，并且切实地编制预算。特别是法国和瑞典实施的各种家庭育儿政策，理应值得日本

学习。如将日本和法国就主要的育儿津贴和补贴费用作一比较，就如图表14所显示的数据（比较日法之间主要津贴和费用的较大差异）。

在日本，仅保育实际费用及大学学费这两项，每人需花费约500万日元。相对于此，政府育儿津贴则不足以支付这两笔费用。合计下来，每个家庭的实际支出要高于政府的补贴。而若是生育第三胎，虽然育儿补贴增加，家庭支出多少有些改善。但即便如此，仍然需要花费72万日元。

图表14　在法国，小孩生得越多，获得的育儿支援就越多

◆ 到成人为止主要育儿津贴及费用




注：比较日法之间差异较大的津贴与费用，不包括小学、中学、高中的教育费用及补习等费用。此为到成人为止的累计值，2012年的调查数据，以1欧元＝130日元换算。

除N乘N*：此为小孩人数越多所得减免越高的课税方式。将家庭户所得除以家庭人口数（N），计算出适合的税率后，再乘以家庭人数（N），得出纳税金额。

而在法国，由于大学学费几乎全免，家庭开销就能大幅节省。而且政府的育儿津贴，是随着第二、第三胎以及小孩数的增加，其金额也随之增加。透过所谓的“N除N乘”计算方式（这是一种育儿数越增加，所得税就越能减轻的课税方式。将家庭所得除以家庭人数N，计算出适合的税率后，再乘以家庭人数，得出纳税额），小孩数越多，所得税就越有减免。假设生有三个小孩，可计算出总额为1745万日元的家庭收支。这也就是说，在法国，生一胎就赚钱，生二胎更赚钱，

生三胎还要赚钱——这就是法国的制度。而就是这个制度，支撑了法国总生育率维持在2.0的水准。

说起来，早在四十年前，法国就实现了废除亲子关系中对非婚生子的差别待遇，导入了一种叫做“公民同居协议”（PACS）的制度。就算不结婚，但只要是长期同居的伴侣，也被认可与配偶者相同的社会权利。当然，政府会提供丰厚的育儿支持与家庭支援，包括生育与育儿津贴，聘用婴儿保姆的补贴或新学期补贴等。

另外，瑞典也在近四十年前，取消了非婚生子在法律上的差别，夫妇别姓与同姓的选择自由，离婚时赡养义务的分担等，也都依据法律来决定。无论是育儿休假制度，育儿休假期间的收入补偿，还是被称为“家庭保育所”的居家保育制度等，也都充实完善。

虽然日本在2013年才好不容易解除非婚生子在遗产继承权利上的差别，但整个社会至今还残存着对非婚生子的歧视，就连支援育儿的新财源是否能确保，目前也是个未知数。总之，日本在这些方面，与法国和瑞典有着很大差异。

## 问题多多的“个人番号制度”

每当思考少子化问题，户籍制度就是眼前的一大障碍。说起来，这个制度本身在今日已变得毫无意义。其最好的例证就是约有300人，把皇宫所在地作为自己的籍贯地登录。同理，将富士山山顶作为籍贯地登录，也有300人左右。倘若籍贯地迁移何处都被允许，户籍制就如同虚设。

以前的日本社会是以“家”为基础单位。在此基础上再明确地区分直系和旁系，重视亲属关系和长幼顺序是其特点。但如今推进中的小家庭化，也拥有多样的家庭形态。结婚成家，该居住地才应该成为登录的“家”，也就等于本籍，即可申请居民票。既然已经有了居民票，再个别登记户籍，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更进一步的是，日本还把户籍信息管理系统（居民基本网络系统）作为基础，导入了“个人番号制度”（指每位在日本有居民票的人，都会被赋予一个12位数字的号码。通称My Number。2015年10月开始实施并发放。2016年1月以后，在征税、社会保障以及自然灾害应对等方面使用该番号）。不过正如我在后面所要叙述的那样，户籍信息管理系统也好，个人番号制度也好，问题过多，白白浪费税金。我在二十多年前就主张把国民自出生后的个人信息全部数字化，建构由国家统一管理与维护的“公共数据库”。个人番号制度看上去与我的主张相似，但其实不同。实际上，在海外有些国家早已在推进与我的构想相类似的数据库。其中，波罗的海东岸三国之一的爱沙尼亚，真正实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e化政府（第四章将详述）。

相较之下，日本还维系着明治时代那套户籍制度。由于直到现在还在用片假名书写，再装订成册，才能进行户籍登记，因此也无法将户籍资料数字化。真可谓是前近代的“古董”。

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规范和影响着每个国民的生活方式？——只要看看各国如何应对非婚生子问题就会明白。在法国，由于法律上认可了非婚生子，1980年的非婚生子比例，仅有11%多一些，但目前已达55%以上。英国也属同样情况，1980年也只有11%的比例，但目前已接近五成。荷兰等国一开始更少，只有

4%的比例，如今则增至45%的程度。看来还是要制定制度，增加援助金额，作为结果来看，确实能阻止少子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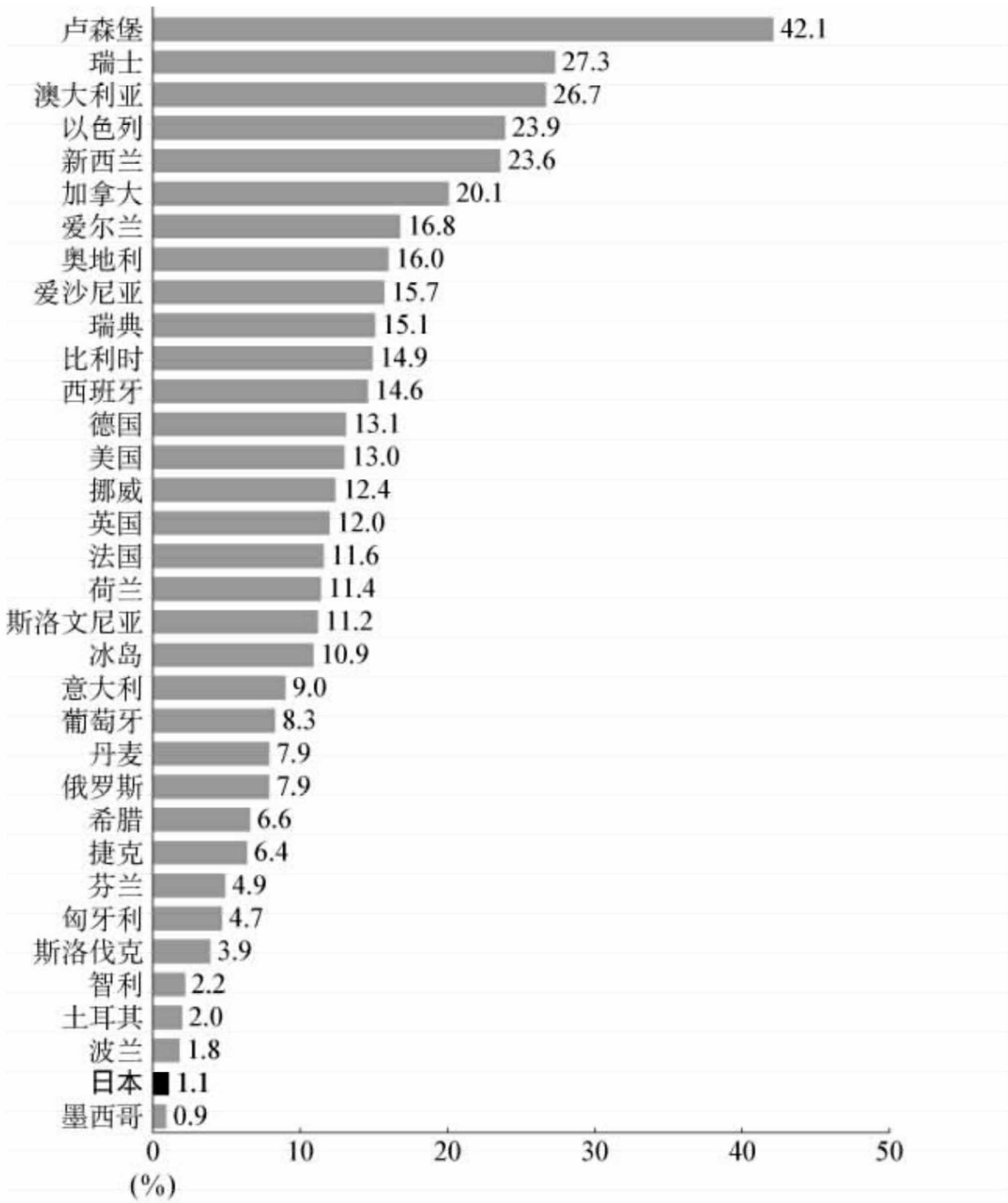
相比较这些国家，还不变地执拗于户籍制度、对少子化问题还无计可施的日本，指定它为世界遗产或特别天然纪念物，岂不更好？再加上因不能入户籍就不能结婚，故选择不公开的堕胎，推测可知，这类做法非常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 日本只有1%的移民比例

今后，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还是看不到有制度性的改善，同时也无法看到生育率的提升，为了应对人口减少，惟有接受移民这一条路。请参阅图表15。该图显示了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的总人口中，移民所占比例。卢森堡以42.1%排列第一。其次分别是瑞士、澳大利亚、以色列、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平均都超过20%。日本仅为1.1%，排行倒数第二。

图表15　日本接受移民状况在发达国家中垫底

◆ 经合组织各国移民的人口比率(2011年)




资料来源：OECD，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3 ©BBT综合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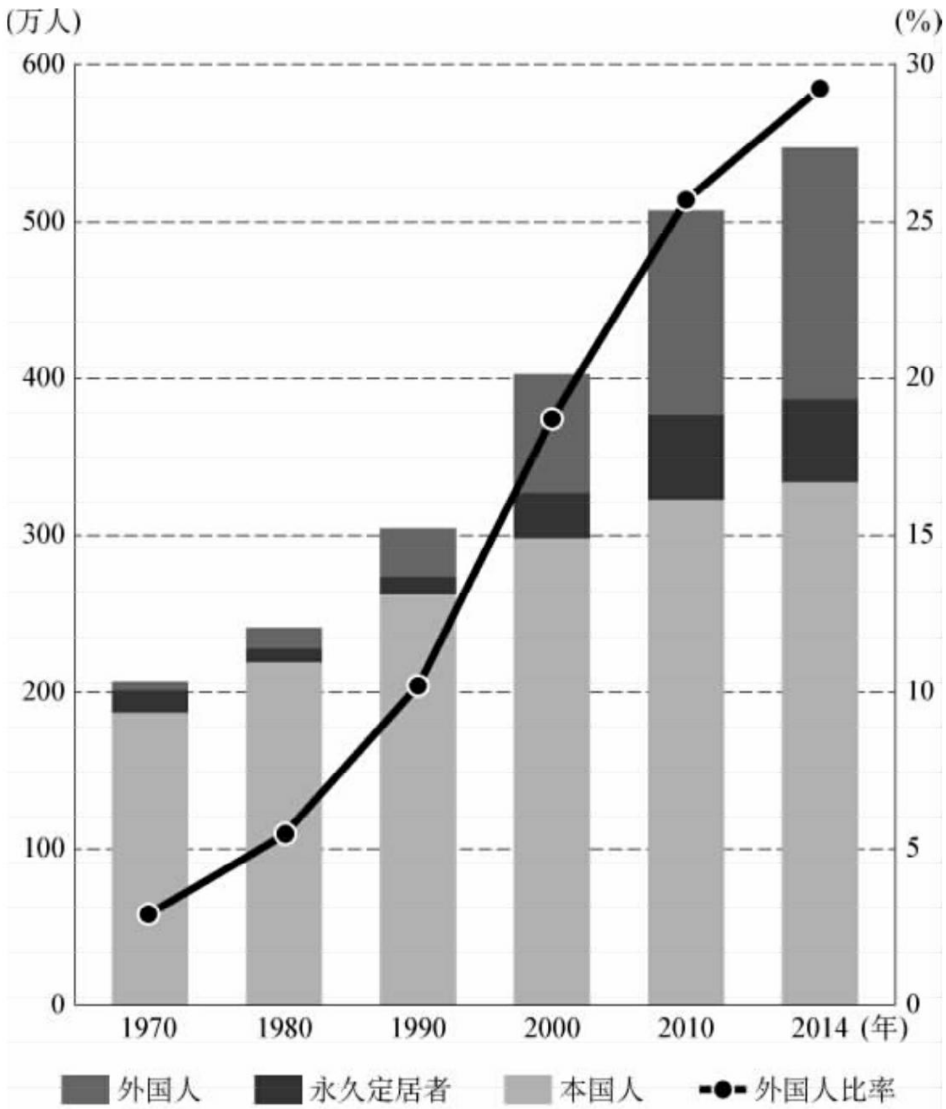
从逻辑上来看，若是少子化持续恶化，人口减少就无可避免。为了维持必要的国力，只有接受外来移民。尽管如此，日本仍然下不了决心。一方面国家借款在增加，另一方面偿还人则在持续减少，财政破产可以预见。倘若不愿意看到日本财政破产，只有将税金拉到吓人的程度，用税收减少政府债务，成为今后不再借贷任何款项的国家。

在积极接受移民的国家中，值得参考的是新加坡（参见图表16）。在新加坡，外国人的比例已破20%正在接近30%。新加坡移民政策的特点是：积极引进具有高技术和能力的外国人才。2010年引进数超过了17.5万人。此外，在劳动密集型方面，与雇主同住的菲律宾女佣也达到了28万人。很多新加坡人认为，菲律宾女佣存在的意义很大，她们说着独特的新加坡地方英语。这对喜欢凡事从得失面考虑问题的新加坡父母来看，让能说标准英语、又有宗教信仰的菲律宾女佣协助育儿，在教育方面一定会带来不少好处。另外，有了家庭育儿的助手，新加坡女性也能外出工作，有助于女性在职场中活跃。

另一方面，移民大国美国也几乎每年接受100万人的移民。移民带来人口增长，带来高技术人才，从而支撑了美国持续的经济增长。除还有相当数量的不法移民之外，美国的留学生人数也是世界第一。全球留学生的16.4%，都去了美国。

图表16　新加坡用接受移民的方法增加人口

◆ 新加坡的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BBT综合研究所

## 移民不是“人手不足的缓冲材料”

反观日本，留学生的比例为3.3%。其中大半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但中国人海外留学，是走以下顺序的：最优秀人才去美国，其次是英国，澳大利亚，再其次才是日本。

此外，一旦经济不景气，居住的外国人就不得不选择回国。现在日本接受的移民，只是作为单纯的人手不足的缓冲材料加以使用，政府并没有从长远的视野出发，思考移民政策。比如在英国，不但将移民分为五个阶段，并且还拥有完备的制度，足以让优秀人才能安心定居。但日本连这样的制度都没有。为此，一旦劳力市场人手不足，就临时雇佣；一旦劳力市场饱和，就遣返他们回国。日本曾经从巴西引进了为数不少的日籍侨民，但由于一直没有建立起长期的雇佣制度，当经济恶化，不再需要劳力的时候，这些人就遭到了闲时弃如敝屣的命运。

当今全球的竞争，就是看如何从世界各地招聘到优秀的人才。而从日本的现状看，由于还未能打造好接受移民的体制，因此无论经过多久，都无法募集人才。此前，我曾在《新·大前研一报告》一书中，倡导如下的国籍法：

“夫妻任何一方只要拥有日本籍，给予其子女日本籍。”

“夫妻双方均为外国人时，如其子女在日本出生，且在日本完成义务教育，给予日本籍。”

“对移民来日本的外国人，免费提供两年的日语、文化、法律、社会常识等教育，完成课程者给予永住权（类似美国的绿卡）。”

关于移民政策的具体方法，本书第三章还会再作解说。虽然我的这些主张都是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但日本政府却完全没有试图实施的打算。

倘若社会再不改变，人口动态数据所显示的未来，就会如期而至。但这绝不是突发之事，而是早已察觉之事。只要日本政府不废除户籍制度，不建置公共数据库，儿童数量就无法增加。而且从制度建

立到成果显现，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所以必须只争朝夕才是。然而，绝不能采用类似伤风感冒的所谓对症疗法，而必须把开放移民作为长期的政策，完善其相关体制。

## 10年前的分析就是今天原封不动的现实

象征“低欲望社会”的人群，如同前面论述过的“FLAT35”，是指就算面对冠有“超”字的低利息，也不为所动的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以及婴儿潮（中坚）世代。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情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10年前就再三指出过了。

比如，我曾把从2004年开始连载的文章，编辑加工成《工薪阶层再起动指南》（2008年由小学馆出版）一书。在书中，我把这群人称之为“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极简生活”世代，并对此加以分析。

当时令我吃惊的是，这群人和过去的日本年轻人，其行为举止完全不同。较之“拥有物质”的欲望，他们几乎没有欲望。不仅是物欲全无，连出人头地的欲望也变得淡薄。当时的一个调查表明，新进公司的员工想当总经理的人只有10%左右。我把这群人定义为“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他们的特征表现为“只用手机与这个世界联结。与朋友联系用手机，各种信息的获取用手机，连电视节目也用手机看”。即使同属于发达国家的欧美各国，也完全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这可谓是日本独特的现象。

另外，这本书还谈论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另一个背景，即便利店文化的扩张。

"'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这个前所未有的群体出现，使日本的消费市场寒流袭来。这一世代很可能无法成为新大陆时代的经济推手。

"在我看来，与过去日本人价值观截然不同，这一群体的横空出世，其实与便利店的普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便利店创生出一天只要500日元就能解决温饱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一天只需500日元一个硬币，在便利店买饭团、面包或便当，吃个一两餐便能生存下来。对自由职业者或尼特族来说，并不像上班族那样有规律的时间概念，也没有早中晚的节奏。肚子饿了，就在便利店买上便宜的便当充饥。有很多人都过着这样生活。如此这般，就算手头宽松些，一天1000日元的食费，也就足够——总之，现在的日本，借各地到处泛滥的便利店文化之光，不会再有饿死人的危险了（特殊事例除外）。"

## 赶上泡沫经济的父母是"反面教材"

在《工薪阶层再起动指南》这本书中，我还论述了消费经济的低迷加速了低欲望社会的形成，以及商业模式转换的必要性。现在看来，当时言及的某些危机，大体都言中。

这也就是说，在倘若无路可走也能活下去、"生存条件"变得很差的社会里，一旦对时尚、汽车、住宅等既无物欲也不想拥有的话，人类生产活动所需要的"驱动力"就会丧失殆尽。从自然界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在食物丰富的环境里栖息的野生动物，就算被动也能轻松存活，所以生出怠惰。而在食物缺乏的环境里栖息的野生动物，如不主

动觅食就难以存活，所以生出勤勉。与此相同的是，在每天只要1000日元就能生存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除非自己有很强的上进心，否则就变成“低欲望”世代。我认为，这或许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当时，我就曾设问：这些年轻人变得“低欲望”，是否也受父母成了“反面教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辈，正好是赶上泡沫经济时代。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拥有欲和发迹欲，他们只知道使足浑身劲干活。为此，在这些年轻人的眼里，父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属于“经济动物”。虽然表面看，父母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实际上被房贷压得难以透气，现实生活并不轻松。夫妇之间也几无情趣可言。只顾埋头工作的父亲，为了在公司出人头地，早出晚归，难以顾及家庭。自己不想成为父辈那种样子，不要过于辛劳工作，而是活得自在悠哉——据我的分析，年轻一代或许有这样的潜意识。

于是，“低欲望”年轻一族的出现，给企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我认为更应纳入问题而视的是，这绝不是泡沫破灭后的暂时现象。这些年轻人的后代，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持有与此类似的价值观。虽然我曾为此敲过警钟：日本企业必须确切分析他们的意识和行为模式，准确地把握他们的价值观，有必要重新推敲与此相吻合的市场策略、商品策略、贩卖策略——喔，不，还有商业模式及其本身。但我认为，从结果来看，能应对这些变化的企业恐怕不会很多吧。

## “高龄产妇”和“奉子成婚”也在增加

我在编撰《工薪阶层再起动指南》这本书的时候，这批“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还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如今已接近35岁了。这些人与比他们大上十多岁的所谓‘泡沫世代’相比，心理状态有很大的不同。我甚至还分析过他们在男女关系的想法上是否有变化，但我发现，从倾向上看，没有大的变化。

“与如今20岁出头的‘极简世代’相比，年长10岁的30岁出头的世代，如同异种人，拥有旺盛的物欲和发迹欲。同样是日本人，为什么相差10岁就有如此不同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观呢?

“我分析原因在于，如今二十多岁的一族，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充斥负面信息的所谓‘失去的十年’里，度过了多愁善感的少年期。而如今三十多岁的一族，他们度过的少年期，恰好是泡沫经济最鼎盛时期。这种差异是否就是导致两个世代的人，在其心理状态和价值观上的巨大不同？总之，如今二十多岁的年轻世代，并不看好未来的玫瑰色。他们有着这样的心理‘印痕’：一定要为‘万一’做好准备。除此之外，就难觅其他可以为之的解询之道了。

“日本的年轻人还有一个‘男女落差’的大问题。最近，20岁过半的男女年轻人与过去相比，未婚者增多。不过，在我们那个年代，20岁过半结婚则很普遍。只要性情相宜，即使手头拮据，也会成婚。女性也认为男性手头拮据属正常。因为结婚本身就是即便没钱但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事。家庭就是从最低起跑线开始，二人携手，慢慢共筑未来。

“然而，如今的女性，操握着结婚与否的决定权。她们不会与没钱的男性结婚。男性当然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拼命地节俭，拼命地储蓄，为结婚作准备。到准备完结为止，不惜一再推迟婚期。据我的调

查，男性结婚年龄与收入呈函数关系。虽然现在男性平均婚龄为34岁，但收入越高结婚越早，收入越低结婚越晚。无积蓄的男性，就没有女性愿意嫁给他们。”

这样，从女性角度来看，父母的生活水准，成了她们的参考标准。若与父母同住，无论吃喝开销都能随心所欲，所以与贫困男同住狭小的公寓，降低生活水准的事，她们就碍难从命了——女性们常有这样的心态。

问题在于，单身女性制订这样的结婚基准，使得手头拮据的男性难以求婚，暂且只能一个劲地存钱，备妥生活所需。此外，由于日本长期处于就业冰河期，企业扩大非正式员工的雇佣，使得男性啃老族也有所增加，他们变得越发“宅”于家中。

一方面是男性为正式结婚迟迟难以完成准备，另一方面又有渴望结婚及成家立业的当然需求。其结果，婚期延迟，高龄产妇增加的同时，再加上先前提及的户籍限定等原因，选择堕胎或“奉子成婚”的情侣，变得更多。这些倾向性问题，我们在10年前就有所察知。

尽管在那个时候，我就提出今后应对的课题，但几乎被搁置至今。如此而言，这个国家在低欲望社会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也是理所当然的。

## 日本年轻人当中广泛流行“穷充”

据说，如今日本年轻人当中，成为话题的流行新语就是“穷充”（poor并充实）。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金钱和出人头地而辛苦工作，

正是因为收入不高，才能过上心灵富足的生活。不过，从有着类似倾向的其他国家来看，这个“穷充”的社会现象，是难以持久的。

比如，1980年代的瑞典，虽然成就了高福利社会，但换来的则是国民租税负担率提升近80%。经济方面从1991年开始，破纪录地连续三年呈负增长。在重税下喘息的国民，只能看淡人生，说“小国寡民，再拼命也白搭”，“就算没有钱，也能过上好日子”。当时，瑞典年轻人还冷嘲热讽陷入工作狂的日本人：“太辛苦啦”“不想成为这样的国家”。他们甚至还谈论到了自己国家的军队，说“军队也应该和我们一样，八月份需要休假”。邻国丹麦也是同样的状况。

英国在1970年代，也陷入同病相怜的状况。虽然成就了“从摇篮到墓地”的高福利国家，但社会因此失去活力。基础产业国有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国际竞争力的丧失，成为“夕阳西沉的大国”，人均国民所得年年减少。胸有大志的英国年轻人，只能远赴美国决胜负图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英国病”。

但是，这些国家的“穷充时代”，都好景不长。如果整个国家都蔓延着“穷开心也不错”的气氛，那么这个国家最终会沉没。因此，当今所有的国家都大力支持在职员工，致力于推出能激发他们劳动意欲的政策。

## 北欧国家为何得以重生?

过去，在瑞典或丹麦这些国家，再怎么努力干活，由于税金太高，实际到手收入并无增加，因此年轻人对未来不再抱有憧憬。其结果，他们迷醉于日常的颓废之中，用今天的日本新语来说，就是“穷

充”。年轻人不再追求积极进取，社会进步因此陷入停滞。特别是瑞典，由于法人税和所得税高得离谱，有能力的企业和富裕阶层都纷纷逃往海外。

利乐集团（Tetra Pak）是从事食品加工处理和纸容器填充包装系统的全球性企业。在1981年，与从事重电业务的阿西亚（现ABB）和瑞士的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Brown Boveri）合并。以此为契机，利乐集团在1988年也将总部迁离瑞士。诺贝尔奖创办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建立的化学公司诺贝尔（现Akzo Nobel），也在1994年与荷兰的阿克苏合并。与此同时，也将总部移至荷兰。在个人方面，以瑞典著名网球运动员比约恩·博格将国籍移至摩纳哥（现又改回瑞典籍）为开端，包括被称为“欧洲第一富豪”的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等许多有钱人，都不堪重税，选择放弃自己的国家，远走高飞。

国民的社会负担过重，发展无法再前行的瑞典，如果没有大的变革，别说福利这一块，整个国家都恐将陷入危机状态。为此，从90年代开始，瑞典大幅度地下调法人税和所得税税率，制订全球化人才培养的计划，致力于领袖人才的精英教育。总之，为了恢复国际竞争力，实施了各种改革。

此外，由于依靠年金生活的高龄者与支撑年金制度的年轻人之间，容易产生世代冲突，政府为此对年金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 不提升技能就会流落街头

在过去，瑞典养老金发放金额的计算方式是：事先决定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再配合金额数调整在职员工所负担的金额。这种计算方式叫“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Defined Benefit Plan；DB）。

虽然日本现在也采行相同做法，但这种做法会让在职员工变得不愿再缴纳养老金。因为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为了现在的老人而背负重税”。

也因此，瑞典政府着手改制，以“定额养老金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DC）为基础，导入加以计算的“国家定额养老金”（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NDC）制度。

这个制度的优点在于，自己现在缴纳的保险金额，与将来老后能领取的金额相连。借此改革，瑞典政府成功地阻止了年轻人远离养老金的倾向。另外，瑞典政府也断然实施了削减老年人在医疗等方面福利的做法。

在雇佣方面，为了强化企业竞争力，瑞典政府将原先确保员工权利的政策，转换成企业可以轻易解雇多余员工的政策。针对被解雇者，政府的替代做法是提供职业培训，使之能够再就业。

如果员工抱有“穷充也不错”的心态，因为技能不足被企业视为多余者而遭解雇，若既不接受职业培训，也不提高技能，就会流落街头。瑞典政府成功地从制度面加以切换，并让国民明白：当今社会，穷充根本无法生存。而像日本那样，即使不打磨自己的工作技能、只要死赖公司就能有饭吃的环境，在瑞典不复存在。正因为看到了瑞典政府这些成功的改革，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终于在2013年又回到了瑞典。

英国的情况稍有不同。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断然实施金融市场的宽松政策，国营企业民营化，那些在全球化竞争中难以生存的企业，不得已转卖给海外企业。一切都回归至资本主义原点。至此，胜利组富裕阶层与失败组低所得阶层，两极分化的现象在英国产生。穷不再“充实”，穷就是“单纯穷”。也正因为如此，撒切尔夫人至死都遭到了低所得阶层的憎恨。而这些“单纯穷”，也造成了如今英国社会不安定的一个要因。

## 日本人大家都在“穷充”?

反观日本现状，泡沫经济破灭后，遭遇了“失去的二十年”的增长停滞期。人们再怎样的努力，都无法获得职务的提升及工资的上调。即使好不容易获得提升，也只是变得超忙而已。因此，作为个人的生活方式，人们选择“穷充”，也属无可非议。

这十多年里，日本不管哪个所得阶层，其实际年收入都减少了约100万日元。即便如此，日本也没有发生抗议游行或暴动。因此，人们或许多少有点接受这个“穷充时代”。但是，多数人都认为“穷充也不错”的社会，一定是活力丧失的社会。这是因为“穷充”的人数越增加，能够创生出附加价值的人数，理所当然地就变少。

而且，由于穷充一族大都不需缴纳税金，因此只能净增社会负担。若国库还有储蓄，不管怎么说，或许还能维持生存，一旦国库储蓄见底，到处充斥穷充一族，也就是国家破产之日了吧。问题是，若要维持现有水准的行政服务，就必须上调能够负担税金的大企业或富

裕阶层的税率，而这又会出现当年瑞典的一幕，大家都往海外逃离。这也表明，“穷充”也能小确幸的时期，真的非常短暂。

为此，日本的“穷充时代”也是不会长久的吧。我认为，或许比瑞典、丹麦、英国更短暂，充其量在数年间就会结束。明明是在靠勤劳的员工，维持着社会运转的成本，但不想负担，拥有得过且过心态的人却不断增加，这样的现象是不可能长久的。

那么，今后的日本将何去何从？能像瑞典那样大胆改革吗？或者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用强势的领导力推动改革吗？感到遗憾的是，日本在这两方面都难以期待。最为可能的日本未来，或许会像西班牙或葡萄牙那样，慢慢地被拖垮没落。或者，整个国家走“夕张化”（北海道夕张市的城市破产）与“底特律化”（美国底特律市的城市破产）的破产之路。这是因为，在如今的经济政策中，政府完全没有能够提出解决之策。

## 草食化的年轻人与活力满满的老年人

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欲望在不断萎缩，另一方面则是活力满满的老年人引人注目。在日本，领导者或企业高层的高龄化，已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

举例而言，就任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会长，同时也是前首相的森喜朗是77岁；经团连（全称为经济团体连合会）会长榊原定征是72岁；担任安倍首相战后谈话专家学者会议主席，同时也是日本邮政社长的西室泰三是79岁；就任特定秘密保护法情报保全咨询会议主席，同时也是读卖新闻集团总公司会长兼主笔的

渡边恒雄竟然是88岁；特地访问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演讲的前首相、社民党的村山富市更是90岁的高龄（年龄均为本书执笔时点为止）。

人的能力或领导能力不单纯是年龄的问题。我已经72岁，还在第一线工作。自己这样说可能有点可笑（我无公职在身，反而能直言），日本到处是老人管理高层或老人领导者，可以说这种“老人公害综合群”，才是今日日本所面临问题的症结所在。

日本是个长寿国。据2013年的统计，女性平均寿命达86.1岁，世界第一；男性平均寿命达80.2岁，世界第五位。高龄者健康且充满活力是日本社会一个趋势。我曾经参与运营过的活力银发村“智能社区稻毛”，入住者其实既健康又充满活力。他们乐于享受各种活动，诸如陶艺、茶道、插花、书法、社交舞、夏威夷草裙舞、高尔夫、网球、慢跑、钓鱼、围棋、将棋、卡拉OK、家庭菜园等。他们虽然已退休，却完全没有给人“老年痴呆或老态龙钟”的印象。

长寿的日本人，65岁退休，平均还有15—20年的第二人生。为了能在这段时期朝气不衰地生活，必须要有某些目标或刺激，以及要有朋友。但工作时代生活圈在郊外的人们，则很难取得这些资源，因此，今后类似活力银发村的设施，会越发变得有需求。

高龄者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有时间而生出闲暇的问题。特别是以前只专注工作而少有闲趣之人，一旦退休，就会有大量充裕时间，很多人想再回归职场。而像过去那样逍遥自在，一心想沉浸于幽静的晴耕雨读生活的，则成了少数派。至于有钱人，即使投资也是为了赚钱。故与其视他们为天使，还不如称呼“恶魔”来得更到位。说到底，

今日日本人的国民性，无非就是趁还有活力时，像小白鼠一样，来回忙碌个不停。如不这样做，就有不爽之感。

与此相反的是，从年轻人到中生代的“草食化”现象，却在不断地扩大之中。正因为如此，一些有空闲且尚有活力的老年人，总是有求必应，立马接受担任某些组织或委员会等的高层职位。毫无疑问，这种非正常模式，今后将会越来越多。

## 日本难以变革的最大元凶

问题在于，这些老人高层最终也只不过是“摆设”而已，他们自己并没有挥汗大干。

比如，在政府的咨询会议或经济团体中，官员或非官僚的“民僚”，都会事先准备演讲稿，供老人高层照本宣科。他们在发言的最后，只要不痛不痒地总结一下，“这样是否就可以通过了”——即可。总之，毫不为过地说，这些人并不是在工作，而是扮演着业余“主持人”的角色。

在欧美国家，几乎没有民间企业的高层主管担任类似职位的事例。他们退休后或者是移居温暖且风光明媚的地方悠闲自得地过着老后生活，或者最多担任财团法人的理事或学校的董事，热心社会的文化活动或慈善活动，或者干脆做一名天使投资者。

在日本，大多数自己创业的社长（总经理），也都与财界活动保持距离。比如，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本田技术工业的本田宇一郎，雅马哈公司的川上源一，欧姆龙公司的立石一真等，他们当中谁都没有成为经济团体的成员。就我所知，自己起家的创业者们，若与

财界交往，都有一种“饶了我吧”的感觉，都有一种如果参与了财界活动，人生就完蛋的感觉。唯一例外的恐怕就属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他抱着“必须为日本干点什么”的想法，以成为经团连会长为目标，奔走于世界各地。

反过来看，我们发现，曾经热心参与财界活动的都是一些受雇社长。如担任经团连会长的东芝公司出身的士光敏夫，原旧/新日本制铁公司出身的稻山嘉宽，丰田汽车公司出身的奥田硕，以及就任关经连（关西经济连合会）会长，原旧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出身的日向方齐等。与创业社长不同，这些受雇社长一旦结束任期引退后，原先围绕身边的侍奉之人没有了，会顿生寂寞感。所以，尽可能赖在公司不走，或者致力于财界活动，企图守住待遇上的三点组合：个人办公室/秘书/专用车，并继续享用VIP待遇。有这种打算的受雇社长，还真不在少数。

目前，除创设新经济联盟，担任代表理事的乐天公司（Rakuten）的三木谷史之外，迅销集团（Fast Retailing）的柳井正，软银集团（Softbank）的孙正义，日本电产公司（Nidec）的永守重信等多数创业社长，都是以本公司业务为主，一般不介入财界活动或自己专业领域外的事。与其有时间关心他人事务，还不如把这个时间用于让自己公司更好地成长上。我认为，这些人才是日本传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者。

话虽然这么说，但身为老人大国的日本，有请必应、越俎代庖的老人高层或高龄领导者，今后只会多不会少吧。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老人社会特有的物理现象，不过依旧属于不正常现象。同时，这也正是“日本难以变革”的最大元凶。

如果老人们连挥汗的觉悟和体力都成问题的话，赶快让路给有志改革的年轻人。自己在余生享乐的同时，平静地让自己的生命之树慢慢枯寂，这才是所谓的“老人美学”吧。至少谁都明白的一点是，绝不能将“低欲望社会”问题的解决，委任给这些高龄领导者们。

我在下一章，将详细探讨安倍经济学的问题所在。

---

(1)　指1947年至1949年日本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人群，推算有八百多万人。



# 第二章
# 政府的极限
# 时刻防备“安倍经济学冲击”

## 在政策上有招数已尽的感觉

如前所述，日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减少和低欲望社会现象。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并未推出有效的能应对现实的方案，反而继续采取让事态深刻化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

2012年12月的众议员选举，接着是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安倍政权均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并成功消解了“扭曲国会”（指执政党在众议院过半数，在野党则在参议院过半数，从而造成国会众参对峙的局面）的问题。再加上2014年年底打着“安倍经济学”旗号的选战也取得胜利，安倍政权可望长期持续至2018年任期结束为止。但在我看来，事实上针对安倍政权的逆风，正越刮越猛烈。

这是因为安倍首相看重政权运营的“初次起跑速度”，有一种过早地祭出手中政策选项的感觉。这就是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还有就是“修宪”。

关于修宪，虽然安倍首相说这是自己的“历史使命”，但反过来，我们看不到他对修宪以外其他政策的看法。今后就算绞尽脑汁，恐怕也只是推出一些无实质化的政策吧。况且，“三支箭”悉数失败的可能性很高。至少前两支箭，今后会越发显现出负面效果。

## “第一支箭”陷入懦夫游戏的状态

首先，第一支箭“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不但难以看到退场机制，而且还提升了日本央行内部崩溃的风险。为了压低利率，日本央行在2013年4月决定，每月从金融市场购入7万亿日元的长期国债。此后，狂购国债的步伐就未停过。在得知日本央行这个利好消息后，市场上持续出现远高于投标总额的应募个案。其结果，日本三大主要银行（指三菱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瑞穗银行）的国债持有余额大幅减少。泡沫经济破灭后，为应对政府的要求，金融机构出于无奈背负的这个国债重荷，总算能欢喜过望地纷纷卖给日本央行了。

不过，正如我早前就反复指出的那样，日本国债的发放量，已超过GDP总额的两三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上风险最高的国债。这对今后更朝着少子化、高龄化推进的日本而言，国债当属无力返还的庞大借款。

通常而言，央行买入国债，会选择偿还期在五年之内的。这是由于短期内返还持有风险较低。但现在的日本央行，则不论偿还期限长短，只要是国债就买入。日本央行开始背负预期中的国债暴跌风险。今后，是国债暴跌（日本央行破产）先发生，还是经济出现戏剧性的回升，让现行的“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体面退场先发生？日本政府陷入了所谓的“懦夫游戏”（chicken game）状态。不过，迎来后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可能性则非常低。

## “第二支箭”的经济对策效果何在?

安倍经济学的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看来这也是难以企及的。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本已经没有钱了。

安倍内阁曾表明，必须承袭历代内阁的目标，做到“2015年度国债赤字减半，2020年度基础财政收支扭亏为盈”。这也就是“维持财政规律”。但若要守住财政规律，就必须跳出财政对策的框架。虽然安倍首相说要在有限的预算中，变更优先次序，但政治家若能言行一致，早该不会无谓地乱花钱了。预算必定要用在“能获得选票的地方”，这一情况将还会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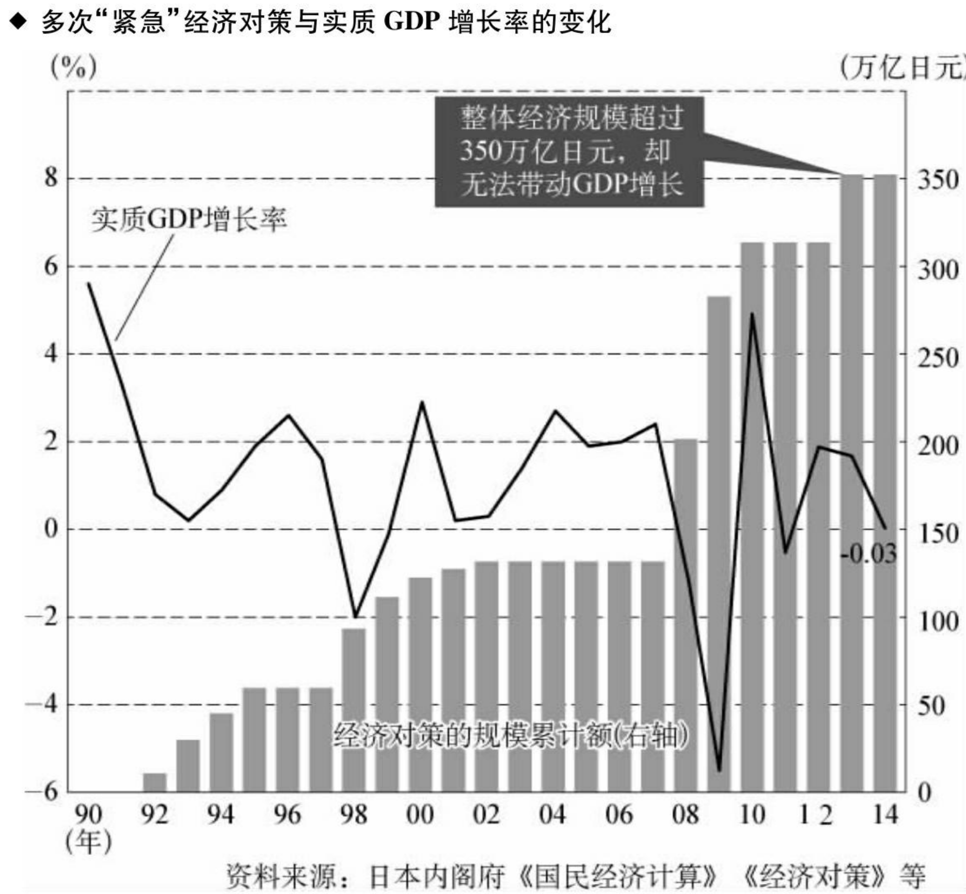
虽然自2014年4月起，安倍政权特例将70—74岁的医疗自费部分，由现行的10%上调至20%，但如此小幅微调，无法避免财政的破产。为了维持财政规律，防止国债暴跌，只有将消费税从事先预定的8%上调至10%。甚至在不远的将来，有必要调高至20%以上吧。依据内阁府的试算，就算将消费税上调至10%，到2020年，也无法将基础财政收支扭转为黑字。

但是，安倍的智囊们又在担心一旦上调消费税，就会断送好不容易有些起色的消费市场。于是他们建言要像尺蠖一样慢慢爬行，每年只提高1%，或等到市场景气完全恢复后，再上调消费税。最终，原定于2015年10月上调消费税，被安倍首相延至2017年春季。虽然安倍在国会大选时喊出“唯有这条道路”的竞选口号，但也只不过是单纯延后问题，把沉重的债务留置以后再处理的滑头做法。果不其然，在2016年夏季参议院选举之前，安倍政权又下决心将上调消费税再度延期。

2012年度，安倍政权以追加预算等方式，筹措出超10万亿日元的金融支援财政政策，但就是不出效果，好像石落水池，就是波澜不惊。之后在2013年度提出5.5万亿元日元，甚至在2014年度又提出3.5万

亿日元的追加预算充当经济对策。这三年间，总共约投入20万亿日元的税金，但经济回升的效果又如何呢？人们还是存有很大的疑问（参见图表17）。

图表17　日本经济再次呈现负增长




## 不带动任何增长的“第三支箭”

至于第三支箭“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说句并不为过的话，就是至今没有带动任何的经济增长。比如，安倍首相自己多次强调“医药品的网上贩卖”，但市场规模不会因为网络销售而大幅扩展，医药品

的贩卖也不会翻倍。这样做的结果只是让药店和网上虚拟店抢夺有限的大饼而已。

此外，政府的“放宽大都市圈建筑的容积率”政策也令人难以理解。以前我也曾提出过，作为刺激经济最为有效的一个对策，就是放宽容积率和建筑面积率。日本政府现在提出的“大都市国家战略特区”设想，是将高架道路上方的空中权，转让给两边的建筑，用以增大该区域的建筑容积率。政府的事先宣传还包括能更便利地建造高层建筑，充实外国企业及商务人士的入住空间，提供便于工作的环境等。但是，若真打算放宽限制，就不该设置如此麻烦的条件，全面放宽容积率才是政府对此事动真格的标志吧。

就其结局，在我看来，安倍首相的“赏味期限”已过。射出的三支箭，遗憾的是全部脱靶。日本经济失速的症候，日趋显著（参见图表18）。

## 不懂得经济本质的安倍首相

如前所述，虽然安倍首相再三强调“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能带动经济的增长，但国民切实感受到的则是实体经济的恶化。我在该书的《前言》里介绍过，长野县停车场经营者说，从客人往投币机里投入的钱币种类，便可察知市场经济确实很糟糕。当然还有自己深感吃惊的体验。在加油站，我不假思考地说“加满”。工作人员则略感惊讶地说：“最近都是加10升汽油，或加1000日元份额的客人。”这些状态，正如我当初多次指出的那样，是安倍首相和协助他的经济学家们判断失误所致。

**图表18　安倍经济学的目标全数落空**

| 安倍经济学“三支箭” | 主要政策内容 | 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问题点 |
|---|---|---|
| 第一支箭<br>大胆的金融政策 | ● 货币宽松政策<br>● 通膨目标 | ● 无法增加贷款额（因低欲望社会）<br>● 日本央行内部风险升高（因买入国债）<br>● 日元贬值负面弊端大 |
| 第二支箭<br>灵活的财政政策 | ● 公共投资<br>● 国土强韧化政策 | ● 公共工程过多，尽显人力不足、原材料价格高涨等负面情况<br>● 财政走向恶化 |
| 第三支箭<br>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 | ● 地方创生<br>● 特区<br>● 女性走向社会 | ● 伴随财政恶化，采用乱撒钱政策<br>● 特区等可叹的放宽政策 |

● “增长战略”到出效果为止，需要很长的时间
● 从废除规定到出现成果需要 10 年至 15 年时间（从撒切尔夫人到布莱尔，从里根到克林顿，都耗费了很长时间。）

资料来源：内阁府《SAPIO》报道文章　©BBT综合研究所

尤其是主导安倍经济学，担任首相的经济政策智囊团，内阁官房顾问兼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浜田宏一，静冈县立大学教授本田悦朗，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策划者”的自民党山本幸三众议员们，他们的罪过不轻。

浜田宏一他们借由日本央行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带动日元贬值股价上扬。然后将这些视为安倍经济学的成果，并大肆向国民宣传“对日本经济的复苏抱有自信是好事情”。但在我看来，仅靠金融和财政政

策，市场景气不可能出现想象中的好转。我对上调消费税更持反对立场。此外，浜田宏一与本田悦朗还特地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请来，引见给安倍首相，让他建言延后增税的必要性。

不过，由于实施“异次元货币宽松”，现金哗哗地流入市场，日元贬值是其必然结果。结果形成通货膨胀。但现状是物价上扬薪资不涨，实际所得有所下降，招致消费低迷，陷入恶性循环。这样来看，日本如今消费低迷的诱因，明明是安倍经济学所引起的，但浜田与本田一看风向不对，便把问题束之高阁。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为了设法让经济回升，断然实施“黑田火箭筒第二弹”（意指加码宽松政策）。但这就如同原本想治疗低血压，不料血管收缩超过想象，致使血流循环变差，于是慌忙地开始输血和心脏按摩。

不过，这些原本就不需要治疗的。

## 20世纪的处方已经不适用

我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低欲望社会”。明明个人拥有17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企业拥有380万亿日元的内部保留金，但就不想使用这些钱。这样的国家，世上绝无仅有。即使贷款利息连1%都不到，却无人借款；就算是史上最低、不满2%的35年固定利息，申请房贷的人，也未见增加。这是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经济状态。因此，若还是用金融政策或财政政策刺激市场景气这个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处方，对当今日本，已经变得不再适用。这是克鲁格

曼教授，或是美国经济学的“进口学者”浜田宏一等人，完全无法理解的。

目前欧美各国再兴凯恩斯热。比如，2014年11月3日发行的《彭博商业周刊》，凯恩斯上了封面照，并推出“当今世界期盼凯恩斯”的专辑。另一方面，克鲁格曼教授则在批判过于拘泥财政规律、对财政政策犹豫不决的欧美政府，并同时批判欧洲央行过早上扬利率，支持日本异次元货币宽松和财政政策。

此外，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的G20（2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首脑人会议）会议上被采纳的首脑宣言中，更是加进了“在2018年之前，G20全体GDP上扬2%以上”这个最新目标。总之，“大家都将投入公共投资，以经济增长2%以上为目标”。

但就目前的日本经济而言，就算在货币宽松和公共投资上再撒更多的钱，但如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经济就难以提升。这也就是说，日本迈入了迄今为止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阶段。换言之，日本要借由中央政府的金融政策或财政政策，让国民欲望复活，从而扩大消费，已是永无可能了。

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度里，至今还在乱用只适合于欲望和野心时代的20世纪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正是安倍经济学。

## 应该改变的“国家构造”

重新整理日本的问题点，就会发现个人金融资产或企业内部保留金并未流向市场，处于一种“腌制”状态，也并未带动任何的消费和设

备投资。日本央行便出损招，持续从金融机构等处买入国债，目前已持有360万亿日元以上的国债，相当于GDP的60%。

将国债卖给日本央行后，银行过剩的现金却没有贷款人，于是只能用现金购买股票。在政府维持股价政策下，就连养老公积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PIF），也向日本央行卖出国债增持股票。而且还专门瞄准日经225等指定股，股价指数因此上扬。不过，这并非真实地反映了企业业绩或经营状况，只是股市的虚假繁荣。

另一方面，政府在2016年度的预算一般会计岁出总额，达到了史上最高的96.7218万亿日元。由于“三支箭”的总和也难以承担这个重任，安倍经济学便乘机打出第二弹——“新三支箭”，但这些都是远离现实的经济政策。即便再如何追加预算和反复出台经济对策，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乃是日本的实情。

若要摆脱这个窘状，看来要么发起战争，要么削减四成的年度预算，或者要么就将消费税提至20%。至于折中方案，如能否暂时先将消费税提至15%，削减两成左右的年度预算等，对政治家们来说也是难以办到的。因为必须要将官员从五人中削减一人，这恐怕会招致强烈的反抗吧。

就根本的解决方策而言，诚如我在25年之前就建议，只有导入道州制，将这个国家的构造（统治机构）由中央集权改为地方分权。但问题在于，只要目前的中央官僚体制存在一天，这一改革就无法实施。除非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振臂亮相，打破这个局面。日本人的特性在于，就每个个人而言，虽不乏相应的问题意识，但一旦聚合形成集团，就喜欢“避难就易”。如此类推，要想改变这个国家的构造，似乎

只有先暂时放弃（就什么才是统治机构改革的理想状态，请参照拙著《你读过宪法第八章了吗？》）。

如是这样，从逻辑面来看，安倍经济学的前行之路，必然是“国债暴跌”与“恶性通胀”。假使一旦出现恶性通胀，超过1000万亿日元的国家借款，也会一笔勾销。比照安倍首相最擅长的话来说，“只有恶性通胀一途，别无他途”。但是，恶性通胀会使得靠养老金生活的国民破产（也即老后破产），生活陷入大混乱。届时，国民又将如何生存下去？

总之，2014年年底的国会大选和2016年夏季参议院选举，到最后却不得不为悲惨结局做好准备。但，这也是国民所选择的不归之路。

## 无法退场的“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

确实，安倍经济学暴露了日本人的心理。伴随日元贬值推动企业业绩好转，股价也因此上扬。但从这里向前，再思考一下是否还有下一步对策时，给人强烈的感觉就是招数已尽。

如前所述，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将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率与上一年相比，定格在2%，并以此作为“物价安定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实施“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从金融机构买入国债，再将现金提供给市场，直到达成目标。而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连同长期国债和国库短期证券，日本央行国债持有额已超过360万亿日元。换言之，日本央行被国债“撑饱”。而“撑饱”的央行再将国债卖给各大银行。各大银行也是现金满贯。不过，银行持有现金并无意义，还要被金融厅无端地要求增加对企业的贷款。但企业并不缺钱，仅现金和存

款就有261万亿日元的剩余资金。所以银行难觅新的贷款对象。为此，有的银行甚至向优良企业这样表示：“即使零利率也接受，希望前来贷款。”

而在另一方面，应该从中小企业回收的不良债权则又堆积如山。但由于金融厅有言在先，不许“过河拆桥”，因此在2013年3月底《中小企业金融圆滑化法》（延期偿付法）到期之后，只要不破产，即使无力偿还利息的公司，银行也将其作为“正常债权”的归类，放置一边。这种超越道德（伦理缺失）水准的做法，已经让人完全看不懂银行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日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现金超量过剩。央行国债满怀抱，国家负债超过1000万亿日元，危机确实在悄无声息地逼近。

打出货币宽松“退场对策”，引发世界关注的美国，联邦准备制度理事会（FRB）于2013年12月，决定开始实施缩小“量化宽松第三弹”（QE3）的规模，长期利率随即上扬，超过了3%。尽管只是小幅调整，也即国债和放贷担保证券的买入额，从原先每个月850亿美元暂减至750亿美元而已。为此，FRB认为“量化宽松不是利率上升的直接原因”，但长期利率回升到两年半前的高水准，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当时的FRB议长伯南克（Ben Bernanke）表示，缩小量化宽松“不会弱化在必要的范围内持续货币宽松的约定”。并再次强调，直到达成雇佣改革和物价稳定为止，FRB将会持续超低利率政策等货币宽松政策。这也就是说，一旦推进货币宽松提升流动性，当缩小规模的时候，长期利率就会上扬，导致难以控制的通胀出现。这正是FRB所担心的。

## 利率上升，日本央行首遭“自爆”

连美国尚且如此，日本央行如果缩小量化宽松规模，情况又会如何？日本有“退场对策”吗？我认为，一旦实施了如此规模的货币宽松，再想祭出退场对策，实属难上加难。至少从资金供应量占GDP的比例来看，日本远超美国，状况更为糟糕。而且日本国债的回报率，已几近为零。

过去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实施过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数不多的一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由于战败，当时背负巨额赔偿金的德国，狂印纸钞，导致恶性通胀。过量印钞带来恶性通胀，纸币与国债同然。

围绕美国缩小QE3规模的做法来看，我们得知，哪怕是小幅调整，只要市场嗅到缩小货币宽松的味道，长期利率就会急速上扬。因此，假如日本央行也缩小货币宽松的规模，导致利率上扬，那么，最先经历“腹中”自爆的，就是持有国债金额占GDP一半的日本央行。

为此，我认为这次黑田总裁推行的“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并没有同时附带退场战略。如果黑田总裁能找寻到安全的退场对策，那他真可以称为天才了吧。安倍政权为了刺激市场经济，就如同一边往汽车里持续加油，一边猛踩油门，以不踩刹车的速度，一路飙奔。其象征就是2016年度的预算额，膨胀至97万亿日元，堪称史上最高。我们回看一下。欧盟在面临以希腊财政问题为发端的欧洲债务危机之际，欧洲中央银行（ECB）的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ughi）曾经说过：“只要有必要，不论哪个国家的国债，我们都可无上限地买入。”在欧债危机远去之后，欧盟还能持续着小康状态。但是，如果要问欧洲央

行究竟买入了多少国债？查看之后我们看到，结果竟然是“零”。这也就是说，与黑田总裁不同的是，德拉吉总裁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其实完全没有买入国债。

到了2015年，欧洲央行终于决定实施“量化货币宽松”的政策，从3月起扩大规模，每个月买入600亿欧元（约8万亿日元）的资产，不过反对的声浪也非常强烈。如今美国在量化货币宽松方面，也将踩油门换成了踩刹车。只有日本还在一意孤行，持续加油踩油门。

## 优秀的领导者只专注一件事

为什么安倍经济学这艘巨轮，出航不顺？我认为，这是安倍首相指挥与管理有问题。

若问：好公司与不好的公司，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依我从事40年国内外企业经营顾问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只归结为一个问题：“为了重振业绩，经营者提出怎样的方针？”好公司的经营者只专注一件事：“我们公司的问题是这个。”然后用上四至五年的时间，专注于这件事的解决。

一个佳例就是被称之为丰田“中兴之祖”的原丰田汽车高级顾问丰田英二。为了减少浪费，他不断地向员工灌输“就算是干毛巾，只要动脑筋，也能挤出水来”，并确立了具有革新精神的“看板方式”[(1)]，成为丰田公司的代名词。丰田公司时常怀有强烈的危机感。这表现在有1500名干部员工参加的研修会上，担任讲师的我也曾多次被他们提醒：“自满是最大的敌人。说错也不要紧，就是不要赞扬丰田，只要告诉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就行。”

反观不好公司的经营者，总是罗列出十条二十条之多的改善方策，并发出指令，要员工悉数照办。但久而久之，员工会对经营者不断发出的指令生出抵抗情绪，结果改善的对策什么也没有达成。

优秀顾问与蹩脚顾问的区别，亦属同然。优秀顾问会将问题归结在最主要点上，然后只提改善建议。而蹩脚的顾问，则在分析公司基本情况后，发现有三十个问题，逐一指出，然后再反向罗列改善对策。显然，这是将问题点颠倒成改善对策了。但是，一个公司不可能同时实施三十条改善对策，因此到最后，哪一条都是半途而废，或不善而终是其结局。

这样的蹩脚公司和蹩脚顾问，好像似曾相识？对，正是今天的安倍政权。安倍政权用“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构造成安倍经济学，出台各种政策。但到头来，决策执行的进展如何，今后要实现怎样的目标，政策实施有了怎样的效果，则完全不为人所知，谁也无法掌握未来的全貌。

先是把消费税提至8%，然后为了不使市场景气为此夭折，又推出减免5万亿日元法人税以及讨好国民到处乱撒钱的措施。冷静思考这些做法，无疑在于乱花了5万亿日元，所以要将消费税增至3%。这种把财政规律忘得光光，毫无约束可言的做法，与丰田英二的领导方式有着天壤之别。

## 误入歧途的安倍政权的“三大本质”

按照我的思考，“安倍政权的本质”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安倍首相的一个倾向是“明明没有根据，却也能一口咬定”。

东京电力和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外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在东京申奥的最后陈述会上，就核污染水问题，安倍首相向全世界宣称“完全在控制之中”。其实那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因为每天有400吨涌出的地下水，如何与放射性核分裂生成物隔离？这个问题虽然知道“必须立即处理”，但要开展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工程，核辐射量又过高，因此在“2—3年之内是无法施工的”。况且港湾内海与外海并没有完全隔开，封闭存储核污染水的现有构造，又无法正常运作。虽已提出构造的改建计划，但也属于两年后才能完工的大工程。为此，实际的状况明明并非是“控制中”而是“失控”之中，然而安倍首相则满不在乎地一口咬定，说“完全在控制之中”，毫无反省。东京电力的广濑直已社长，则以“我的理解与安倍首相相同”，回避正面表明自己的意见。

安倍首相也用轻松明快的语调谈论经济问题。从我提倡的“心理经济学”观点来看，国民有个好的心态，有助于经济的回升，所以是好事。不过，正如我后文所述，日本经济本质上存有结构性问题。即便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报纸或电视传媒也齐声喝彩，说为此会带来“3万亿日元的经济效果”，很多人也期待“经济为此好转”。但奥运带来经济好转是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税金建设体育场馆或选手村及交通网等公共工程，带来的只是花费国民税金的经济效益。总之，安倍首相只不过是想通过谈论一些看似轻松的经济话题，用其传播效应带动经济回升罢了。

第二个本质，是如前所述胡乱颁布不计其数的政策。况且，安倍首相由于只听信于智囊或亲信的话，因此在自民党党内议员中间，对

安倍也有郁积而起的不满。他们发声：“也请听听我们的建议。”

举例而言，安倍首相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就消费税率上调问题，召开“集中研讨会议”，征询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意见。然而，这实际上是为了镇住处于百家争鸣状态的议员们，使出的“出气筒”手段。一旦决定消费税上扬，尽管周遭有不同意见，但严肃认真地予以实施，才是领导者应有的风范。而像安倍首相那样，到处低姿态地倾听意见，就是典型的蹩脚经营者。其结果，尽管赞成上调消费税的意见占据多数，但安倍首相却还是做出了延期增至10%的决定。既花费了时间和税金，又牵连了那么多人，最后只不过是搞了一场毫无意义的促销活动罢了。

第三个本质，虽然也有第二本质方面的原因，但其实是安倍政权了无新意，仅仅是开倒车，采用“依靠官僚”和“全部扔给官员处理”的方法而已。由于政府机关还是依旧不变的“垂直条块组织”框架，因此每个部厅都各自推出肥水不外流又乱花税金的政策。安倍首相只不过是这些部厅的发言人而已。

其结果，安倍首相还是看不到日本的真正问题。今后的日本，每年约减少40万—60万的劳动力人口。人口统计学上的问题才是日本目前面临的最大课题。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日本的GDP将会持减，国力走向衰退。为了防止这些问题的出现，日本必须接受移民，或者起用高龄者等。但安倍首相只是在基建或护理这些领域，推出了接受外国人的方针，但难以感受认真且全面解决问题的热情。

现在的日本，最需要的是“只专注一件事”的真领导者。因为再这样下去，在东京奥运开幕之前，日本经济的这条大船，恐怕就要沉没了吧。

## “微管理”的典型

我们再继续验证安倍政权的管理力。

您认为，公司里最令人讨厌的上司是哪种类型？用英语表示就是“micromanager”（微管理者）。也就是说，对部下的一言一行，加以鸡蛋里挑骨头般的过细确认，对每件事都加以吹毛求疵的上司。不让部下做任何带有自己意见的决定，就连报告书或发票有无瑕疵等，都加以挑剔的管理和干涉，这就是带有否定意味的“微管理”。

安倍政权其实就是这种“微管理”的典型。所谓安倍政治，一言以蔽之，就是“依靠官僚的中央集权统治社会”。换言之，中央政府的官员，用自己的权限，决定所有大小之事，并迫使国民、地方和企业接受这些决定。在一些规则的执行中，不管是“眼开眼闭”还是“加重处罚”，决定权也都在官员手里。安倍政权所推行的政策，哪里谈得上是放宽，根本就是强化规则。官员为了扩大自己部厅利益，管理本身只是个借口而已。为此，这些做法与为地方经济创造生机（地方创生）和经济增长，没有任何联系。

举一例加以说明。2014年开始实施“教育资金的赠予及免除赠予税制度”。这是父母或祖父母，为30岁未满的子女或孙子女赠予教育资金的时候，每个人最高可享受1500万日元的免征赠予税的制度。

问题是，为了用到这项制度，必须以子女或孙辈的名义，在金融机构开设专门账户，汇入赠予的教育资金。如从账户里取钱，支付入学金、学费、保育费、学习用品费、课外旅游费、学校伙食费等费用的话，必须开具用途为教育资金的证明书（如发票）等，然后再提交

给金融机构。这是相当麻烦的规定。而且，汇入的资金如果到30岁为止还未用完，账户里的存额就必须缴纳赠予税。

假设子女或孙辈现在为五岁，一路顺利到大学毕业需17年的时间，到满30岁还有25年。在这段期间内，必须每年不断地收集发票，提交给金融机构。

此外，如果子女或孙辈想成为体育选手，那么观看体育比赛的门票不能算是教育资金吗？如果想成为游戏的编程员，买入游戏软件的费用不能算是教育资金吗？去东京迪士尼乐园或环球影城，为什么不能被认可为教育目的？应该由谁来判断是否是教育资金？这样的矛盾和疑问明明有很多，但新闻媒体却什么也不报道。

## “放宽限制”只是徒有其表

另外，在2015年4月，日本政府还创设了“结婚育儿资金的赠予及免除赠予税”的规定。这项规定是针对结婚、怀孕、生育、育儿、从父母或祖父母那里接受每人最高为1000万日元（结婚费用最高3000万日元）赠予时，可视为免课税的赠予额。在运用这项规定时，其方法与教育资金相同。必须向金融机构开设信托账户，然后就支出的费用部分开具书面证明（如结婚费用、生育费用、保姆费用等的发票），再提交给金融机构备案。受赠人的年纪达50岁时，账户里若还有存额，就必须课征赠予税。

虽然教育资金和结婚育子资金的免课税金额，合起来上限为2500万日元，但原本作为教育资金等的生活所需费用，就算是父母或祖父母出钱，也是免征赠予税的。在过去，即便是生前赠予，每年就有最

高110万日元的免税额，若合并使用“继承时精算课税特例之免税范围”的2500万日元，以及“购买住宅资金赠予之特例的免税范围”最高为1500万日元的话，两者加起来就有最高4000万日元的免课税额。

说起来，如果高龄者拥有的资产用于扩大消费为目的，并为此还颁布特殊条例，将赠予税或遗产继承税纳入免税对象，那么，我认为子女或孙辈在使用父母或祖父母赠予的资金时，政府在旁指手画脚，这种做法岂不奇怪吗？用父母或祖父母给的钱，无论是用来购买游戏软件，还是用来观看体育比赛或是去旅游，不都是个人的自由吗？如果“不问用途如何，反正最高3000万日元为免税额”的话，那么以高龄者为主所持有的17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一下子转移给子女，孙辈世代，当然是有助于促进消费的。

政府将这些资金限定其使用用途并加以“捆绑”的做法，换句话说，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只是在做放宽限制的表面文章，实则是在收紧拉马的缰绳。安倍政权在所有领域事无巨细地插手干预，并强化管理，用一种“施恩于民”的“居高临下”对付国民、地方或企业。

## 几近恐怖的“计划经济”国家

安倍政权是典型的微管理。因此，政府一方面新设赠予税免税制度，另一方面，又从2015年1月开始，扩大遗产继承税课税对象范围及上涨税率。原本基础扣除额从“5000万日元+1000万日元×法定继承人数”缩减至“3000万日元+600万日元×法定继承人数”。遗产金额也从原本的超2亿日元不满3亿日元者，税率从40%调高至45%，超6亿日元者，从50%调高至55%。

简言之，政府就是要让富裕的老年人吐出钱来。不过，越是这样，有钱人就越想逃往海外。而相对资产匮乏的中产阶级，为了预先准备遗产继承税，更是要收紧钱包了吧。其结果，我认为税收的效应充其量也就是“一去一来”打个平手（正负为零），而最后导致消费不振的下场。不直接废除遗产继承税，制造慢慢地放宽规则的假象，不知不觉中遗产税整体有所增加，最后会陷入巨大的混乱。

政府官员们收紧缰绳的另一个事例，就是设立“国家战略特区”。被指定为“国家战略特区”的是：东京圈、关西圈、新潟县新潟市、兵库县养父市、福冈县福冈市、北九州市、冲绳县、秋田县仙北市、宫城县仙台市、爱知县、广岛县和爱媛县今治市。为什么就指定这12个地区？官员的回答是“因为担心这些地区会变得不可收拾一团糟”。显然这就是令人可怕的“计划经济”。

其实，变化是从不可收拾的地方发生的。过渡时期的无序能促进成长，社会恰恰是在无序中诞生有序的。国家战略特区不是由国家指定12个地区就了事的，而是要像中国的经济特区一样，日本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意愿都可变成特区，让其自由发展即可。增长战略只能从开放与混沌中诞生，这一点官员们不应该不知道吧。

## “零加班费”的制度是多管闲事

我前面论及安倍政权的本质，就是一个依存官僚的“微管理者”，并列举了教育资金的赠予税免征等事例加以说明。窥一斑而知全豹。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的政策，就是“微管理的全武行”。

比如“零加班费”制度。这项制度的适用对象是“年收在1075万日元以上”，而且是“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的外汇交易员、基金经理、研究开发人员或顾问等职务人员，他们的薪金不是用劳动时间来计算而是用工作成果来计算。

但是，为什么年收入要在1075万日元以上？选定职种的标准又是什么？据说，其根据就是劳动基准法第14条的规定：能将劳动契约时间从上限的3年延长至5年者，而能满足这一要件的年收入，一般又都必须在1075万日元以上。零加班费用制度就是来自这条规定。然而问题在于，这个制度是要将有期间限定的雇用条件，套用在无期间限定的正式员工身上，本来就是不合理的。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零加班费用制度符合现在企业的真实状态。

这正如我在拙著《赚钱力》（2013年由小学馆出版）所写的那样，在工作变得不再为时间或地点所限定的今天，很多白领阶层的工作，其成果与报酬的关系，变得有必要“再下定义”。因此连零加班费在内，也应该由经营者、管理者和员工，在再次协商中达成共识，而不是由政府单方来决定。

此外，安倍政权在“防止长时间劳动”的名义下，正在讨论让企业实施从下班到第二天上班，能空出一定时间的“上班时间间隔规则”，以及“设定每月工作时间上限”“每年获得104天以上休假”的其中一项。另外，为了“提高带薪休假的实施率”，政府还推出要求企业有义务指定员工带薪休假具体日期的方针。这些从企业方面来看，都属多管闲事。果真是什么事都要插手的微管理。

## “地方创生”的压轴策略，也是费解的愚蠢策略

令人喷饭的是政府推出的税制修正案。东京等大都市圈的企业，如果将总公司的业务功能转移至地方，用其建造公司大楼等的投资额，可从公司的法人税中减去7%的最高额；随着将管理部门等迁至地方带来员工换工作，地方就业率因此有所提高的话，每位员工可以有140万日元的税额扣除。政府认为，此举既能在地方创生出就业机会，又能匡正人口过于集中的“东京一极”现象。看来这就是安倍政府抑制地方人口流失，从根本上振兴地方经济的“地方创生”的压轴策略。但是，没有比这更令人费解的愚蠢策略了。

恕我孤陋寡闻，我至今没有听说过有将总公司的业务功能转移至地方的大企业。就连同样是在东京都内，有将总公司移至或设置营业所于丸之内或大手町为中心的都心三区（千代田区、中央区、港区）以外区域（如池袋或台场）的公司，后来都因公司员工反映与都心的业务往来不便，便又全部搬回至都心三区和品川区的一部分。

倘若真有公司想利用这个税制修正案，将总公司的业务功能转移至地方，恐怕也是成长乏力，单纯地看中税制优惠而去的吧。政府这种无意义的激励手段，为了引诱企业而乱撒税金，简直是糊涂透顶。

“女性录用”的政策也属同然。安倍政权在2014年10月的临时国会上，提出《女性活跃推进法案》（2015年8月通过）。法案中规定，大企业有义务制定录用女性的数值目标并加以公布。在录用女性中，导入认定实施企业机制的同时，对于接受认定的企业，推出增加公共事业竞标机会等的优惠政策。可以说是典型的“大棒”（带有数值目标的义务）加“胡萝卜”（优惠政策）的微管理。

但在另一方面，地方创生的司令塔“城镇·人口·工作创生总部”，其目标是将出生率从2013年的1.43提高至1.8左右。这不禁让人生疑：安

倍政权究竟是想让女性有更多的录用机会，还是想成为更容易生育的社会？我完全不能理解。

## 日本央行与企业的同步异常

不仅如此，安倍首相还频繁地口头干涉企业经营，发出“还不快涨工资”“快增加设备投资”等指示。最近，就连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也亦步亦趋。2015年1月，黑田总裁出席了劳动工会中央组织暨联盟的新年会。央行总裁出席联盟的庆典活动是个异例。一个解读是为了实现2%的物价上调目标，在春斗（劳资协议）中营造涨薪的氛围。联盟也表示了在春斗中，将会要求超过2%的基础工资的涨幅。经团连会长榊原定征也首次出席了新年会，并表示“为薪金上调作最大的努力”。首相发号施令，央行、经济团体和劳动工会竟如此地步调一致，紧跟响应，真乃前所未闻。如今的日本的的确确呈现了“极权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

不过，由于经团连的企业员工或加入联盟的工会成员，在日本非常少。因此即便假设这些人的薪金都有所上调，但从整体来看，还是有大部分人的薪金原封不动。此外，联盟的核心工会之一是自治劳动工会，即公务员（地方自治体的职员等）。调高他们的薪金，那就要花费更多的税金。这就如同章鱼专食自己的脚，所谓的增长战略完全不具意义。

由于修正了运营方式，即使养老公积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PIF）将资金投入股市，拉升了股市行情，但由于日本人一般不炒股，因股价上扬而受惠的人还是相当有限。实际上大部分国民与政府

宣传的股价高或奖金高非但没有关系，反而确实感到由于消费税上调或日元贬值带来的食品涨价等，陷入了只能靠储蓄来补贴生活的窘态。这也就是说，安倍政权把个人或企业当作机器人，然后事无大小地横加干涉，把他们朝自己希望的方向上引导。这就造成了对现实毫不知情的政治家和官僚们总是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因此他们脱离老百姓的实际经济状况，也是理所当然的。

面对这样的事态，为什么媒体不出来加以批判？而只报道来自官方的消息？对此我无法理解。但愿日本不会有一天落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 不必感谢“配偶扣除额”

2014年3月，安倍首相在政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和产业竞争力会议的联席会议上，以促进录用女性为目的，作出了“重新研究配偶扣除额”的指示。为此，在政府税制调查会上，对安倍首相的这一指示进行了讨论。在同年11月的调查会上，又把这一问题的解决策略分为“废除”、“修正”和“导入新制度”三大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细致的五个方案。

所谓配偶扣除额，是指纳税人如有配偶，那么配偶就属所得税法上的扣除对象，纳税人就可以扣除所得税中一定金额的制度。比如，以丈夫是公司员工、妻子为全职主妇的家庭为例，即使妻子在外打零工，若年收入在103万日元以下，妻子非但不必缴纳所得税，丈夫还可以在所得的课税额中扣除38万日元，使得应缴纳的所得税变得更少。这就是所谓的“103万日元壁垒”。此外，满足这一条件的“专业”主妇，

还可以作为“第三号被保险者”，以被抚养者的身份，加入丈夫的健康保险。安倍首相以这项配偶扣除额制度“对扩大女性就业起到了抑制作用”为由，要求研讨其缩小范围或废除的可能性。然而，对此也有很多反对意见和希望慎重对待的言论。

实际上，目前执行中的配偶扣除额这项制度，是为了缓冲众多工薪族家庭的收支平衡，对于家计有一定的帮助。为此，如果即刻缩小范围或废止，恐怕会引起工薪族的猛烈反对。国会议员每次回到自己的选区之乡，也会为了这个简单明了的问题遭受严厉的责难吧。

不过，将这项制度维持不动就好吗？那也未必。我们每每感激于“某项扣除”或“某项津贴”，很容易产生一种得到国家的“恩惠”是理所当然的感觉。然而，这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原本配偶扣除额这项制度本身，是诞生于半个世纪以前，与今天的社会经济实情并不相符。

## 是“家庭内合并申报”还是“夫妇分别申报”？

如果真想实现男女完全平权、公正录用、公平赋税，方法只有两个。

一个是“家庭内合并申报课税”方法。家庭成员中有工作者的收入，加以合并计算。这种合并起来的课税，与目前日本最多的单身家庭相比，其税率要降低5%至10%。德国等国家就采用这种税制。

另一个是“夫妇分别申报课税”方法。如今，日本女性的生活样态颇具多样化。而在过去则几乎呈单一状：学校毕业→工作→结婚→生育→家庭主妇，或是双职工，或是等孩子长大再就业。而通过调查现在的日本女性我们发现，由于受有所增加的未婚化、晚婚化、离婚、

丧偶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单身上班族、银发（退休）单身族、丁克族（夫妇无子女）、杜克族（夫妇有子女）、重新复职、双薪老人夫妇、专职主妇、白金夫妇等，现代日本女性的生活样态，可分为十种以上的模式。

由此来看，若要扩大女性就业，就必须完善能够应对女性多样化生活的制度。与此同时，夫妇分别申报课税，也即视夫妻为单身，独立赚钱。就算是结婚的家庭，也与单身家庭同水准征课高税率或保险金等。我认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这样一来，由于工作中的女性独自负担税金、养老金和保险金等，离婚等的自由度也随之大幅提高。

目前在美国，双职工家庭比例占总户数49%，女性收入高于男性的户数比例已达25%。恐怕今后的日本社会，也会渐渐朝这个方向变化的吧。如是这样，丈夫作为一家的顶梁柱在外工作，妻子守家照看小孩，这种以“工薪家庭全职主妇”为前提的配偶扣除额制度，就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现实了。

即便政府税制调查会也在讨论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废除现行制度（等同认可夫妇分别申报课税）或者夫妇扣除相同税额等方案。但我认为，最终只是在家庭内合并申报课税制与夫妇分别申报课税制之间做选择的问题（不过，作为少子化的一个对策，政府有必要不问婚姻状态，对育儿家庭给予优厚的税率扣除额）。

## 愤怒于比江户时代更为沉重的国民负担率

另一方面，日本税制还有一个特点，年收1000万日元以上的工薪族工资，不再上调。年收入越高税率就越高，以致形成工薪族“再怎样赚钱，到手的收入几乎不变”的实际状态。为此，日本公司都以各种津贴或退职金等，作为工资以外的奖励发放。不过，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是发展中国家公司的做法。

比如在英国，做法就与我们不同。员工可以用公司的名义，购买喜欢的车，其购车费日后从工资里扣除。由于工资总额低了，课税额也就相应变少了。还有美国的大企业，让员工自行决定一切。个人和企业之间只商定一个总的年收入。这其中，由于税率的关系，员工是考虑直接领取现金好，还是让公司提供一辆配有驾驶员的车子好？都可以自由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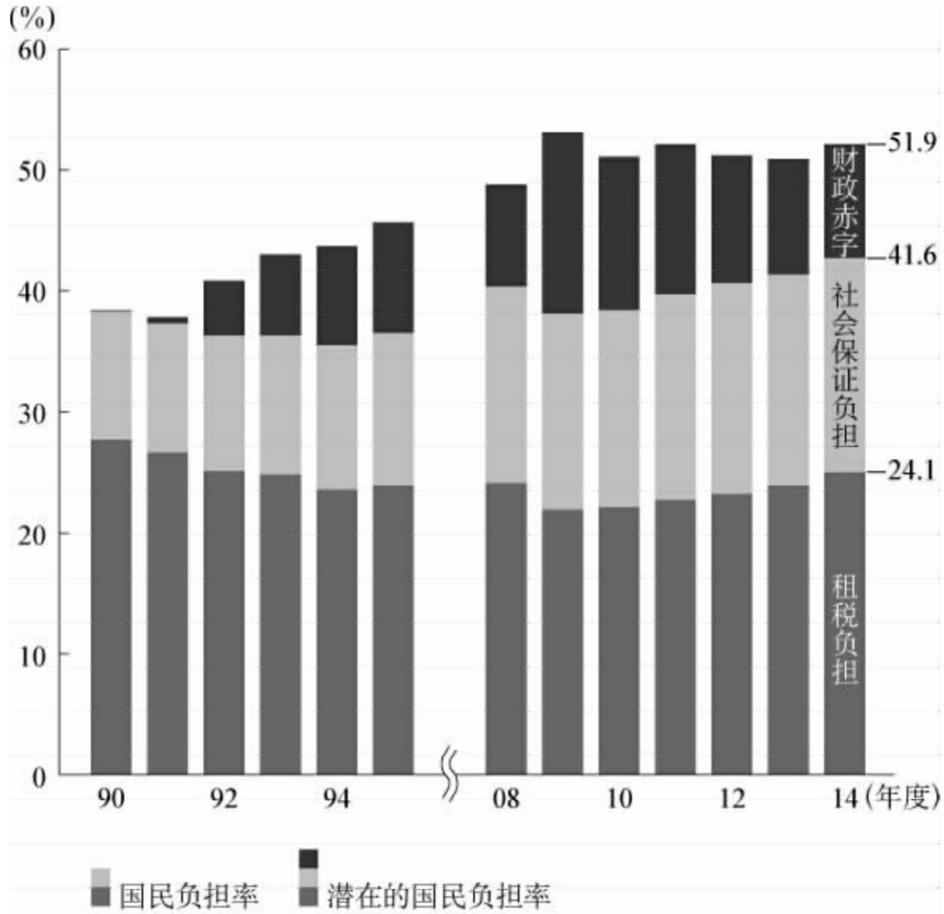
其实我认为，日本也应该慢慢转向于发达国家的工资与税制体系。为什么现在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应该关注日本国民沉重的租税负担。

根据财务省资料，2014年度（预测）的租税负担率（对比国民所得）是24.1%，与北欧的丹麦、瑞典、芬兰、挪威相比，确实是非常低的。但如果再加上健康保险或失业保险、护理保险等社会保障负担率17.5%，总计国民负担达到了41.6%。

除此之外，国家财政赤字，包括国债赤字等的借款，终究必须由国民支付，这也成了国民负担。加上这些所有费用，可计算出薪资的52%都上缴国家了（参见图19）。平成时代的日本国民，被迫承受了比江户时代“五公五民”更为苛刻的负担。

图表19　沉重的不仅仅是税金“国民负担率”的变化

◆ 年收阶层与家庭户数比例的变化




注：到2012年度为止为实际数据。2013年度为推算值，2014年度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BBT综合研究所

确实，北欧各国的国民税务负担率为69%—70%，比日本更高。但相应的是国民老后都由国家包揽，医疗和教育等也不用花钱。因此就算不储蓄，也能放心生活，安度晚年。反观日本，就连维持一项养老金制度，都显得风雨飘摇，力不从心。

日本人应该直面这个现实。特别是为工作及养育子女、护理老人等而辛劳奔走的30—50多岁的工薪阶层。这些人承受着更为沉重的负担。为了让丈夫稍有喘息，妻子外出打零工或钟点工，但年收还得控

制在103万日元以下，才能勉强符合配偶扣除额制度，帮助家计。像这种歪曲的社会现实，必须尽快且从根本上加以纠正。

## 毫无道德的“中小企业支援政策”末路

安倍政权下的企业倒闭数，降到了与泡沫时期相仿的低水准。

根据民间信用调查公司东京商工调查的统计，2014年日本全国企业倒闭件数（负债额1000万日元以上）为9731件，较前年比减少了10.3%。这是1990年以来，时隔24年低于1万件。此外，2015年为8812件，较前年比减少了9.4%，并由此跌破9000件。

之所以招致这种“异常事态”的发生，原因在于从2009年12月到2013年3月为止，持续实施了延期偿付的《中小企业金融圆滑化法》。在法规实施的期限过去之后，银行则在应对中小企业的风险请求，继续延期返还。我曾在延期偿付法的期限届满之前，就著书或在杂志专栏的连载中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没有想到的是通过银行，用这种延期还款的方式，让本来早该倒闭也不奇怪的中小企业，存活至今。也就是说，这并非是“延期偿付”，而是无边际的“道德冒险”。

用病人打个比喻。对早已无法用自身之力存活下去的晚期患者，插上维持生命的装置，就算到了临终时刻也不撤除。为此，明明生命已走到尽头，却还一直延命于病房。中小企业全都像这些晚期患者。根据金融厅的推算，利用延期偿付法的中小企业数上升到了30万—40万家。其中难以自行再建的企业达5万—6万家。

实际上，通过对申请适用延期偿付法中小企业的调查，经营状态并未得到改善的公司，其实不在少数，为此有报道说，金融厅针对这

些中小企业，欲将方针转换为促使这些中小企业转业或停业。

但是，对担任企业顾问长达40年以上，见证过无数企业兴衰的我来说，暂且不论停业问题，就转产而言，就要比重建或创业困难得多。

比如，一家小城镇工厂，如果能不费力地成功转型为IT行业或饮食行业，公司经营者还需要这么辛苦吗？即便对选择转产或停业的中小企业给予新的融资，这些公司也只会再添新债务，而倒闭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吧。问题是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干？我完全不能理解。

到头来，金融厅也好，银行也好，都不想“最终处理”这些中小企业。因为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倒闭数的增加，银行也不想处理贷款的坏账。

## 银行其实什么也没有做

以前，泡沫破灭后，银行充斥不良债权。由于银行接受国家的资金注入，因此对于金融厅的检查总是战战兢兢。但如今，融资企业如果适用延期偿付法的条件，债权都会被分类在“正常运营”企业内，金融厅也就不会来检查了。因此，银行只要唯唯诺诺地听从上面的指令，“让中小企业延命”即可。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在于银行没有支付给存款人应有的利息。通常对一般国家而言，银行的功能就是汇聚存款然后加以运用，并用其差额利润作为利息支付给存款人。日本银行虽有充裕的存款（明明没有利息，却不明白为何还往银行存款），却缺乏运作这些存款的能力。原先用少数资金购买的收益率颇高的国债，也卖给了日本央行，

因此只剩现金持续增加。不过，因为大企业或优良企业自己能调配资金，所以没有必要接受银行的融资。因此现在日本的银行，现金可谓丰厚有余。

业务决算也是银行的一个功能。但这个功能主要是委托“全国银行数据通信系统”（简称全银系统）运作，每年要给“NTT数据”公司100亿日元的庞大使用费。全银系统是1973年开始运作的在线数据通信系统。日本几乎有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加入这个系统，一个营业日平均处理550万件，约有11.3万亿日元（一年约13.5亿件，约2700万亿日元）的交易额，其运营成本也由存款人的手续费来支付。

银行还剩下的一个功能就是房贷业务（与遗产继承税相关的信托业务或海外业务，在绝大部分的银行中并非是主要业务），但如今买房人在减少，其房贷需求也急剧减少。

创下日本购房最低贷款利率的是“FLAT35”（35年的长期固定利率贷款）或“FLAT50”（50年的长期固定利率贷款）。前者是由民营金融机构和住宅金融支援机构共同提供的长期固定利率型房贷，后者是针对被认定的长期优良住宅者的住宅，可将偿还期间上限延至50年的制度。比照过去，推出如此优惠的长期固定利率房贷，申请者应该大批杀到才是。但是，其实际的申请状态则显得非常平稳。这样的国家，除日本之外是没有的吧。

## 日本已丧失“金融秩序”

说起来，日本全国平均空巢率达到了13.5%。即每八间房屋有一间是空巢。有的地方自治地区出现了每五间房屋就有一间是空巢的现

象。一般而言，有这么多的空巢，其房产价格应该暴跌才是。买下重新装修，一定比买新房来得划算。

比如，对日本泛指三大用水区域的厨房、浴室、卫生间进行装修，花上700万日元的装修费，就能使其焕然一新。如是这样，就完全没有必要花上4000万—5000万日元建造一户建或购买新公寓房。

不良商品有13.5%在库积压，如再制造同样的商品，就其厂商而言一般是不能为之的。仅从这点而言，如果说日本新建住宅已变得几无需求也不为过。

然而，无论哪个国家，刺激经济景气对策的支柱，只有住宅和汽车。家电制品或食品产业难以刺激经济。但就日本住宅的现状来看，没有依据说能带动经济的回升。

不支付存款人的存款利息，让所有贷款企业延命不破产，虽持有大把现金却也无法使经济回升的投资。日本的银行可以说丧失了作为银行的任何功用。日本已经变得没有“金融机构”亦无“金融秩序”了。

即便如此，为什么作为存款人——日本国民不发出怒骂声呢？从世界常识来看，只能说是不可思议的国民。

但是，这一切都因为有“反正景气总会好转”这个预期，所以都被国民从正面消化了。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预期的依据。安倍经济学也明显地上气不接下气，今后这些早已气数已尽的企业倒闭（即使转产或停业，依旧也会倒闭），将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中小企业会呈现尸骨累累的惨状吧。

金融厅与银行联手，持续出台有违道德行为（道德风险）的阴招，欠下大笔账款，不久终要转回至国民身上。

## 储存内部保留金的企业是“守财奴”吗?

至此，我举数例说明了在安倍政权的“微管理”下，增长战略的政策是如何脱离靶心的这个事实。之所以形成如此糟糕的局面，是因为姑且不论政治家，就连官僚、安倍首相智囊学者、报纸电视等媒体，也都对日本经济的实际状态完全不知情所造成的。

比如2015年1月，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指出，企业的内部保留金已经膨胀至328万亿日元（当时的数据）。在此基础上，他批判储存内部保留金的企业是“守财奴”，并要求企业将这些钱用于上调薪金或设备投资。第二天，麻生太郎还为此作了解释：“我不认为在对抗通缩和经济不好当中，内部保留金的储存是件好事情”，“意思是企业如出利润，希望能用在加薪或分红，设备投资上”。但问题是麻生当上了财务大臣，却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企业不想用手头的保留金？为什么没有使用的意思？也就是说，如今企业正在做的事情与正在思考的事情，与安倍政权要求企业做的事情（涨工资或设备投资），这之间存有近乎滑稽可笑的鸿沟。

且作一个概要的说明。

随着人口减少或超高龄化、少子化，特别是本书多次提到的“低欲望社会”趋势加深，今后日本国内市场的增长空间极为狭小，蓝领劳力不足也会越显严重。为此，企业感受到国内市场的“有机成长”（靠自己力量成长），已突显界限，而且也苦无对策。

另外，即使政府指令企业增加设备投资，但在日元升值之时，许多企业已把工厂转移到了海外，国内留有不少多余设备。而且，削减人员的速度，跟不上设备往海外转移的速度，因此就算日元贬值，国

内产能有所增加，企业也没有必要进行新的设备投资或录用新员工。最近也有报道说，由于日元贬值，部分日本企业又迁回日本。但据我所知的实情，这大半是要重新运作早已停产的工厂，并派回多余的员工，而人力不足就用临时工填补。

## 增长战略只是在海外收购企业

20世纪的经济学认为，如果日元贬值到这种程度，虽然经济会呈暂时的负增长，但不久，转移至海外的企业将会返回国内来。由此，出口竞争力会得到增强，经济状态也会有所好转。这就是所谓的“J曲线效果”。但是，如今的日本则难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留在日本国内的工厂，大半都是终端组装工厂。

在终端组装工厂中，中国、泰国、越南等海外生产的零部件，就占据了总成本的近八成。由于这些都是“进口产品”，若日元贬值成本价就会变高。由此，因日元贬值就把企业迁回日本，以此活跃出口业务的这种方程式，难以适用于微观经济。只要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积累的一个结果，就没有可能出J曲线效果。

如是这样，日本企业要想构画增长战略，只有进军海外。但问题是，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工厂和销售网点的日本企业，成功案例很少，经营者也会感到在海外拼打是困难的。因此，很多日本企业不得不以收购海外企业作为自己的增长目标。

比如，收购优质厨卫产品制造商美标公司（American Standard Brands）和德国高仪集团（Grohe）的骊住（LIXIL），收购美国威士忌巨头Beam的三得利控股公司，收购美国药企Avanir Pharmaceuticals

的大塚控股公司，收购美国Conopco公司意大利面酱汁事业的味滋康（Mizakan），或用公开收购股票（take over bid，简称TOB）的方式收购德国德马吉（DMG MORI SEIKI。该公司的原名为GILDEMEISTER）的DMG森精机等企业。

不过，在一系列的收购外企过程中，武田制药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原本拥有内部保留金，在日本属首屈一指的武田制药，大约投入2万亿日元，收购了美国千禧制药（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和瑞士的Nycomed制药公司。不过，在收购效应出来之前，机构投资家们就不看好这一收购行为，并批评说“收购价太高”“并不会带来业绩”等。为了维持给股东的3%股票红利，则不得不向银行借钱。就这样，超优良企业的武田制药，一下子失去了手头现金。

总之，对于进军全球市场的日本企业来说，决定生死且最为迅捷的增长战略，就是收购海外企业。这就必须准备巨额现金和3%的股息。许多企业为此而预先储存了内部保留金。而不知企业经营的实情，反而将其定性为“守财奴”的，恰恰就是麻生财政大臣们组阁起来的安倍政权。

## 让日本企业烦恼的“股价3%派息”

时下，让许多日本企业烦恼的正是如上所述的股份派息的问题。原先股息是以每股面额50日元，平均派息2日元或3日元，依面额发放。这是由于当时的机构投资家们对股市影响较弱而造成的。此外，过去就有“派息倾向”这个词，是指赢利的三分之一作为股利，派息倾向就达到了33%。这被视为企业这一方的逻辑。

现在如是使用“派息倾向”这个词，股价就会下跌。这是因为机构投资家们并不以面额或赢利来计算股利，而是以“股价”要求股利套现。也就是说，这是按照投资家们的逻辑，要求派息。除非是相当赚钱的企业，才能维持股价3%的派息，而机构投资家们却将此视为全球标准，这对一般企业来说，则是异常艰难之事。

尽管如此，现在仍有许多企业，还是忍痛维持这个超过3%的派息。因为机构投资家们如能有超过3%的派息，就算这家公司在将来发展上有些问题，也不会“抛股逃跑”。这也由于如今的日本，银行存钱也好，购买10年国债也好，也最多只有低于0.4%的利息收入。但持有股票的话，至少能获得3%的派息。这样一来，机构投资家们也能昂首挺胸地对客户说：“炒股获利超过3%。”

反过来说，如有超过3%的派息，就没有理由抛售股票。但若获利一旦低于3%，他们就会转向认购“股利派息更好的公司股票”。日本企业的内部保留金膨胀至380万亿日元的一个理由，就在这里。

总之，企业为了维持“股价3%派息”，就必须要有现金余力。东证一部上市公司的市值，在2016年3月末约为500万亿日元。虽然这其中的3%也有大约15万亿日元，但由于经营者在心理上会考量公司业绩不振时，或是不想给继任者带来困惑，因此想至少预留5年份，最好是10年份的派息余力。为此，我认为日本企业内部保留金的半数以上，即至少100万亿日元是为了应对“股价3%派息”。剩余部分则是为了应对企业成长，在海外并购企业，设备投资，或解雇员工等。

换言之，从如今的企业来看，股价上扬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这是因为股价越上扬，现金派息也必须随之增加。对企业而言，

要持续发放超过3%的现金派息，压力甚大。或许只能用“恐怖物语”来形容。

## “降低法人税”对涨薪的反作用

安倍政权还进一步对企业表示，将对企业降低法人税，由此增加的收益可用于涨薪或设备投资。其实这又是一种“微管理”的再现，表现出政客和官员连企业经营基本中的基本也不知为何的浅薄见识。

不用说，人事费用是成本，设备投资也以折旧费的形式算作成本。而法人税则是以扣除成本后“净利润”部分来计算税额，因此即便下调法人税的税率，由此而增加的利润只能用于企业内部保留金或股利派息，不会直接用于上调员工薪资或设备投资。

自然，若揣摩经营者心理，他们会这么想：比起上调法人税，“与其将公司的获利用来缴纳税金，还不如给员工涨工资或设备投资”。这也就是说，政府官员们的想法正好与企业经营者的想法相反，是对企业会计一窍不通的外行人的想法。为什么这竟然是堂而皇之地出自高层（包括经团连）的决策？我除了觉得不可思议还是不可思议。

除此之外，安倍政权还自顾自推出与“增长战略”自相矛盾的政策。如，上调遗产继承税或所得税；在降低法人税的同时，扩大对大型企业（资本金1亿日元以上）规模标准课税（以资本金、销售额和雇佣人数等企业实际规模作为标准），并且严格对待亏损企业；缩减亏损扣除制度；当法人持股比例低于5%时，课税比例就从原来的50%提升至80%等。在我看来，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非但不能促使市场景气好转，反而会使其越发恶化。

无知且浅薄的微管理，真是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无法阻止安倍首相的脱轨与无序，日本只能落入十八层地狱吧。

## 海外企业自有“节税方案”

在这里，我还想进一步讨论关于“降低法人税”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安倍政权增长战略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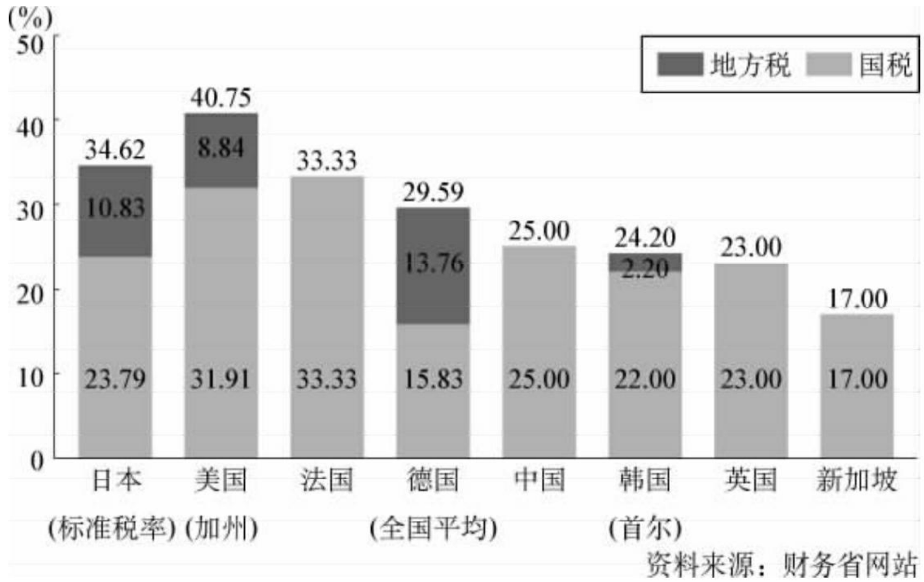
日本法人税的实际税率，国税和地方税合起来为35.64%（东京都为例）。在2014年5月召开的政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伊藤元重等人与民间议员四人共同提案：法人税税率“将来的目标是25%，而当前的目标是在数年内，将税率降至20%”。接受这一提案的日本政府，在同年6月发表的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指针《强化方针》里，写明调降法人税，并且决定从2015年度开始，将法人税下调3.29%。

在日本政府看来，如果下调法人税率，海外企业就会在日本设生产据点，有助于经济恢复活力。新闻媒体也持相同论调作了报道。但是下调法人税非但没有意义，反而还会有出现反效果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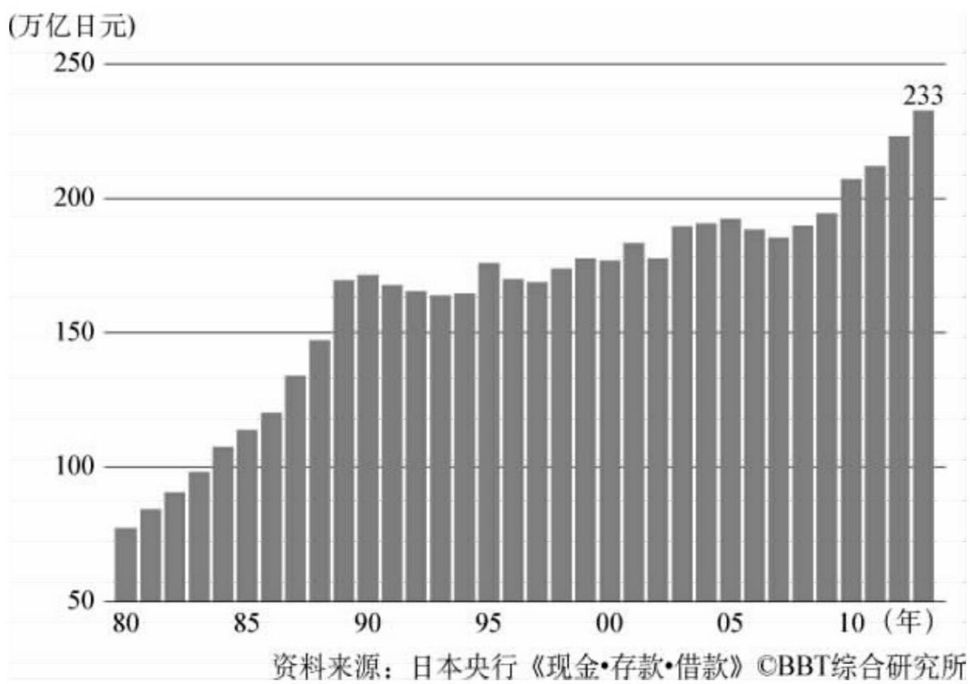
说起来，有些国家即使法人税税率偏高，经济增长也不错；而有些国家明明法人税税率偏低，经济增长却不见起色（参见图表20）。现在来看，一个国家法人税税率的高低，与企业要想在哪里设立公司，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因为海外企业都已经掌握了全球节税的方法。

图表20　法人税减税比较与企业储存内部保留金

◆ 合计国税与地方税的法人税率的国际比较




◆ 民间企业（非金融业）的现金・存款额的变化（万亿日元，年底）




比如，法人实际税率为40.75%，比日本还要高的美国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IT企业，都采用叫做“双重爱尔兰”（Double Irish）、“荷兰三明治”（Dutch sandwich）的合法的节税方法。这种节

税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在法人税率（12.5%）比较低的爱尔兰设立两家子公司（双重爱尔兰），然后在这两家子公司中间再安插一家荷兰公司（荷兰三明治），将专利或商标权等无形资产，通过签订授权契约以及支付授权金等方法，起到合理避税的效用。这样做可以将实际税率降至10%前后。

对新兴IT企业而言，这是标准的节税方法。除上述企业之外，还有很多公司采用这种方法。

## 超“20%”的法人税不具有吸引力

不过，与从公司开业开始就以节税为前提并构筑相关经营体制的新兴IT企业不同，一些老字号企业，诸如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等大型制造商或化学公司，难以模仿这种节税做法。这是因为明明公司经营体制没有变化，却突然只想采用“双重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方式，会被税务当局盯上，怀疑是否有逃税的嫌疑。

但这是否可以说，企业都老老实实地缴纳40%的法人税了呢？情况也并非如此。每家企业会调整自身的事业形态，制定“全球最佳课税方案”，下调实际税率。由于各国税制和币制各有不同，企业的零部件或资材，要以怎样的形式跨越国境运送，只要输入相关信息，就会自动算出世界各国法人税支付金额最低的系统方案。

既然全球化企业已经确立了降低税率的系统，即便日本法人税率下调至25%，也不具有让外国企业特地前来日本投资，设立据点的吸引力。25%的法人税，只是欧州的平均税率，而在亚洲，中国香港是16.5%，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是17%。这也就是说，如果法人税率不能降

至与爱尔兰12.5%齐平的话，从全球引进企业进驻是不可能的。如果安倍政权也想探讨能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决胜负的法人税减税方案，也不是说不能理解，但问题是现在讨论的税率“超过20%”，则完全不在一个平台上。

比如，东京都中心的临海地区、品川站、田町站周边地区、涩谷站周边地区、新宿站周边地区、羽田机场旧址等，东京都政府将其指定为“亚洲总部特区”。在这些地方设置了以法人税（国税）的所得扣除或法人事业税（都税）的全额减免为主要内容的优惠措施，满足条件的企业法人税实际税率为“26.9%”。为此，东京都的目标是在2016年度招揽5000家以上外国企业到特区设立公司。不过，在2014年度决定进入特区的企业只有8家（据东京都政府的网页，2013年至2015年接受招揽的企业增至66家。）。这清楚地表明，“超20%”的法人税率，对外国企业来说并没有魅力。

## 难以阻止的日本企业海外出走

安倍政权还认为，如果下调法人税，就能阻止日本企业出走海外。其实这也是误解。

企业出走海外只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设立生产基地”。其必要条件是：当地拥有一定技能的人才，且人工费便宜，产业基础设施还算完整，当地政府能理解外国企业的进出。

企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比如，在英国的约克夏郡和兰开夏郡开花结果的纤维产业，在19世纪前半期移至美国的新英格兰，接着再移至南阿帕拉契亚，之后又远渡太平洋，移至日

本、韩国、中国台湾，最后又来到中国大陆。不过目前中国的人工费上涨厉害，最尖端的服饰企业又移至孟加拉国，甚至还移到埃塞俄比亚。现在中国的人工费月额超过了5万日元，而孟加拉国月额是4000日元，埃塞俄比亚月额是2000日元。像纤维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工费一旦生出20倍的差距，一个国家移转至另一个国家的做法，就会不断反复。

企业外移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打入新兴市场”。现在日本企业之所以接连不断地进入印度或印度尼西亚，就是因为比起在当地设置生产基地，更具魅力的是增加或扩大中产阶级市场。可以这样说，企业外移与法人税税率几乎没有关系。而且企业一旦在海外设置基地，就不会再迁回。这也是被各国历史所证明的事实。

在日本，像欧美企业那样依据“双重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或“全球最佳课税方案”，想方设法降低法人税的大型企业，极为少数。大多数经营者为了不被税务当局盯上、不被媒体敲打，不得不缴纳高额法人税。这些经营者不是属于不得已的“忍耐派”，就是属于为了国家缴纳再多的税金也无所谓的“名誉派”。另外，与美国的股东不同，日本的股东一般不说“把企业移至爱尔兰节税吧”之类的抱怨话。

总之，将法人税下调至20%多一些，高兴的只是属于经团连的没有节税能力的大企业。但对吸引海外企业进驻日本不起作用，也不能阻止放眼世界经营的日本企业的外移。

我认为，目前在永田町（以国会议事堂为代表的日本政治中枢）议论这种无意义之事的，都是一些“外行人”。这里的“外行人”并不是指“税金外行人”，而是指“不了解企业决策现场的外行人”。安倍首相

不知听信了哪一位不了解企业决策现场的智囊的灌输，只单纯地相信“增长战略的关键是下调法人税税率”，就推进其政策。

而且，财务省或与大藏省有关联的议员们又提出主张：“如下调法人税，就必须填上该部分的财政缺口”。这样一来，其他税金项目受到该政策的影响是明摆着的事。或者是所得税、消费税，要不然就是已固定的烟税或酒税。到最后由于国民总负担并没有任何改变，这回下调法人税的讨论，也越发变得无意义了。

那么，为了防止产业空洞化或国民失去工作，我们真正应该直面的增长战略究竟是什么?

或许给人有绕远路的感觉，但我还是要说只有大幅改革“教育”才行。我认为，要防止产业空洞化，除了改革教育，别无他法。关于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今后增长战略，将会在第三章详述。但这里还想再强调的是，下调法人税只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 比登天还难的“不乱花补助金”

与降低法人税相并列，亦能成为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另一支柱的是“地方创生”。但是，容我先给出结论：“地方不会创生”。

经历过“失去的二十年”的通货紧缩，经济萧条时代的日本人，就算物质还算充裕，但因收入减少或养老金等问题，对未来的不安还是逐渐增大。为此，整个日本上进心低迷，年轻人不想离开居住地（行动范围从住家到半径5公里以内的生活圈），在家附近的购物中心解决所有生活需求，显著地朝着“痴迷个人小确幸化”，“AEON（永旺）依赖化”，“LaLaport（乐乐商城）满足化”的状态上发展。

在如此低迷的状况下，安倍政权为了控制地方人口减少或高龄化的速度，将活跃地方经济的“地方创生”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并且在2014年9月设立了“城镇·人口·工作创生总部”。但这样做就与在自民党竹下时代向全国各市镇乡提供1亿日元的“故乡创生”，以及在小渕政权时代发放“地方振兴券”相同。可以想见的结局就是以乱花钱而告终。石破茂地方创生相（当时）虽然说过，我们要提供一个能让地方政府既能自由使用补助金，但又不至于乱花钱的方案。问题是做起来恐怕比登天还难吧。

这是因为我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主讲“地方国家论”课程，为此调查和研究了世界各国的事例，发现世界各国在20世纪以后的课题，都是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有关，地方创生的事例一件也没有。

## 打出“地方创生”，表明招数用尽

回顾来看，提出所得倍增计划的池田勇人政权，在1962年制订第一次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以后，“国土均衡发展”就成为既定口号。到1998年为止，一共持续推行了五次（从2005年开始，以“国土形成计划”取代“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不过，中央向地方注入资金还能见效，只发生在日本还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度增长期。过了高度增长期后，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就变得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补助金，不再自力更生，呈现衰退状。但这是因为中央完全没有放权于地方，让地方行使权限自行努力。出现这样的

状态，要说理所当然，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结果。从这点看，我不得不认为，比起其他国家，日本的地方创生要来得更困难。

在日本，其实早已完成了“国土均衡发展”。我在2014年曾租车环绕九州两圈，并纵贯北海道800公里。也曾骑摩托沿四国行走1500公里，并在长野—富山之间绕行640公里。所到之处，看到以道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便是只有熊和狐狸出没的深山野林，也都已十分完善。问题是这些地方政府并没有“创造靠山傍海的驱动力带动地方经济”的构想，而是习惯于伸手向上面要钱吃饭。

如果安倍首相真的想搞活地方经济，就不应该总是高高在上，而是要让地方在真正意义上能够自食其力，同时有必要从根本上改革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不过，安倍首相完全无法理解这个结构性问题。

自民党在“再来一个”的欢呼声中，打着一会儿是“日本列岛改造论”啦，一会儿是”故乡创生”啦，一会儿是“地方振兴”啦等换汤不换药的旗号，并借着这些旗号向地方乱撒钱。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做法完全没有效果。尽管如此，安倍政权还是将“地方创生”作为国策，大张旗鼓地加以推行，此举无非是增长战略构想招数已经用尽的一个佐证。照这样下去，日本经济由于无法应对结构性变化，剩下的只有崩盘一条路吧。

## 股价上扬的“安倍·黑田泡沫”真相

尽管如此，或许还有一种反驳意见认为，在安倍政权的领导下，日本股价不是确实有了上扬，市场也呈现一派兴旺景象了吗？其实，这只不过是政府制造出来的“安倍·黑田泡沫”而已。

股价上扬的一个理由是：如前所述，由于许多企业股票派息金是“股价的3%”左右，所以机构投资家们认为，比起把钱存入只有0.4%利息的银行里或者购买国债，不如持股获得的股利高。这也就是说，还是姑且购买股票来得合算这个想法，使得生命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家或金融机构，将手头的资金替换成股票。

股价上扬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支撑安倍经济学的“官制行情”。也即为日本政府运营养老金的年金公积金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PIF）等机构，运用公共资金维持股价（Price Keeping Operation。简称PKO）。

比如，年金公积金运用独立行政法人机构，早就将约140万亿日元资产的25%，用来投资日本股票。此外，国家公务员共济组合联合会等三个共济组织，也发表了要与年金公积金运用独立行政法人机构步调一致的谈话。这三个共济组织的营运资产超50万亿日元，若再加上年金公积金运用独立行政法人机构的资产，总额超190万亿日元。据报道，年金公积金运用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与三个共济组织所设定的资产构成共同目标为：日本股票25%，国外股票25%，国内债券35%，国外债券15%。由于邮储银行或简易生命保险等也将资金转为股票，所以这些被称为“巨鲸”的机构投资家，还在不断地增购股票。

由于股价呈上扬局面，出现了我买你也买的人气“联动现象”。而且如前所述，机构投资家或金融机构，因为无其他投资目标，所以也只好将资金投入股市。看穿这种日本股市走向的外国机构投资家或对冲基金等，也将资金投入日本的股市。由此故，日本的股价得以一路上扬。这就如同在水桶里蓄水，水越多，水位也就越高，这纯属物理现象。不过，患有“恐高症”，对股市过热抱有较强警戒心的投资家

们，却因误判了投资巨鲸们的“食欲”，开始操作卖空基金等而遭致大损。这也就是说，日本股市是偏离投资家常识的“官制行情”。

而在另一方面，日本个人金融资产1700万亿日元，还几乎未入股市。这其中至少有80%还是一成不变地留在超低利息的银行或邮政储蓄、生命保险等机构里面。不过，这些钱会间接进入股市，难以想象国民与股市毫无关联。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个人不投资股票？他们为什么对股市漠不关心？除了不可思议还是不可思议。

## 如何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暴跌”？

股价一定会在某个时点下跌。上扬幅度越大，下跌幅度就越大。25年前的泡沫经济破灭，15年前的IT产业泡沫破灭，甚至是仅为7年前的雷曼兄弟破产，日本都经历过这些股票暴跌的惨痛教训。

举例而言，在泡沫时期，日经平均股价在1989年12月29日年终最后一场交易收盘价为38915日元，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许多经济分析师还预测“1990年春季，股指会突破4万点”。其中也有证券公司夸下海口，说还能“上涨至6万点”。但是，进入到1990年，股价开始下跌。同年10月暴跌。由于大家都沉醉于泡沫浮华之中，被麻痹了感觉。这就与IT产业泡沫和雷曼兄弟破产引发股市暴跌完全一样。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教训，要学会冷静地观察股市行情动向。

教导我们要冷静观察的“先知”就在美国。虽然美国目前的实体经济要比日本好得多，但领导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控股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他在2015年2月的股东大会上，公开了一封“给股东的信”。他在信中这样敲

响警钟：即使是美国企业，也已经没有很大的成长机会。因此，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无法达到过去的业绩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点——

就连有“奥马哈先知”之称的精明强干的投资家巴菲特也明言，已经无法再像原先那样给股东如此高的利率了。如果就连美国企业都没有亮眼的成长机会，由于少子化、人口减少，今后国内市场越发萎缩的日本企业，则更加是雪上加霜了。

尽管如此，现在日本的机构投资家眼中只有股息。忘记了股价是由什么来决定，忘记了公司合理的股价应该是多少，只认准“股息是股价的3%”这个理，就不断买进股票，而不是看中“企业的价值”才买股票。

所以，若有谁说一声“现在的股价背离企业现状”，炒股者马上就会有所领悟，股价就会急速下滑。最先抛售股票的，不用说就是外国机构的投资家或对冲基金。一旦他们感到“不妙”，就会瞬间抛售手中股票。而通过合议制来营运的年金公积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等机构，由于无法这样做，假设股价暴跌，日本人的养老金或储蓄就会显露于危险中。

那么，面对未来一定会发生的股市暴跌，持股个人如何应对才好呢？到目前为止，股价一直呈上扬局面，便依据指数选购股票种类（日经平均股价或叫做TOPIX的市场指数）也是不坏的选项，但是今后必须分散持股。这是因为如果按指数购股，一旦日经平均股价暴跌，就会被套牢。不忘股市投资的基本要素，自己学会判断股票市值（PER）或税前息前利润（EBIT），然后选购个股，应该是不会有大损失的。若要为更加严峻的国债暴跌作好准备，就不能只关注指数，

基础设施关联股的风险也很高。相比较的话，还是选购一些更为接近消费者的食品业界或日用品业界的强势股是明智之举。

此外，防备股市下跌局面，应该牢记投资的“三分法”：若“感觉不妙”，首先抛售三分之一；若开始下跌，再抛售三分之一；若有更大跌幅，抛售最后的三分之一。为了不至于在“安倍黑田泡沫”破灭之时来不及抛售，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关注嗅觉灵敏的外国投资家的动向。

## 剩下的选择是“战争”还是“消费税20%”?

那么，照这样下去，安倍经济学原形毕露，无法完成经济增长的目标时，又会变成怎样的局面呢？正如本章的前半所说，日本的国债将会暴跌，引发恶性通胀的可能性非常高。再加上由于暂时搁置了上调消费税至10%，其可能性就更高了（若如期调高消费税，导致市场经济低迷，也只不过是过去20年低迷的持续而已，其伤害反而会比较少）。

为了避免发生恶性通胀，政府必须要有偿还超过1000万亿日元国家借款的选项。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三个——一个是发动战争；一个是效仿希腊，削减四成国家岁出；一个是上调消费税至20%。三选一。如果三个选项都难以做到，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恶性通胀的发生。

如果陷入恶性通胀，物品或服务价值上升，货币价值下跌，国家借款将会渐渐消失。如果货币价值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那么借款金额也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如果货币价值只剩下原来的百分之一，那么借款金额也只剩原来的百分之一。因此，到了这个地步，政府若

再不采取对策，依据市场机制，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国债将会暴跌。

或许也会有人反驳，认为这么不见光明的脚本并非是现实。但我认为这绝非是悲观论。现在日本人应该思考的是，首先正确地认识现状的严酷性，并共同探讨其原因，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对策。这是因为用安倍经济学这种浮夸的乐观论，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回看过去海外的事例，受恶性通胀影响最深的是依赖固定养老金生活的这批人群。这是因为即使货币价值再下滑，他们领取的养老金仍是同额。而固定存款或私房钱也变得如同废纸。为了防备恶性通胀，持有资产的人应该将钱投资于保值的不动产（如好地段的公寓房等）或购买股票（参见图21）。

### 图表21　日本经济“恶性通膨化”的脚本

◆ 陷入恶性通胀时的影响与对策

| | 影响 | 对策 |
|---|---|---|
| 领取年金者 | ● 冲击最大<br>● 由于只能领取固定的年金，无力购买商品<br>● 存放家中的现金或定额存款俨然成为废纸 | ● 投资有增值空间的不动产（如地段好的公寓等），或是投资股票 |
| 正值工作期的年轻世代 | ● 背负房贷等的借款人，负担变轻<br>● 即使稍显迟缓，但薪资还是会随通胀率调高 | 由于企业裁员及倒闭的增加，须打磨自身的“赚钱力”（自我投资） |
| 企业 | ● 手头持有现金恐怕有变成废纸的风险，借款的负担压力变轻 | ● 面向未来，有效运用手头资金（设备投资、研发或并购等） |

© BBT 综合研究所

相反地，对工作中的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来说，恶性通胀倒反而是件好事。其中特别是背负房贷等借款的人，负担会减轻许多并有所得。至于年轻人的加薪，就算稍有迟缓，但由于还是会随着通胀率的浮动而加以调整，因而总能生出通融之道的吧。

不过，由于企业倒闭或裁员的增加，考量着每个人的“赚钱力”。为了就算遭遇恶性通胀也不至于流浪街头，经常（这也是应对恶性通胀的最强有力的投资）磨练自己的“赚钱力”最为关键。

在下一章，我将提出不必依赖安倍经济学的全新增长战略。

---

(1) “看板”是日语汉字单词，指一种信息道具。丰田用这种道具来指示生产或物料搬运，是实现拉动生产的重要工具之一。



第三章

# 新·经济对策
# 用“心理经济学”思考增长战略

## 过于简单的规定改革会议

安倍晋三首相和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联手推出的"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后，日元急速走向贬值。由于日经平均股价也恢复到了IT泡沫时期的水准，媒体也失去了冷静，大肆报道"这是安倍黑田景气""经济终于开始复苏了"。不过，这些过于乐观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现在的情况只是日本央行单纯用物理手法增加货币供应量，作为当然的结果，便是日元贬值。而资金的去向也只有流向股市，也就带动了股价上扬。仅此而已。换句话说是"小阳春"的假象需要景气。

想要克服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讲到的难题，把日本的经济由负增长转换至正增长，非得下大力气不可。

安倍首相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继货币宽松及财政政策之后，增长战略被放置于"第三支箭"的位置。但就从政府的产业竞争力会议或规则改革会议的讨论来看，看不到有新的构想或创见。比如，在产业竞争力会议上，虽然提出了扩大和强化"农业"出口，但从产业规模来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靠谱的政策（本章稍后将谈论我的农业改革方案）。而规定改革会议则局限于议论"过去曾经讨论过的59个改革项目"，也未免过于简单粗糙。

曾经被称为日本成长产业的游戏或动漫等领域，也悉数被海外企业追赶，甚至超越。特别是游戏产业中的主机游戏，在鼎盛时代都是由任天堂和索尼掌控了全球市场的份额，但如今游戏的主战场已经从主机游戏转移至智能手机，而无法应对这个变化的两家公司，则陷入了困境（大受欢迎的“精灵宝可梦”由美国开发，就极具象征意味）。

## 都心大规模再开发方案

那么，日本怎么做才好？我的提案之一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义无反顾之举”：让1700万亿日元个人金融资产立即进入市场。

为了消除由于提高支付养老金年龄所造成的中老年人对老后生活的不安，思考如何设法让他们的资金进入消费市场是必要的。中老年人属于不喜欢动用储蓄的世代，因此必须思考运用现有资产带动现金流的对策。而这只有大胆地废除规制才有实现的可能。

具体的方法之一，就是“都心（市中心）大规模再开发方案”。这正如我以前就在杂志连载中提议的那样，将大都市中心地带的容积率及建面率的限制，大幅度地放宽到与其他国家差不多的程度。同时我还提案，今后三十至四十年间，在大都市的中心地带，有必要将发达国家的特例制度“日照权”（保证建筑物日照的权利。如果附近的高层建筑遮挡了日照，可以提起建设中止的处分申请或损害赔偿诉讼等）束之高阁。

由于各个地方政府基于日照权的规定，依条例规范建筑物形状等，就算放宽了容积率或建面率，只要有日照权规定，建筑物的高度或形状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比如，调高容积率为现在的两倍，建面率

则从一般的60%变成了80%，若不在意日照权的规定，建筑物的使用面积就会扩大二倍以上。如果增加的面积得以出借，就带动了现金流。这里重要的是，为了能够筹措改建资金，个人也要导入与企业同样的资产担保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的思考方法。

身为房东，就以“将来可望有租金收入”作为担保，筹措需要的改建基金。这样的话，房东就不必动用自己的储蓄，转而从金融机构借款改建房屋。这是让银行里休眠的剩余现金投入市场最有效的方法。

## 繁荣的关键在于“土地的使用方法”

而且，借助这个方法还可以带动庞大的建筑市场，期待室内装潢、家电等关联产业的需求扩大。如若大都市的中心地带，能生出新的住房空间，住在郊外的年轻世代就会陆续回搬。回搬到市区，其吸引力就是上班族通勤时间大幅缩短，享受闲暇变得可能。

大都市再开发变得可能之后，让地方政府决定土地的使用方法，这点也很重要。现在的状况是无论是工业区或农业区、港湾区域、市街化调整区域等，所有的土地用途都是被政府的条条主义行政方式所束缚。

然而，繁荣的关键是土地的使用方法。如若全盘都让地方政府决定，那么全国各地繁荣的竞争也就鸣枪开锣了，日本各地大都市再开发热潮，就会一波接一波。这才是真正的地方自治。

为了活跃地方，当时的大阪市长桥下彻，为在大阪湾人工岛“梦州”建设包括赌场在内的度假设施，曾与海外的赌场资本大亨进行过相关的商谈。构想并不坏，但具体方策是不及格的。从全球看，赌场已

属夕阳产业。虽然澳门和新加坡赢得了料想不到的繁荣，但也属明日黄花。原本这两个赌场之所以繁荣，部分源于中国官员将之用来洗钱。但如今习近平重拳出击贪污腐败，此类现象已销声匿迹。对这些背景一无所知，就算招揽了赌业开了赌场，最后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博彩业行不通，但若能活用全国辽阔的土地，将包括法人税在内的各种税制和规则，全部委任给地方加以重新研究，就可以吸引外资，成为亚洲创业者的据点，日本经济就能一下子活跃起来。

## 15年后日本所需要的对策是什么?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胆地废除现有规定，也一定伴随副作用。如若实施前面所说的都心大规模再开发方案，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就会出现人口减少、景象萧条的现象。或者，如若废除雇佣规定，企业解雇员工变得容易，或许在短时间内失业者就会增加。

在海外，曾经彻底实施过废除规定的代表事例，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总统里根。不过，他们二位都是在取消相关规定之后，在新产业或雇佣需求还未出现之前，失业人口呈暴增状。因尽显改革负面效应，政权也为此饱受批判和攻击。一直等到放宽规定后效果出现，出现新产业，经济复苏，雇佣增加，英国也好美国也好，都差不多花了15年的漫长岁月。

基于这一严酷的现实，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如果要在短期内出效果，除了切实推进前述的废除市中心地带建筑限制，使经济得以回升的同时，也要提出15年后日本所需的方策。安倍政权必须把这两个“时间轴”存记于心，断然实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做或许与明天

的选票没有关系，但是作为当今日本的政治家，正需要以此时间轴进行思考，塑造未来国家的理想群像。

深感遗憾的是，观察安倍政权，在日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问题上，我们既看不到实质性的构想，也看不到有接受眼前阵痛的勇气和觉悟。为了放宽引进外籍人才的条件，虽然提出了创立“国际战略特区”的方针，但这种小幅度的放宽，仍然是太微弱，太不充分。如果不从“废除”规定方面着手，新产业是不可能产生的。

总觉得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所有领域，看得出“保守”状态似乎在恶化。安倍经济学也是用国民的税金，推出财政政策；日本央行与银行之间，则在倒手国债和现金。这些充其量也只是搅动杯中水而已，无助于实体经济的向上和经济的好转。

政府召开了很多会议，提出了很多方案，就像豪华的幕之内便当[1]，罗列了很多“改革”项目。但改革如果不集中在一点上，那是无法顺利进行的。如果有两项改革，就应该错开“时间轴”先推动其中的一项。

## “东京一极集中”，拯救地方于消失的危机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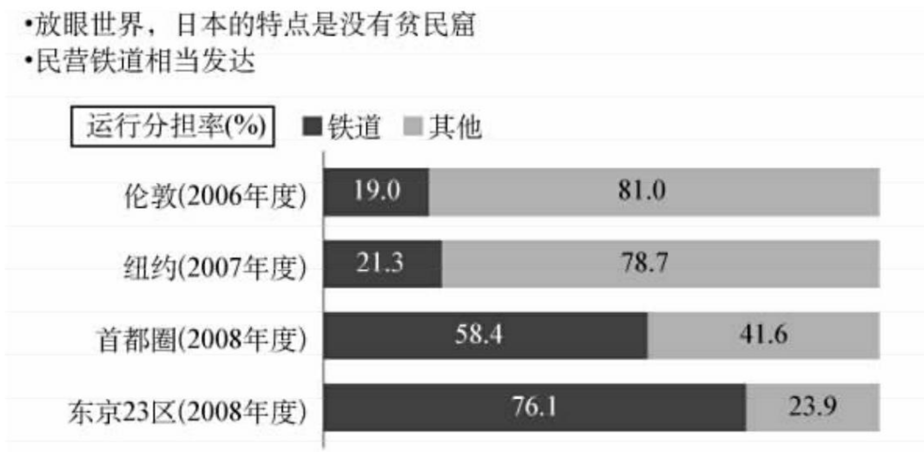
2014年5月，由专家学者组成的民间团体“日本创成会议”，召开了探讨人口减少问题的分科会。在分科会上，他们公布了一个带有冲击性的数据估算：藉由生育年龄20—39岁为主的年轻女性减半，到2040年，日本全国1800个地方自治体的一半，即896个市区乡镇将面临“消失”的危机。对于这个话题，我仍然记忆犹新。作为问题的对策，分科会上有人提出要匡正人口过于集中东京的现象。但是，我的看法正好

与此相反：东京一极集中才是日本最为理想的模式，甚至应该进一步加速才好。

这是因为东京是世界上公共交通网最为发达的都市（参见图表22）。尤其是地铁线路像网眼似的通向四面八方，搭乘私铁也可转乘国铁（JR）。这样的都市，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根据东京都环境局的资料显示，山手线（东京都内主要的环状轨道交通）地区内从车站步行5分钟的范围约占区域的64%，步行10分钟范围几乎就覆盖了整个区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轨道交通方面，东京是全球交通最为便捷的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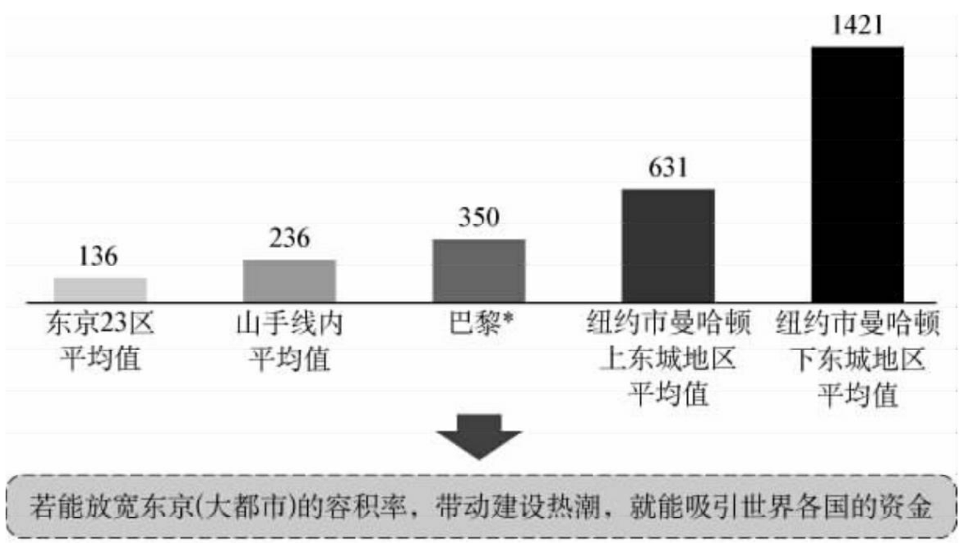
图表22　借由“放宽容积率”更能强化日本的大都市

◆ 日本大都市的特征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与强化国际竞争力相关的社会资本的国际比较》

◆ 都市圈容积率比较（%）




*巴黎的容积率规定上限

资料来源：森大厦都市再生计划组《城市之力　超高层化丰富生活》；日本国土交通省《关于首都高速再生民间学者会议　建言书　参考资料集》©BBT综合研究所

因此，即使东京人口再集中，除了上下班和上学时段的新宿或涩谷、东京、池袋等几个大型车站之外，其他车站并没有拥挤感。由于东京高层建筑物的数量在增加，白天进入市区的人口再多，也足能容纳。如果有超过容纳量的大量人群涌入市区，一般这个城市就会出现

贫民区。但东京的情况是大部分人因为清晨上班上学，从山手线的外围进入市中心，傍晚再回到各自住家，夜间人口增多减轻，因此并未出现贫民区现象。我认为，这在世界大都市中，亦属独一无二的好例。

实际上，人口往东京集中的现象，并没有刹车的感觉。最近，从首都圈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转居东京都的人口有所增加。2013年日本都道府县的人口增长率，东京为全国第一位（0.53%），远远超过第四位的埼玉县（0.14%）和神奈川县（0. 13%）。排列第九位的千叶县则成负增长，人口减少了0.04%。曾经是东京卫星城的埼玉县埼玉市以远地区、神奈川县横浜市南部或横须贺市、千叶县千叶市以远地区等，人口减少呈现无法停止的状态。不过，我认为，这些以远地区倒反能作为"休憩场所"，理应重获新生。该问题容我后叙。

## 比起纽约或巴黎，更有余裕的是东京

在东京都，尤其是都心的千代田区、中央区、港区这三个区内，近年陆续建造了不少超高层大楼，人口增长显著。这就是所谓的"回归都心"。

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三区中的中央区，与2000年相比，人口增加率是35.67%，属全国第一位。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也表明，与2005年相比，该区的人口增加率是24.8%，属全国第二位。从构成人口的年龄层来看，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迁入的人最多。其理由推测在于交通。25年前上下班仅单程就需要1小时20分钟，而如今45分钟的通勤时间又缩短至30分钟内。此外，退了休的银发族们也从郊外回归

都心（退休后不需要到市区上班了，反而把家搬到了市区。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但中央区的老年化率在东京23区中属最低，只有16.5%。

这种人口回归都心的东京一极集中趋向，今后会越发加速。这是因为诚如我后面所言，与纽约或巴黎相比，东京都的屋顶上空，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我以前就曾提案，实行放宽容积率的政策，将湾岸地区曼哈顿化。这个提案若能切实推进的话，就能将如今山手线内环圈内平均只有3层楼的住宅建筑，翻倍改建为6层楼高度。若能再组合定期借地权[(2)]，东京都心公寓楼的价格，应该能降至现在一半的水准。

这也就是说，只要放宽容积率这一项，山手线内环圈内房价就会下跌，就能容纳多于现在的一倍人口。这些人就像前述，步行到车站都在10分钟圈内，上下班的负担也就大幅减轻。毫无疑问，到时候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数会有增加。即使这种“首都圈逆甜甜圈化”趋势有所加速，也不会出现反向回归郊外景象的吧。

## “冷藏”湾岸地区土地的愚蠢做法

搭乘行驶在东京湾的新交通系统“百合海鸥号”，一经过“市场前站”，能看到夹挟着运河的南北两侧广袤土地。北侧是晴海地区，南侧是有明地区。这片广袤的土地才是首都东京土地开发大潮的起爆剂，只可惜这个国家似乎缺乏具有远见卓识的“都市再建”领导者。

东京都前知事舛添要一，在2014年就任时高调宣言：“要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成史上最辉煌的运动会”，“要以再生能源运营晴海选

手村”，“在奥运开幕之前全面修整首都高速公路”等。

不过，听了这些宣言后，我不禁悲从中来。因为这片不可多得的湾岸区域的土地，蕴藏着东京的再生可能性，但到2020年之前，却处于被“冷藏”的状态。

而且东京都的计划也是够短视的。他们打算在晴海建造约5000户中层建筑物作为选手村，奥运会结束后原封不动转用于民间住宅。筑地市场搬迁至丰州后，其原有土地也只是分块出售，没有一个像样的整体计划。

晴海和筑地市场的原有土地、胜哄、丰州，以及包含预定建造体操场馆或自行车场馆等奥运会关联设施的有明在内的整个湾岸地区，可以说是东京最后的一块新天地。这块土地才是作为真正的国际都市，让首都再生的一大据点，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场所。

为了从全球各地吸引人才，资金、物资、信息（不仅是奥运会二周内，而是持续每天），假设在湾岸地区打造“兼具工作和居住功能的24小时城市”，推进整体的再开发计划，首都的风貌会完全改观。

具体而言，要打造具有魅力的城区，就必须配套吸引外资企业来东京投资的居住环境、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如高级住宅区内外派人员配偶的工作场所或交流场所、国际学校、教会等设施）。此外，我还想提议的是，要打造成像美国硅谷的帕罗奥图（Palo Alto）一样，既有斯坦福大学，也拥有创新构想的年轻人和投资家、律师、创业孵化器等专业机构的交流场所。

之所以能从硅谷接连不断地诞生世界级企业，是因为“交流场所”发挥了力量。充满挑战精神的人，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起，因相互交

流萌发构想，形成新的服务项目，然后再与寻找投资机会的投资商相遇——可以说硅谷就是创生出这种循环的场所。

为了在东京打造类似的场所，我们必须从零开始改造城镇，而且重要的是向都心靠近。在东京都内，拥有数十万公顷广袤的土地，而且大部分属东京都所有，目前只剩下湾岸地区了。若能打造成功，我们就可以期待诞生出类似谷歌这种能改变世界的企业。我认为，提出这样的都市计划和城镇建设的宏大远景，是领导者的任务。遗憾的是从现状看，他们只是在“一切为了东京奥运”这个蛊惑人心的口号下，谈论都市再开发计划。

## 以街区为条块，打造防灾的强力都市

“东京奥运会将成日本经济复苏的牵引”。日本的街头巷尾洋溢着欢欣鼓舞的气氛。关于东京奥运会的经济效果，东京都的估算约为3万亿日元（仅限关联设施的准备费或运营费），瑞穗综合研究所的估算包含了波及效果在内约3.5万亿日元，而庆应大学教授竹中平藏担任所长的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则估计，若加上访日外国人的增加及住宿设施的增建，铁道及道路的整理，提前都市开发等因素，东京奥运波及的经济效益约为19万亿日元。更为甚者，大和证券打出了“150万亿日元”的超常估算。这个估算包括“55万亿日元的道路扩展工程，首都高速公路整修等相关建设，再加上民间投资及雇佣增加，观光业扩大等带来的95万亿日元”。

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举办奥运会，如1964年的日本，1988年的韩国，2008年的北京，铁道或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

模建设，确实支撑了这些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但反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或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的发达国家，最多只留下一两处具有象征性建筑物，除此之外无法期待带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比如，东京都前知事舛添要一曾表明，首都高速公路的修建与国土强韧性计划一样，并不是建造新的基础设施，而是修整和加固现有设施，因此，几乎无法带来经济效果（用于修整的经费除外）。

原本，首都高速公路的修整与奥运会的举办并没有关系，这只是东京都政府应该推进的一个常态性的工作而已，若以奥运会为借口，我认为是本末倒置了。此外，虽说奥运期间访日外国游客会增多，但也是短暂的两个星期，这之后东京不会因为“奥运经济”而繁荣。

东京都知事不可将都政事务的优先顺序搞错。现在重要的是，将东京打造成真正的国际都市同时，也让东京成为抗击以地震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强力都市。首都直下型地震，虽然不知何时发生，但早晚一定会发生。对此做好万全准备，也是知事的责任吧。

首先，必须做的是土地“液化对策”。据东京都发布的“液化预测图”，液化可能性较高的区域依次集中于以下四区：足立区（约19平方公里）、江户川区（约14平方公里）、葛饰区（约12平方公里）和大田区（约11平方公里）。因为这些区域也是人口密集的住宅区，所以必须尽早采取对策。

另一项工作就是对杂乱的平民住宅区的再改造。江东区及台东区、葛饰区等的平民住宅区，低层木造房屋盖得很密，道路狭窄，连消防车也无法进入的错综复杂的小巷弄很多。我认为，在这些地区应该导入像纽约或京都的棋盘格子式“街区”概念。比如，应该以100×150米左右的面积为街区条块，推进包括地盘强化在内的再改造计划。

藉由街区条块化的改造工程，道路得以拓宽，上下水道或电线、光缆等，可以埋设于抗震力较强的地下；公园、绿地、广场等开放空间也因此得以诞生，成为符合首都的景观。而如果能在每个街区设置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发电机、储存饮用水或食品，就能成为强大的抗衡灾害的城区。我认为，这类新颖的都市计划，应该从东京抗衡灾害能力最弱的平民住宅区开始。

## 活用“外部经济”就无需使用税金

而且，我们还必须看到，地价高人口多的东京，在着手再开发的时候，还能活用“外部经济”。

从容积率来看，目前山手线内环以内建筑物的高度，如前所述，平均在3层楼以下。若将这些街区条块化后，建造类似巴黎6层楼为基准的建筑楼，即使扣除原本土地所有人（指拥有土地所有权或借地权的人）所持的部分，在新大楼建造好后，使用面积的一半以上可以转手卖出（或租借），因此再建费用完全可以自己筹措。如建造6层楼不够收回成本的话，就建造7层楼或8层楼，直到能收回成本的建筑高度或使用面积为止。这是东京都政府若想实施，就能实现的事情。

至于加固地基或基础设施等公有部分，就算东京都先支付最初的启动费用，但到再建大楼完工后，用销售掉的资金扣除先前支付的费用，所剩余额就可以成为下次再改建的启动资金。这也就是说，几乎不用税金就能完成东京的再开发。原本所谓的“外部经济”，就是指经济活动带来的润滑，也给当事者以外的对象带来好处。这里借由都市

建筑往空中扩展，以及个人房产交易的活跃，就能给都市带来整体的经济效益。

其实，涩谷区就是利用民间资金，在未动用区政府费用的情况下，改建了区政府办公楼和涩谷公会堂。他们将区政府办公楼一部分用地，建造成37层、120米高的公寓大楼，然后租借出去。然后运营租金收入，充填到15层楼高的办公大楼和备有2000席位的新公会堂的建设费中。

这项再开发计划的看点，在于大幅放宽建筑面积和容积率。我一直认为东京都心的建面率和容积率的规定是荒唐的。为了东京的再生，东京都知事应该拿出大幅放宽规定的措施。

## 对土地所有权者也有吸引力的再开发

不过，目前市区再开发面临很高的门槛，就是征得“土地所有权者的同意”。依据现行的都市开发法，市区的再开发必须征得土地所有权者100%的同意。反过来说，拥有土地所有权者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无法实施开发计划。因此森大厦公司计划的再开发事业，从着手到竣工，方舟之丘和六本木新城，用了约20年时间，表参道Hills用了近40年时间。

针对街区条块化的再开发，只要土地所有权者过半数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者，就应该推进计划的实施。将规定作如此的变动，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按照目前的状态，再开发是无法进行的。如果遇上东京直下型大地震，液化可能性高的地方，建筑物就会倒塌，而平

民住宅区就会像阪神·淡路大地震时的神户市长田区一样，陷入火海之中。

再建的大楼到完工为止，需要2—3年的时间。虽然在这段时期，土地所有权者必须搬迁至其他地方生活，或在临时的店铺营业，但等到新大楼建成后，就能过上比以前更为安心与舒适的生活，而且费用负担为零。另外，对于不参加再开发事业、希望迁出的所有权者，现有的资产可估算成金钱加以补偿。总之，客观来看，由于对土地所有权者来说利大于弊，只要过半数或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就可以再开发。可以说，就算是“缺失人情味的规定”也无所谓。不是吗?

领导者的工作，就是“决定方向加以实现”。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的后继者是小池百合子。作为首都的领导者，希望她能做两件事。一件是湾岸地区的整体开放。另一件是对于液化可能性较高的松软地基上木造房屋密集的平民住宅区的某个地方，做出依据街区条块化方案进行老街再改造的示范先例。

如果能先期做出一到两件示范先例，让民众明确知道老区再改造的好处，看到这番光景的其他地区的土地所有权者们，毫无疑问也会争相跟进，希望再开发。如是这样，在今后20年，运用民间资金再建高楼大兴土木会接连不断，从而带来比奥运会更大的经济效应。

## 回归都心的人们，周末乡村游玩

至此如前所述，藉由都心的再开发，人口向东京集中的现象会越来越明显。

就东京人口集中的弊端而言，一般会列举地方经济会更加低迷，或是税金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增加税收的只有东京，其他许多地方自治体的税收，则无法增加。但是，我倒认为不妨逆向反转“回归都心”这个倾向，在东京市民中推广周末或休息日“离开都心”这个想法。也就是说，明确区分“都市作用”和“乡村作用”。对周一到周五一直待在市区的上班族来说，认识到东京是“工作的场所”，乡村是“休闲的场所”，并向他们提议切换工作和休闲的新生活。

比如，居住在纽约或伦敦、巴黎的很多市民，周末会到郊外的度假屋，悠闲享受自然。莫斯科的市民们，也会在周末去一个叫做“达恰”（Dacha）的郊外别墅（带有农地）度假。他们不像东京市民那样，整天待在家里睡觉或去附近超市购物或散步，无所事事地打发周末时光。

所以，今后如果把目标设定在吸引东京都市民周末度假上，从东京出发搭乘电车（轨道交通），距离在一个半小时内可到达的风光明媚、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建造周末度假型别墅或农庄，并作为不动产加以销售，那就很不错。我认为，如是这样，市区的居民，用周末的两天时间去乡村度假购物，由此东京七分之二以上的GDP会流向地方，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从东京出发搭乘电车（轨道交通），在距离一个半小时可到达的范围内，如再转乘新干线，那周末旅行可达的范围就更广泛了。搭乘原有的电车，就可到达三浦半岛全域、伊豆半岛和房总半岛的一半。如今，搭乘西武池袋线·西武秩父线可达西武秩父；搭乘东海道新干线可达静冈；搭乘上越新干线可达越后汤泽或浦佐；搭乘东北新干线可达宇都宫或福岛；搭乘北陆新干线可达佐久平或上田。比起在这些地

方增加居住者的做法，我认为更为明智的做法就是活用便利的交通和当地下跌的不动产资源，致力于出台吸引东京市民去那里周末度假的方案。当然，也需要各家铁道公司的协力，有必要推出类似“周末定期”的特别折扣票等。

以上的提案，不仅适用于东京，也适用于全国各地人口超过50万的政令指定都市等级的城市和周边地区。在我看来，即使在地方，具备完善的公共交通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核心都市，更应该强化和充实其机能，促使其周边人口过于稀少地区的居民迁往都市，区分都市与乡村的功能。

如果不做出这方面的努力，那预言中的人口持续减少，而面临消失危机的896个市镇村，要一如既往地维持现有生活水准和行政服务，只会变得愈加困难。

## 让冷清观光地再生的方法

人口减少难以停止，“有可能会消失的城市”在全国各地到处存在。这样下去，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崩盘，只是时间问题。虽然被定性为无可救药了，但我认为还有可救之法。方法之一就是“开发度假胜地”。

放眼世界，许多度假地就是因为海外观光客而热闹，充满人气起来。比如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澳大利亚的汉密尔顿岛或海曼岛，加拿大的惠斯勒黑梳山，瑞士的圣莫里茨，奥地利的富拉尔贝格等（参见图表23）。日本北海道的新雪谷（亦称二世谷），也深受外国游客的喜欢。

图表23　有很多借由海外观光客而人气热闹的度假胜地

◆ 世界上知名海滨·海洋度假村




◆ 世界顶级的滑雪场




资料来源：各种文献和报道 ©BBT综合研究所

世界各地，特别是很多亚洲的有钱人，非常喜欢日本。这是因为日本的治安良好，料理鲜美，又有风光明媚的山岳景色与温泉，以及

冲绳的珊瑚礁与美丽的海洋之景等，观光资源十分丰富。怎样吸引这些海外有钱人造访日本的度假村，将成为今后振兴地方经济，为地方带来活力的关键。

反观日本，曾经聚集人气的观光地，如今则是门可罗雀，一片萧条。其典型就是新潟县的越后汤泽。搭乘上越新干线从东京出发，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达的越后汤泽，曾经有过挤满滑雪客的好时期，但作为标准的度假地，还有不够完善、缺乏魅力之处。此外，冬天以外的季节，完全没有可以让观光客造访的游玩项目。再加上受到泡沫经济破灭以及滑雪客减少的影响，当时建造的有超百幢的公寓楼，一大半空置，成了幽灵住宅，一套住宅仅以50万到550万日元的价格甩卖。滑雪客减少的另一结果，就是周边20家滑雪场也先后关闭，整个街区一片冷寂。

越后汤泽真的无可救药了吗？完全不是。我认为，越后汤泽完全有可能再生为亚洲一大度假胜地。

## 向惠斯勒黑梳山或汉密尔顿岛学习

能够成为我们参考的是前面提及的惠斯勒黑梳山。该地是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两座山之间有超过200条的滑雪道和39个滑雪缆车、滑雪板、滑雪用的U形池，儿童游乐园等设施也很完备，堪称规模巨大的滑雪度假胜地。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滑雪高手，无论是儿童还是老人，所有的滑雪者都能享受到乐趣。而且滑雪场地总是以最优状态，备有多种滑雪坡道。位于山麓的惠斯勒村不仅设有高级宾馆和共同管理型的公寓，也

设有一流的饭店、酒吧、舞厅、电影院、各种商店等，供滑雪完毕的游客，舒适地度过休闲时光。汉密尔顿岛和海曼岛也是如此。这些地方之所以能以这种完美的概念进行整体的开发和运营，就在于整个度假胜地是由一家公司经营的。

相比之下，日本的越后汤泽，每条升降缆车或滑雪缆车、住宿设施、饮食店等，其经营者都是不同的业者，缺乏一体感。所以与日本车站前的商店街一样，一家一家放下铁门结束营业，而山麓边上的小城镇，只有往返滑雪场时会有人走过路过，街景凄凉。其他的滑雪场，也是同样的景象。

日本的滑雪场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住宿的设施还停留在贫瘠时代建造“大学滑雪社团集体宿舍”的水准上。高级宾馆或一流饭店很少，主要以旅馆、民宿、小木屋、食堂、居酒屋为主。另外，转乘升降滑雪机时，滑雪客必须一跩一跩地攀爬斜坡。这样的滑雪场，我在海外没有看到过。世界有名的滑雪度假胜地，都是设计成滑下斜坡然后再转乘滑雪缆车。

总之，世界级别的滑雪场，必须建造成适合富裕阶层、高龄者以及家庭同乐型的舒适的度假胜地。如果能将越后汤泽改建成与海外同等水准的度假地，不仅离东京近，而且从12月到隔年5月末都能滑雪游乐。如是这样，我认为，越后汤泽就有可能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滑雪度假胜地。

## 让湿地一下变成迪士尼的梦幻力

有再开发潜力的不仅仅是越后汤泽。包括野泽温泉或志贺高原等长野县饭山市周边的滑雪场在内，如果也着手一元化再开发的话，也能描绘出同样的远景。这就是我所提案的“千曲超级谷区构想”。

再比如，一直处于经营不善的宫崎市凤凰喜凯亚度假村，如果能将道路拓宽至海岸附近，参考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著名的多拉等城镇的做法，在高尔夫球度假村里特设美容SPA及健身房，就能吸引亚洲富裕阶层来度假，不就可以使其再生了吗?

其实这些地区作为休闲度假的外部环境还是不错的，只是没有加以活用。这是因为缺失将地区价值最大化的概念（参见图表24）。关于这方面，JR九州豪华观光列车“七星号”是个启发。明明整个旅程并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光地或住宿地，但就是吸引了富裕层，达到了一票难求的人气度。这样来看，休闲度假经济成功的关键，就是看是否有让枯木开花，让荒凉之地聚满游客的出类拔萃的构想和企划。仅此而已。

就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华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区来说，原先是一块只有鳄鱼栖息的湿地。华特·迪士尼梦想在这里打造一座试验未来都市或魔法王国。他描画了面积相当于山手线内环圈约1.5倍大小的娱乐度假村计划。换句话说，就算有了像华特·迪士尼那样拥有“慧眼识途之力”的人，有了像投资家迪克·巴斯（Dick Bass）那样的协助者，但不进行综合开发的话，也无法诞生能够吸引世界各地观光客的度假胜地。

图表24　日本度假村的课题是如何整体开发

| 日本度假村开发的课题 | 世界各地度假村范例 |
|---|---|
| 局部开发 | ● 度假村不能局部开发，宽广空间本身是其资源<br>● 惠斯勒黑梳山（加拿大），黄金海岸（澳大利亚）等 |
| 缺乏长期居住的概念 | ● 长住型→自炊+餐厅<br>● 日本旅馆→强制一宿二餐 |
| 周边旅游提案不足 | ● 美国的国家公园、加拿大篷顶拖车旅行<br>● 法国布列塔尼、瑞士阿尔卑斯山、意大利世界遗产巡礼<br>● 地中海邮轮、亚得里亚海、希腊爱琴海，等等 |
| 缺乏吸引眼球的休闲项目 | ● 游轮、滑雪、海滨、高尔夫、自然、SPA+健身房 |
| 人造部分吸引力不足 | ● 迪士尼世界（美国奥兰多）<br>● 百老汇（美国纽约）<br>● 罗德欧街+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美国洛杉矶） |
| 未让“美食”鲜活起来 | ● 米其林指南<br>● 西班牙的巴斯克+圣塞巴斯蒂安<br>● 斗牛犬餐厅（西班牙/加泰罗亚地区），世界上最难预约的餐厅。如今停业中。后被丹麦的NOMA餐厅取代成世界第一，但也因食物中毒而临时歇业。 |

**有必要研究世界各国的观光地、度假地及游客的去向**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BBT综合研究所

目前，世界级的度假胜地年年都有变化翻新。特别是亚洲，由于聚集了像安缦普瑞（Amanpuri）、六善（Six senses）、四季（Four Seasons）、唯逸（One & Only）等住宿一晚超过5万日元的高级度假村，引起了世界级富豪们的注目。如果能尽知这些海外一流度假村的经营理念，加上能描画出更为美好理想的都市开发者，逐渐凋零的日本乡村地方反而能用绝佳的外部环境，促使现状有个大幅度的改观。

## 有“大人”在，海上休闲有戏

度假村有望开发，其实还有其他理由。

今后要扩大占日本经济六成的个人消费，主要目标应该锁定在“有存款有闲暇的群体”。也就是“银发族”。其实，如今的日本，占整体消费46%的是60岁以上的银发族。能够成为今后扩大个人消费最大得分点，就是如何刺激60岁以上这一群体的消费，让他们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为此，必须把握60岁以上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有一个颇具意味的调查结果。根据博报堂“新型大人文化研究所”的调查，在60多岁的群体中，自认自己为“老人”的比例为56.0%，但实际上愿意被称为“老人”的只有12.2%。此外，该社还以40—60多岁为对象的另一个调查表明，这些对象并不希望被人称为“高龄者”、“中高年”、“老人”，而愿意被称为“大人”或“新大人”。

总之，中高龄者并不想被当成老人来看待。如果能准确把握这种消费心理，提供令他们乐意的商品或服务，高龄者在整体消费所占的比例，就会从原来的46%提高到60%。不，我认为甚至可能达到70%。

作为扩大中高龄消费者的有效手段，我想提议的方案是活用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渔港，创生出搭船游玩或钓鱼等海上休闲的消费模式。

如今，日本的中高龄者对登山兴趣很高，导致全国各地的大小山脉人满为患（登山死亡事故也有所增加）。这是因为谁都想随时随地轻松登上山顶，享受自然。

而在另一方面，海上游玩则极为封闭。身为岛国的日本，海岸线长达35000公里。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渔港，数量多达三千多个。大

部分的渔港都是用税金建造的。尽管如此，渔民则占据着几乎所有的渔港，完全不对普通市民开放使用。除渔民之外，游艇或快艇能自由进出的渔港，只有位于房总半岛西部的保田渔港（千叶县锯南町）等极少数几个。这个地方有渔协直营的食堂“番屋”，是个开车兜风也很有人气的娱乐场所。

但是，在欧美国家，所有的渔港都对普通市民开放使用，老人们与儿孙一起享受海上休闲。比如，挪威几乎家家都有一艘船。而希腊或克罗地亚的所有渔港，任何国家的船只都能免费自由停泊。船舶的停靠，采取“先来后到”顺序。先靠港的船只，用绳索拴在栈桥的系缆枕上，下一艘船，则横靠边上。之所以采用这种停泊系统，是因为想让自己的渔港能有更多的船只过来停靠，然后用餐或观光，把消费的资金留在当地。实际上，地中海的希腊或克罗地亚的渔港，来自英国、德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国的豪华游轮非常之多。而加勒比海或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港口，则停满了来自美国的游船。其大部分游客都是退休族，有时间上的充裕性，所以能长期停留。

我认为，日本也应该模仿这些国家的做法，全面开放渔港，让所有游客都能随意自由进出。

## 令人动心的“第二人生”

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打造“海上车站”。船舶放置费一年为2万至3万日元，靠港停泊的费用一天为1000日元左右，并在港口设立美食餐厅、食品店、土产店、加油站等。如是这样，当地的渔民或渔协以及港口，就能从游客用餐或购物中赚取收入。特别是在三浦半岛或伊豆

半岛、濑户内海、长崎九十九岛或五岛列岛、鹿儿岛的锦江湾或奄美群岛，以及冲绳等地，有助于扩大海上休闲的关联消费。

目前在日本，享受船舶游玩的人还很少。我认为，其最大的理由就是渔港没有开放。如果能打造成谁都可以以每年2万—3万日元的费用，将船只放置在离家最近的渔港，而且又能自由地靠港停泊在全国各地的渔港，毫无疑问，有钱财有闲暇的高龄者最先会心动。

原本来看，大部分的上班族一到退休，就整天待在家里，不是看电视就是睡觉。即使外出，也差不多是在带狗散步的时候。论兴趣，也最多是打打高尔夫球、旅游，或在自家阳台上种植简单的兰花之类。很多人充其量也就这三种兴趣。

不过，在我看来，为了充实漫长的第二人生，有必要在“屋内”、“屋外”、“一人”、“伴侣”这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中，各培养两种兴趣，合成八种兴趣。如果我们也能像意大利人“临终之际储蓄为零”那样想得开，消费也就能大幅提升。从这一意义上说，海上休闲，特别是船舶游玩，是今后日本人应该养成的兴趣，也是最为丰富地刺激需求，拉动消费的“矿脉”。

如果想让日本景气复苏，经济好转，我认为，比起实效不多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还不如开放渔港（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新大人的“大人消费”，要来得更为有效。

## 北陆新干线为什么大受欢迎?

象征2015年一大热点，就是“北陆新干线”。3月份，开通了金泽·富山—长野区间段。原本金泽—东京之间，单程就需要4小时，现在搭

乘特快型“光辉号”（每天10个车次）只需2小时28分钟（富山—东京之间，单程为2小时8分钟）。我曾在杂志的连载文章中，就反复强调过北陆新干线开通后带来的革新性，果真如所预料的那样，大受欢迎。迄今为止，我们虽然开通了上越新干线、东北新干线、山形新干线、秋田新干线等，但这些新干线终点站周边，几乎没有什么观光景点。

与此相比，北陆新干线则显得别具一格。比如，过去曾经作为加贺百万石城下町的金泽市街上，就有包括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以及东茶屋街，长町武家屋遗迹，近江町市场，金泽21世纪美术馆等景点。观光资源非常丰富。

不仅仅是金泽，富山的“稻草（owara）风之盆”也以祭祀著名。抵达富山附近的黑部宇奈温泉车站，可造访黑部峡谷及宇奈月温泉。从金泽乘坐北陆本线，约25分钟可抵达加贺温泉车站，可游玩素有“关西后院”之称的加贺四大温泉（栗津温泉、片山津温泉、山代温泉、山中温泉），富山附近也不缺观光地。日本海新鲜的鱼虾贝类，高水准的和食料理及日式茶点等，有的是一饱口福的美食。此外，还有加贺友禅、九谷烧陶器、轮岛涂漆器、金泽金箔、加贺描金画等传统工艺，也是多彩多姿。

另外，从金泽乘坐特急“雷鸟号”（Thunderbird），约一个小时可抵达包括和仓温泉在内的能登半岛，位于长野和糸鱼川之间的饭山以及上越高原，与首都圈的距离一下拉近了。特别是饭山，一到冬天，我几乎每个周末在这里骑乘动力雪橇快乐往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周围有斑尾高原和野泽温泉等，也有好几家上等的滑雪场及温泉。春天，从千曲川河畔望去，尽是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田，随风招

展，一望无际。诗人山村暮鸟27行《风景》诗，其中第24行以“涟漪不绝的油菜花”诗句，对此作了描述。

另外，北陆新干线车体（E7系/W7系）设计及颜色，也是格调鲜明且优美。而且与东北新干线相同，也导入了一节（18个坐席）比软席车厢更高级的特等车厢（相当于客机的头等舱）。隔开通道的两旁，普通车厢分别是2/3坐席配置，软席车厢分别是2/2坐席配置，而特等车厢则分别为1/2坐席配置，显得宽敞。在北陆新干线开通之前，由于东北新干线“浅间号”也导入了同样的特等车厢，因此在去轻井泽之际，试乘过一回，感觉非常舒适。想不到一试竟成铁杆回头客。在开通前的杂志连载文章中，我以“搭乘特等车厢，前往最棒的金泽”为题，介绍了北陆新干线的高档。我在文章中提言，如果策划一个豪华组团游，肯定也会像JR九州的豪华游轮式列车“七星号in九州”一样，大受观光客的欢迎。实际上北陆新干线开通运营后，真是盛况空前，连预约都一票难求。

## 打造高档客喜欢的设施

另外，北陆新干线似乎也受到外国观光客的欢迎。依我接待过无数外国人来日本旅游的经验来看，我认为对已经看腻京都或奈良的欧美人来说，还保留古色古香的街道建筑风味，还未露骨地观光商业化的金泽及北陆地区，更有其吸引人的魅力之处。特别是离车站和机场很近的富山，如果能成为外国旅客“通往北陆游玩的玄关口”，金泽的拥挤程度就会消失吧。

还有，欧洲人相当喜欢飞驒高山，从金泽搭乘高速巴士需要两个多小时，从富山搭乘电车最快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而且途中还能顺道白川乡。另外，还能期待大批中国游客，也会蜂拥而来。在轻井泽或白马等观光地，已经到处是中国游客。中国的廉价航空公司（LCC）春秋航空，也正在讨论开设从上海到羽田机场或上海到成田机场的航线。毫无疑问，今后中国游客更会大幅增加。

届时，常来日本旅游的回头客，会利用搜索引擎百度的旅游信息或利用春秋旅行社等旅行公司的组团，关注北陆。最近中国游客也开始喜欢上温泉，因此对宇奈月温泉或加贺温泉乡的兴趣，也会提升。况且中国游客的成批出行，与日本的旅游季节并无关联。樱花、新绿、红叶、雪景——只要宣传日本四季的魅力，吸引中国游客前来，就能将旅游季节均衡化。

但是，还是留下了待解决的课题。这就是从长野出发的沿线车站附近，面向高档游客的豪华住宿设施太少。金泽和富山另当别论，饭山、上越高原、糸鱼川等地，只有商务酒店或小型的温泉旅馆以及类似大众食堂的餐厅。这样来看，无论是面向日本游客还是面向中国游客，如今只有打造高档豪华的旅游市场，才有利润空间。

## 以由布院和黑川温泉为范本

北陆主要的温泉小镇上，当初瞄准团体游客而建造的大型旅馆及宾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也都相继倒闭。往昔的繁华喧闹，已渐行渐远。而且，现在许多旅馆和宾馆，为方便住宿客人，都设有餐厅、酒吧、卡拉OK等设施。

不过，我认为应该停止这些做法。这是因为这种消费模式有损温泉小镇的享乐，不利于小镇的繁荣，也不合外国游客的各种需求。姑且不论早餐、晚餐的提供不应该在组套旅游里打包，而是要让住宿客人再次走出去，一边漫步闲逛，一边体验温泉小镇的风情，享受美食料理和购物的乐趣。

这方面的范本就是大分县的由布院温泉和熊本的黑川温泉。由布院温泉的站前“由布见通”，以及面向金鳞湖的“汤之坪街道”上，有餐馆、咖啡店、土特产店、杂货店等，一家接一家。这里，前来泡温泉的浴客络绎不绝，路上还跑着揽客马车和人力车。而黑川温泉的做法是，只要购买了“入汤券”，也能在其他旅馆的温泉泡澡。其目的还是要让浴客在街上多走走，带动消费。通过这些做法，整个城镇就会呈现繁荣景象。轻井泽之所以人气不衰，也是因为导入了徒步观光或自行车观光等做法，让游客乐在其中。

如前所述，至今北陆地区的主要温泉小镇上，无论是旅馆还是宾馆，都采用提供各种设施，留住住宿客人的做法，因此大街上几乎没有商店。对此，我的一个提案是：招揽金泽或东京等著名餐馆来开店。旅馆或宾馆也可以在外订餐。比如，轻井泽万平宾馆里的京都料理“丹熊北店”，就是从春季营业到秋季。我认为，导入这种类似新概念，对创生“小镇的热闹兴旺”，提升作为观光地的魅力，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总之，藉由北陆新干线的开通，不仅仅是北陆地区，包括信越地区的温泉及滑雪场，沿着景色如画的姬川奔驰的大糸线，甚至是五箇山、白川乡、高山、松本等地，这些观光地也可与东京，名古屋连接成一个立体状的观光地。如果能加以组合规划，就能诞生新的旅游线

路，就会一下子扩大以前未被重视的观光区域。我认为，以此为契机，就能悄然改变日本的景色。

## 安倍经济学的税制，导致富裕阶层出逃

为了更为有效地吸引海外富裕阶层来日本，上述的想方设法恐怕是必要的吧。

最近，“有钱人海外出逃”成了热门话题。日本遗产继承税，赠予税最高税率高达55%，而在海外，有些国家却没有遗产继承税，或即便有税率也很低。因此，为了节税或作为对遗产继承税的一个对策，以富裕阶层为主的有钱人，往海外移居（节税移居）急速增加。电视台“NHK专题节目”及周刊杂志也对此作了深入报道，引发争论。2015年有关离岸避税天堂的信息“巴拿马文件”也有所泄漏，震惊世界。

此外，在欧美国家，一些全球化企业的“避税策略”也被视为问题点。苹果、谷歌、星巴克等企业，在法人税税率较低的爱尔兰或瑞士、荷兰等国家设立子公司，并将巨额利润转账至这些子公司。这种做法，招致了批评。不过，被美国上议院传唤，追究避税责任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则泰然提出反驳：“如果考虑股东利益，税金对策是理所当然的。对此若有不爽，美国应该下调法人税。”抵挡了议会的攻击。

另一方面，与前述遗产继承税一样，日本所得税也从2015年1月开始，最高税率从原本的40%上调至45%。若再加上10%的居民税，所得税的最高税额达到了55%。执政党为了讨好选民，不断强化对富裕阶

层的惩罚性的课税制度，而对这些做法生出厌烦的有钱人出逃海外，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日本政府阶段性地上调复兴特别税（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后设立的税制）、社会保险费，导入地球温暖化对策税，上调电费等公共费用，日元贬值后的物价上涨，这些都导致日本国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苦。虽说要废除汽车获得税（根据新车价格和残值率算出的税制）但反过来要增收轻型汽车税作为代替财源。政府的这些议论也令人瞩目。

或许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这种无节操政策的批评，在“嫩豆腐好吃”的心态下，安倍政权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召开了“集中研讨会”，就调高消费税的优劣或影响，听取专家学者们的看法。其结果自然是“意见百出”，但作为与会者的不同立场或不同看法的听证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明明是为了避免国债暴跌才不得已调高消费税的。但即便如此，连安倍首相也无法自己决定这个势在必行的政策，则令人生出不信。原本，调高消费税是依据自民党、公明党和民主党（现已分化改组为另外两党）三党合意，法律上通过的政策，现在随意翻弄，则是很奇怪的，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

安倍政权完全无法察觉世界潮流的变化。今日日本，国家和地方合起来的借款数，已超GDP的两倍。政府必须尽快拿出大动作匡正现状，而再是怎样上调消费税，也只是杯水车薪。政府应该放弃要小聪明的微调，放弃骗得国民的姑息迁就，从而搜刮金钱的心态，唯一的做法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思考方法和现行制度。

## 亚洲富裕阶层的“最后的住所”

正如第一章所述，如今日本是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国家。采取平等主义，贫富差距小，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属于有钱人较少的国家。放眼世界，有许多等级与程度远超日本的大富豪，他们海外避税太正常不过了，而且几乎不会成为新闻。日本对这些毫不知情，反而生出妒忌批评有钱人，真乃大错特错。

当今世界的竞争，已经是如何让有钱人来到自己的国家，心情舒畅地生活，然后安详离世的竞争。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没有遗产继承税，如瑞士、新加坡、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瑞典、摩纳哥等。有钱人从课有遗产重税的国家，出逃至这些地方，不是很正常吗?

另外，很多日本人不了解有钱人现状。其实，我所认识的好几位经营者，虽然都移居海外，但若要说幸福，其实倒也未必。颇感意外的是，大家都感到寂寞，后悔移居海外。

比如，就拿日本的有钱人都喜欢移居的新加坡来说，住宅空间狭小得如同庭院盆景一般，令人窒息。毕竟新加坡是为了吸引有钱人以人工建造起来的袖珍国家。因此，我认为在那里要幸福地终老一生是困难的。另据报道，美国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为了节税，将个人资产移至英领地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但在这个岛上只待了三天，他就生腻了。另外，在豪宅门前不设警卫就难以安心生活的国家，其实还真不少。

这样来看，我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有钱人来说，是最为宜居的地方。不仅治安良好，食物鲜美，还有温泉、富士山、湖泊、滑雪

场、珊瑚礁、拥有丰富的天然观光资源。房产也比新加坡、中国香港或上海便宜很多。我们应该活用这些资源，吸引亚洲的有钱人移居日本。

为此，正如我曾提案的那样，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税制，废除所有现行的税金，只征收“资产税”和“附加价值税”两种税金。如能如此这般改革税制，或许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的有钱人，就会陆续移居日本吧。在亚洲，拥有超过1000亿日元资产的大富豪不在少数。如果这些大富豪能把日本作为“最后的住所”（这是2014年上演的电视剧剧名），将为不动产等行业带来巨大资金。这是从海外向日本注入纯投资的现金，也即所谓的“纯净水”。而且，如果资产是1000亿日元的大富豪，政府就有10亿日元的税收进账，如果资产是100亿日元的有钱人，政府就有1亿日元的税收进账。再加上他们在日本生活，挥霍现金大量消费，也增加了附加价值税创收。

比起不合理地苛刻对待有钱人，一味地增税或调高公共费用，折磨上班族，再盘剥他们仅有的一点工资，倒不如让有钱人来日本尽兴花钱，聚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纯净水现金”。毫无疑问，这才是高明的政策。既然有闲工夫听取毫无意义的调高消费税意见，就应该以导入资产税为中心，制定出从根本上改革税制的方案，并就相关议题加以讨论。我期待着能有这种决断力的政治家。

## 解决人口问题，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

至此，我论述了带来经济增长的种子，在于废除规制或扩大民间事业。接下来，为了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唯一的解决方策就是如先前

叙说的那样，必须解决人口减少及低欲望社会问题。

这里，首先必须考虑的是移民政策。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2050年日本人口金字塔模型为：男女都是75岁以上80岁不到的比例最多，年龄越低人数越少，呈头大尾小的“摩斯拉幼虫形”。依照这一现状持续发展下去，生育年龄人口将大幅减少，难以维持现在的国力，则是洞若观火，非常明显。反转这一现状的方法就是接受移民。对此，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指出这个问题。

如果要问，最初是出于什么目的要设立人口统计学或人口金字塔模型，答案就是为了能制定国家长期的政策。换言之，人口与教育相并列，都属于国家的“基本政策”，要想改变至少要花20年的时间。

其实，以我从事40年以上企业经营顾问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日本企业从增加外国人员工数到真正成为全球性企业，光是配置公平的人事制度及薪资系统，就需要以5年为单位，边试错边解决各种问题及摩擦，最后要耗上20年的时间，方能有望达标。有鉴于此，一个国家若想解决人口问题，更要尝试更要试错，花费20年以上的时间，也太正常不过了吧。

反过来说，敷衍了事的不想花费20年时间，若要推进移民政策，必定失败。比如，1980年代后半的泡沫时期，由于土木建设及制造业劳力不足，当时以南美日裔人为主，包括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劳工，纷纷来到日本。由于日本政府不承认也不接受单纯的外籍劳工，他们就拿着观光签证或学生签证来日，以非法就劳的形式工作，政府对此也是给予事实上的默认。

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后，景气恶化，日本企业毫不留情地解雇了这批外籍劳工，并把他们赶回国。但是，其中仍有不少外籍劳工非法

居留日本，继续打工。因为日本政府对待外籍劳工装模作样的虚伪做法，使得日本在世界上的声誉有所下降。

如今，新加坡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为了建设高科技城，以破格的待遇，从世界各地募集优秀的研究人员。然而，若是研究人员无法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拿出成果，就得收拾行李回国。我认为，要求员工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出成果，这种不自然的机制与政策，其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远渡美洲大陆，寻求发展机会的人们，正是以永久居住为前提，才愿意“赌上性命”，在这个国家大显身手，并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的。

## 建立适合日本的移民体系

安倍首相一方面表示要扩大接受外籍劳工，以应对一些领域人手不足的困局。如建筑业、老人护理、农业、家政服务等。但在另一方面，安倍首相又指示也“不要让人误解为这就是移民政策，并希望对此加紧讨论”。这也就是说，政府不是引进移民，而是接受有时间限定的劳工。但这样做只是重复泡沫时期相同的失败。

明明是人尽皆知的一个道理，再这样下去总人口将持续减少，国力衰退，但就是什么也不想改变，这就是政府的怠慢与渎职了。就算仅仅采取少子化对策就能抬高出生率，但生育出来的婴孩要达到生育年龄，最低限度也要15年，能在社会上大显身手，至少需要花费30年。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今后日本维持国力的方法，唯有接受移民，现在则是最后的机会。

我认为，日本的移民政策有必要分三个阶段推进。

第一个阶段是，每年从世界各地引进1000名左右充满竞争力的优秀人才，打造能带来附加价值并创生出财富的“国际舞台”。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如今扩展至包括旧金山周边的海湾地区），吸引了印度、以色列、中国台湾、俄罗斯、东欧等的顶尖人才。但在日本，则不必局限于IT人才，比如，可以设置医疗或环境等多种类的产业。不过，这些产业必须集中于一处，让其形成集团化，然后再自成一个“生态系统”。这是因为培育新型产业，背后必须要有很多支持这些优秀人才的企业和专家。

形成集团化的地点也很重要。政府在限定地域大胆放宽规制的“国家战略特区”，规定了包括东京圈（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千叶市以及成田市），关西圈（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等10个区域。其中，为了进一步推进接纳国际企业和人才的步伐，将东京圈定位成“国际商贸创新据点”，将关西圈定位成“医疗等创新据点，支援挑战型人才”。

但是，正如之前论述过的都市再开发方案，国际舞台应设置在东京的中心地区（比如晴海、胜哄等湾岸地区）。要想从海外聚集人才，其据点必须是要让世界感受到魅力的大都市的中心地带，而不是像筑波研究学园都市或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远离市区中心的地方。此外，为了能让居住的外国人家属有温暖之家的感觉，基础的生活设施，如教会或学校等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在园区里还必须要有高水准的知名大学，可与支持硅谷创业的斯坦福大学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匹敌，也能成为培育优秀人才的“苗圃”，并提供与欧美并齐的舒适环境。

## 优先拥有“士”经济的资格者

第二个阶段是医师、护士、护理士、律师、消防士等“士（samurai）”经济的中坚人物。由于今后在这些专业领域的人手严重不足，必须每年从世界各地吸引10万人左右。

就“士经济”而言，专门人才拥有的技术，在世界各地大致相同。因此，无论是在自己国家取得资格并工作过的外国人，还是在日本接受一定时间培训，通过技能考试的外国人，我认为，都应该无歧视地让其上岗工作。

目前，日本依据经济连携协定（EPA），虽然开放了引进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的准护士及准护理士，但在考试时出现了用日语难懂的汉字表示专门用语的做法，提升了难度却毫无意义。

有关方面应停止这种刁难的做法，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外国人，降低国家考试的难度。考试合格者或出国前就获有相关资格者，可先实习，评价良好者就应该能在日本继续工作。

针对外国人从事护理和看护工作，虽然出现了一种敬而远之的声音，但现况并不允许我们玩从容不迫。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到2025年，65岁以上的老人直逼3657万人，到2042年则迎来3878万人的高峰。

总人口在不断减少，然则高龄者却在增加，其结果就是高龄化的比率持续上升。到2035年，高龄人口将上升至33.4%，平均每三人中有一位是高龄者。据预测，即便是在高龄者人口转向减少的2042年之后，高龄化的比率还是居高不下，到2060年达39.9%，平均每2.5人中有一位是高龄者。我认为，仅用稀缺的年轻日本人照看老人这种方

法，应该没有人会相信这个国家能真正地恢复活力。怎么想怎么看，也只有依靠外国人从事看护或护理工作。

如前所述，今后日本，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将以40万至60万人的速度减少。除非有魔力能戏剧性地提升劳动生产力，否则每年不投入40万以上新劳力，日本就不能维持现在的GDP。

## 向普通劳动者发放日本版绿卡

第三阶段是普通劳动者。一旦人口减少，建筑业或渔业等工作环境相对恶劣的现场，就难以确保劳动力。我认为，如若每年不招进30万人规模的外籍劳力，今后这些企业恐怕都无法维持。话虽如此说，因人手不足就持续引进劳力，但这些外籍劳力在无法理解语言、习惯、文化等情况下，就在日本工作与生活，会有产生摩擦或纠纷的悬念。

为此，如有外籍劳力想在日本工作，而且在自己国家已经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可由政府负担费用，让他们在日本的学校学习日本的法律、语言、社会习惯等基础知识。两年之后看其毕业考试的结果，若判定没有问题能在日本生活，就发放“日本版绿卡（即使没有国籍也能永久居住的权利以及资格证书）”，并让他们进出劳动市场。这是其他国家还没有先例的体制，也是防止外籍劳工居住地变成贫民窟的有效手段。如若日本能实施成功，应该会获得世界各国高度评价吧。

内阁府给出了接受移民数为“每年20万人”的推算。这个推算公布后，特别是较为保守的年轻群体表示了担心：“若接受移民，国家的统一性就会消失”，“中国人增加后，社会就变得不安定”。政府及执政党

内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对开放移民表示了慎重的看法。认为会导致“治安变差”、“租金水准下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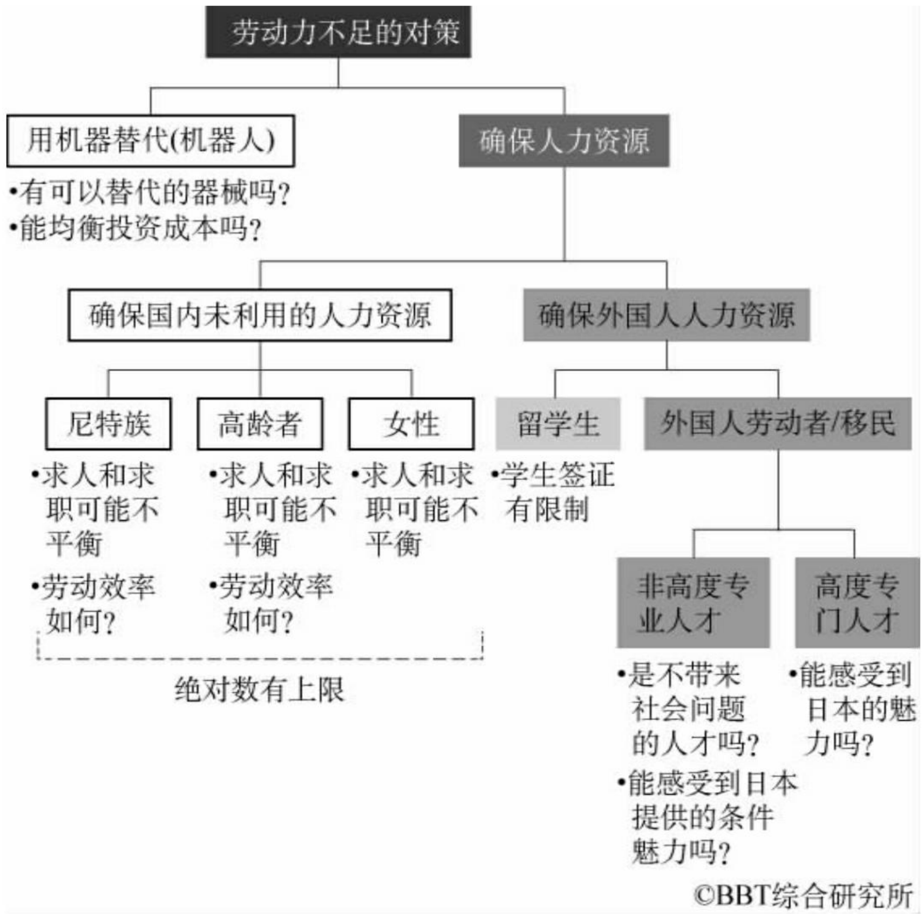
这些年轻人用他们的认真，思考自己的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年，在日本1960年代到1970年代开展安保斗争(3)的学生们（现在他们都摇头说当年是“血气方刚”），当时也是认真忧虑国家未来的纯真年轻人。

以这种爱国心和忧国心为基础，从长期的观点来观察日本的未来，我认为，为了这个国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不得不接受移民这个能够预测的现实。

无论是“爱国者应该反对接受移民”，还是“推进移民政策是反日的”，这种脚下滑来滑去的说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不要再被“右翼”或“左翼”的标签所迷惑，认真思考挑起这个国家未来人才的量与质问题的时刻已经到来（参阅图表25）。

图表25　如果无法确保劳动力，只有接受移民

◆ 日本整体劳动力不足的因应对策




## 另一颗炸弹——“护理离职”增加

为了护理双亲不得不辞退工作的“护理离职”在增加，状况令人担忧。这也是应该正式探讨移民的一个理由。

根据总务省“就业构造基本调查”来看，2002年10月—2012年9月的10年间，“为了护理或看护”而离职的人数达到了105万4600人。另根据厚生劳动省的一个调查，65岁以上的老人当中，约15%的人患有痴呆，在2012年超过了462万人。另据推算，有患痴呆可能的轻度痴呆（MCI）高龄患者约400万人。也就是说，65岁以上（约3079万人）每

4人中就有1人为痴呆者或是痴呆“预备军”，预计今后无可奈何的护理离职人数将会急速增加。

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妻子为了护理或照看公婆或自己的父母而离职，或从正式职工改为合同工、钟点工。为此收入减少，生活陷入穷困，身心疲惫，导致面临家庭破碎的危机，这样的事例还真不在少数。不过，除了日本，没有见到过其他国家有类似这么严重的问题。

比如，在美国，如果双亲进入了需要护理的阶段，应该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养老设施吧。几乎没有是在家中护理的。而即便是在家中护理，也不可能离职，而是继续工作，用工资的一半，雇用拉美裔的护理人员。丹麦和瑞典等北欧诸国，则备有完善的针对卧床老人或痴呆老人的公共养老设施。其他像中国大家庭人口较多的国家，则是由家庭中的哪一位出面照看老人。这样来看，所谓护理离职现象，则是日本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

另外，德国、瑞士、瑞典等这些养老金较多的国家，老人们用养老金的一半，去国外的护理设施养老，这样的事例也在增多。如泰国的清迈，有“住宿供三餐，24小时三班轮换照看”的全天候护理设施。在这样的地方，安稳地度过余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吧。总之，欧美人对“换一个国家”是不抵抗的。

但是在日本，如果利用海外养老设施，儿女就会被指责说“想逃避对父母的护理吗？”实际上，依据索尼生命保险在2013年10月实施的一项“关于双亲护理和痴呆的意识调查”，就双亲需要护理之际希望接受护理的场所，回答“已经住习惯的家里”的父母占67.2%，子女占53.2%；回答“能安心的养老设施”的父母占32.7%，子女占46.8%。另

外，抱有“可能的话，希望子女护理自己”想法的父母占76.5%，抱有“可能的话，想护理父母”想法的子女也达到了61.2%。

不过，问题在于，一家赚钱的能手，若是离职或改成钟点工，那以往的生活水准就难以维持。既要护理老人又要养育小孩，就越发够呛。视情况，有的家庭还必须接受生活保护[(4)]。由于少子高龄化，老人不得不照看老人的“老老护理”问题也变得严重，需要护理的家庭，负担也越来越重。

虽然民间护理服务呈多样化，但很多企业人手严重不足，工作超负荷，也使得护理人员疲惫不堪。今后该如何面对护理问题？虽然安倍政权也打出“护理离职为零”的口号，并大肆宣传，但这个问题仅靠国内现有的人力是难以解决的，我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体制构造。

## 已无太多的对策选项

如前所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有一种雇用菲律宾人护理人员或家政妇的方法。菲律宾最大的产业就是到海外赚钱，也即“人力资源出口”。浏览菲律宾政府的网站，上面明确记载着国家认定的各种资格，海外可以雇用的职种。如护理士、护士、厨师、保姆、家政妇等。如果日本也能活用这些政策，从菲律宾“进口”护理人员，也是不错的选项。或者在泰国等国家建造公共养老设施，提供包括临终医疗或护理的服务。为什么还犹豫不决呢？我完全不明白。

这样说来，也一定会有人批评我。认为“大前太不近人情”，“应该尽可能地照看家人”等。但从现实看，有很多家庭无法提供全方位的看

护，需要交给专业护理人员护理的也为数不少。比照眼见招致家庭破碎而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冷漠。

或许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让菲律宾人或泰国人干重体力活，是歧视”。但问题是菲律宾自身就将此作为国策，推进人才资源出口；泰国或马来西亚也将看护视为产业，从海外“招揽”高龄者。而且，我们也不是用低工资让其违法打工，而是正规雇佣并支付规定的工资。如果说这样做还被视为歧视，那就是日本人在世界上的不谙常识了。

要说歧视，其实如今的日本乡镇，经常发生不人道的问题。找不到老婆的农家男性，与菲律宾人或中国人等亚洲女性结婚，但又不把她们作为堂堂正正的妻子看待，而是把她们当作免费的家政妇，让她们干从农活、家务到护理老人等所有的活。这样的事例很多。当然，并非所有农家的国际婚姻都是如此恶劣的，但是贩卖人口的案例增多，则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作为国家制度的一个系统工程，在引进担任护理及育儿等外国劳动者的同时，也必须制定确实的相关制度。由于今后的日本人口，每年要减少40万—60万人，为了维持1亿以上人口的规模，作为方策之一，政府终于开始讨论每年从海外引进20万人的移民对策。而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提出过这个问题，无疑是临时抱佛脚，为时过晚。

就日本老人的护理与看护，是学习美国的做法，将养老设施民营化，多花钱来解决问题呢？还是向北欧型看齐，走高税金高福利养老之路？或者干脆仿效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雇用菲律宾人护理人员？这些选项都应该提供给国民。但问题在于，如今已无再作如此这般议论

的余地了。让国家在养老方面陷入困境的元凶，自不用言说，就是玩忽职守的政客和霞关[(5)]的官僚们。

## 错误百出的“农业改革”

我们再谈论一下与增长战略关联的制度改革支柱之一农业。

为了不使大米价格下跌而调整生产量的“减反”[(6)]政策，将于2018年废除。政府原先对于参加减反的农家，每10公亩一律给予15000日元的补助金。但从2014年减半为7500日元，2018年则将完全取消。取而代之的补助金增额对象，则是用作家畜饲料或是做面包的面粉。以培养“自立自强的农家”为目的，农业政策时隔50年首次有了重大转换。政府和农林水产省对此大加宣传。

但是，这样做真的能使日本农业起死回生吗？疑问重重。

废除减反政策当属理所当然。原本迄今为止的农业政策真乃错误百出。减反政策是在1971年开始实施的。其背景是由于日本人减少大米食用量和人口减少，使得稻米消费量下跌。1967年度稻米生产量为1445万吨，达到最高峰。之后慢慢减少，到2015年只有799万吨，下跌了55%。

照理说，需求量减少供给量也就一定减少。但是，对农家来说，比起其他农作物，补助金最多的大米成了最赚钱的品物。因此，如果放任不管，农家还是一个劲地种植稻米。这样一来，供给量就超过需求量，米价就下跌。米价一下跌，农家就困惑。政府藉由推出计划性的减反政策，用以减少大米的供给量，并制定了减反补助金制度。但是，为了维持米价，采用支付农民补助金调整（减反）生产量的做

法，怎么想都是奇怪的。这是因为，假如产量有剩余，停止种植即可；假如价格有下跌，就应该还原给消费者才是。

另外，从1986年开始持续7年的关税贸易一般协定（GATT）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其结果，日本被迫开放市场。为了维持大米778%（1公斤合341日元）的关税，约定每年义务性地进口一定量的无关税大米。此外，每年还要降低关税，最终目标是达成零关税。

为了对应乌拉圭回合的决议，政府以强化竞争力为口实，在近20年时间里，为“农业基础整备事业”耗费了42万亿日元。一方面在减反休耕，另一方面又开拓新的农地。这种政策无人可理解。而且其结果，生产性和竞争力完全没有得到提升。为此，即使乌拉圭回合已经结束20年了，日本依然无法开放市场，大米关税还是原来的778%。倒是为了维持米价而实施的减反政策，却莫名地花费了大笔补助金。我认为，没有比这更为恶劣的政策了。

当时在推进农业整础准备事业的时候，我就提出批评：“明明用1万亿日元就能买下世界上最大的谷物交易粮商，却为何还要花费42万亿日元保护农业呢？”我同时主张通过收买谷物交易粮商，推进日本农业的全球化。其实，丸红综合商社在2013年7月，用27亿美元买下美国谷物交易巨头加维隆（Gavilon），跻身世界排行第二的谷物交易粮商，仅次于美国谷物交易龙头嘉吉（Cargill）。同年9月，中国肉食品加工巨头双汇国际，用47亿美元买下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42万亿日元，足能收购150家加维隆，90家史密斯菲尔德。

点破关键点来看，农林水产省想要固守的并不是“农业”本身，而是自身的“农业特权”。因为农林水产省比谁都清楚的一个现实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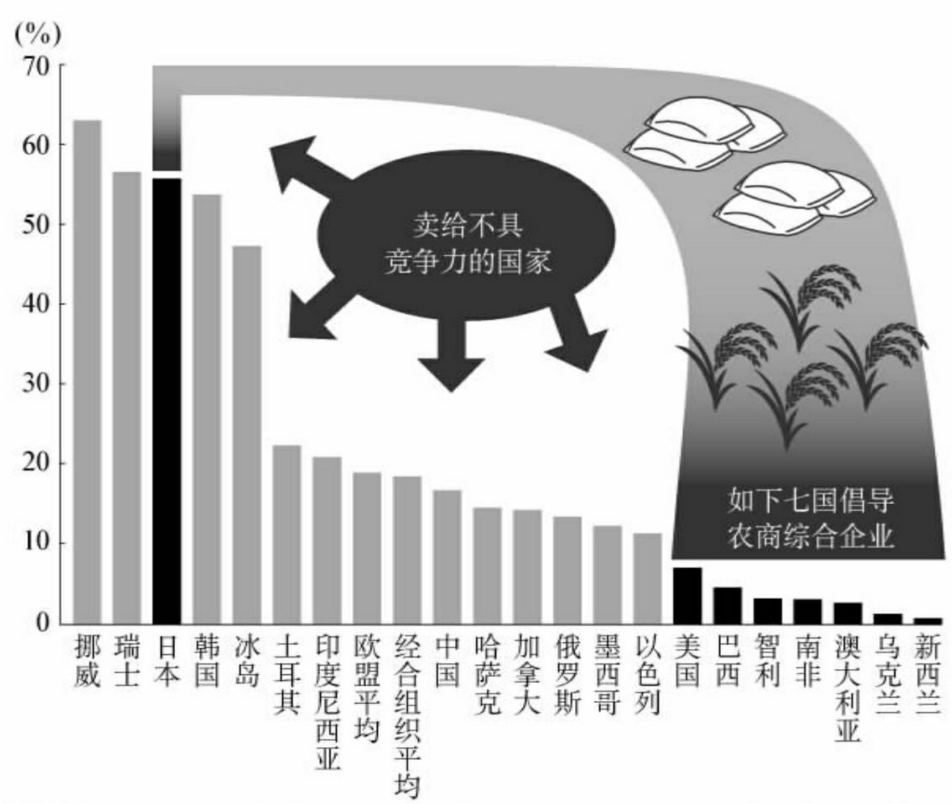
本的农业早已崩盘，无论提供再多的补助金，都无助于竞争力的提升。

## “粮食安全保障”政策是无稽之谈

不论古今东西，没有一家行业是既接受了补助金又能提升竞争力的。农业当然也不例外。世界上的农业强国，都是没有农业补助金的国家。这只要看一下图表26的“主要国家政府支援占农业相关收入比例”，就一目了然。比例低（10%以上）的国家有：新西兰、乌克兰、澳大利亚、南非、智利、巴西、美国。比例高（50%以上）的国家有：挪威、瑞士、日本、韩国。

图表26　如何实现真正的粮食安全保障

◆ 主要国家政府支援占农业相关收入比例




资料来源：OECD，*OECD Agricultural Policy*：*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2013*

©BBT综合研究所

那么，政府精心呵护的农业，如今又怎样了呢？随着农民高龄化的推进，农业就业人口（15岁以上的农民，在调查的一年内专门从事农业者，或务农天数与兼顾他职天数相比为多者）的平均年龄为66.4岁，基础农业从事者（在农业就业人口中，平时以其他工作为主的人）的平均年龄达到了67岁（据2015年的调查）。用企业的话来说，超过退休年龄的人数占了大半。

年轻人不愿意继承农业，农业作为产业缺乏魅力是一个原因。其他国家如果遭遇这样的状况，就会引进农业移民，谋求回春。但日本就是不想洞开移民大门。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农业后继乏人，将会濒临消亡的危机。

无国界经济的一条铁则，就是“在世界最适合的地方生产”。比如，目前的电子产业，其零配件产业都集中在人工费便宜的东亚地区。同样，农业和畜牧业也有最适合的地方。再比如，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就是乌克兰的黑土。论牛肉，若要胜过澳大利亚、美国、阿根廷的国土条件，也是不可能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山地占国土75%的日本，原本就不适合农业。即便如此，仍要开垦狭窄的国土，有效活用只有25%的平原面积，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我认为，这是日本人血汗与泪水的结晶。不过，全球已成无国界开放经济的今天，还在维持昔日保护过度的政策，生产性低下的农业是绝对无法生存下去的。

尽管如此，农林水产省主张“粮食安全保障”，并以此作为保护日本农业的正义名分。这里，当我询问农林水产省或自民党“什么叫粮食安全保障”的时候，他们回答：“关键的时候不至于断粮。”我又问：“关键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他们回答：“日本与世界为敌的时候。”我又问：“这样的话，日本已在和平宪法[7]里宣誓：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日本要与世界为敌，被切断供粮通道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他们无语。

当我进一步询问：“如果日本与世界为敌，一开始就面临断供的，不是石油吗？”他们回答：“石油有180天的储备。”不过，一旦没有石油，耕耘机或拖拉机，收割机就无法起动，既不能制作肥料，也不能耕种稻米。这样说来，稻米若有180天的储备也即可。总之，再是如何保护农业，反正日本只能如此而已。

话说回来，如果日本有朝一日真的被逼入切断供粮通道的状况，那么不只是石油，就连煤炭、铁矿、稀土等资源也无法取得，还有商品出口也变得不可能。从这点来看，就算稻米能自给自足，日本也是完蛋了。这也就是说，所谓“粮食安全保障”这个概念本身，也属无稽之谈。

## 改“农民渔民省”为“粮食省”

日本的农业，在今天更必须以无国界开放经济为前提，从根本上加以重新改革。然则，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食品安全保障？方法只有两个。

一个方法是，选择不太可能同时为敌的若干国家，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分散风险。如美国、澳大利亚、乌克兰、巴西、阿根廷、泰国、越南等。万一日本发生了要与所有国家为敌的状况，那我们就应该赶快从这个危险的祖国逃离出去。

另一个方法是，日本的农民或日本企业，要积极地进入上述的乌克兰或澳大利亚等农业大国，活用高科技力和丰厚的资金，藉由其大规模农业经验，展开农业综合型事业，并将农产品出口至日本等不适合农业的国家。这两个方法，方能完成真正的食品安全保障。

战后以来，农林水产省一直以“农民渔民省”的形象出现。它是一个不仅守护农民及渔民的特权，同时也维护自身利益特权的官僚集团。但是，今后必须成为“粮食省”，在世界各地适合从事农林水产业的地方，投入技术和资本，反过来为日本人的胃提供安全安心、质优价廉的食物。我说“农地是可以进口的”，就是这个意思。

附带而论，针对目前的高龄农民，我认为，采取过度保护政策的政府，应该用每户所得补偿，照顾他们到最后。但这是有条件的。给兼职农家的优厚待遇“仅限一代”。以后，包括遗产继承税在内的目前的农家优遇政策，都应该全部废止。

我认为，即便废止，日本的农业也不至于消亡。能生存下来的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不种植已在世界市场商品化（与其他商品相比没有太大差别）的农作物，而是生产特别品牌作物的农家。二是将农地租借给憧憬家庭菜园的上班族，或已退休的高龄者等，以出租赚钱的农家。

日本的“农业改革”，倘若不作如此的认识并加以根本的实施，就毫无意义可言。这也就是说，这回废除减反政策和重新修正补助金等做法，别说是培育自立自强的农家，任何的转机都不会有。

## “解散农协”并不是大问题

2015年，由于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简称JA全中）的解散及农林水产大臣辞职等，农业政策陷入混乱状态。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将“农政改革”定位增长战略的重点。安倍政权与JA全中协议，决定废除JA全中对单位农协[8]的监察与指导权限。自2019年4月之起，特别民间法人JA全中，不得强制征收每年约80亿日元的赋课金（即单位农协上缴给JA全中的“朝贡钱”），JA全中的地位也从特别民间法人转为一般社团法人。安倍政权是想削弱JA全中的政治影响力，其做法本身是值得赞许的，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这是因为如今的JA全中并没有担任太重要的任务，而且，现在农协交易额只占农业生产额的一半左右，因此即便解散农协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农政面临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对于“今后日本农业应作如何的改革”，拿不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以前依据市镇乡村、地域及不同业种组合起来的单位农协，全国约七百多家，目前都处于涣散状态，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机能。

现在日本农业的现状又是如何的呢？对此前面已有说过，种植大米不仅能获得减反补助金，而且还享有778%的关税保护。再这样下去，毫无竞争力的日本农业将无法生存于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所思考的农政改革，倾向荷兰模式。国土面积几乎与日本的九州相当，人口1700万的小国，却是世界上第二位农业出口国，每年出口额约10万亿日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农业出口额仅约4000亿日元）。荷兰为什么比巴西、阿根廷、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土大国更能出口赚汇？

契机在于无国界的欧洲共同体（EC）的诞生。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86年加盟了欧共体，欧共体成员国就能够以零关税从这两国进口便宜的农产品。竞争力低下的荷兰农民因此陷入窘地。抱有危机感的荷兰，断然实施了多项改革，“选择并集中”于温室园艺事业，放弃一直以来农业就是以农民为主的思考惯性，而是以“产业”来定位，依不同地区汇集农地及生产项目，将发展方向转换为附加价值（竞争力）高的“优质农业”。

现在日本遭遇的状况，与欧共体时代的荷兰很相似。环太平洋经济连携协定（TPP）的谈判交涉，在主要方面已达成合意——安倍政权的农政改革，实际上也是包括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外压”的一个结

果——但奇货可居，我认为，现在才是应该效仿荷兰，一下子转换成“优质农业”的好机会。

## 如何摆脱“偏重大米”?

现在来看，日本的农业可分为两大问题。一个是以大米为重点。在观念上，日本人一直有特殊对待大米的倾向。但从全球来看，大米与小麦或玉米一样，都是以吨为重量单位来买卖，属附加价值最低的“谷物”而已。而且，谷物在产量上胜出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土面积大国，并与优质农业属于对立的两极。

尽管如此，日本还是抱有“耕种稻米食无忧”的观念，也因此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这就与只知道持续生产粗钢，而不知道生产汽车是同样道理。今后，日本必须向更有附加价值的水果、乳制品、叶菜、花卉等农作物上转换才是。

另一个问题是用粮食安全保障的逻辑框住自己，只看重粮食的自给率。之前已经说过，粮食安保的瓶颈不是粮食而是石油。比如，就算大米能自给自足，但万一遇到紧急时刻，石油储备先用完了，既不能灌溉，拖拉机也动不了，也无法制作肥料。对日本来说，粮食安保其实就是能源的安保。况且仅大米储蓄如有一年的量，至少能对付半年的危机。所以，视大米为粮食安保对象，本身就是奇怪的。

毕竟只考虑粮食的自给率，在全球化的今天就会失去竞争力。粮食在世界上最适合的地方耕种即可。只要有出口商品，也就能从海外各国进口粮食。其实，荷兰在身为世界第二农业出口国的同时，谷物自给率也只有14%，是日本的一半。也就是说，荷兰从世界上最具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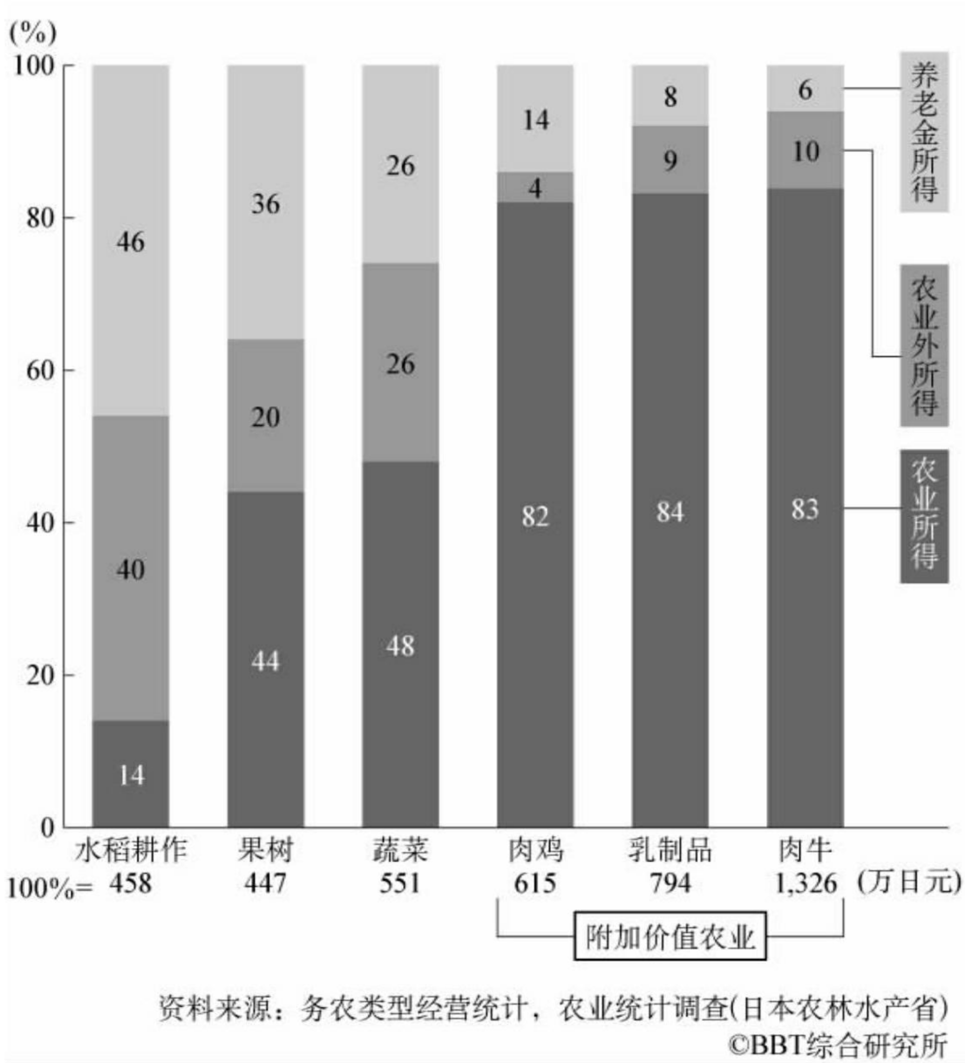
争力的国家进口粮食，解决自己产量不足的问题。只要这些出口国价廉物美，保证安全安心，即可放心进口。只要不与世界为敌，粮食安保就不用担心。

抱有偏重大米和粮食安保论这两个问题不放，日本的农业现状又是如何呢？在农家当中，兼职农家占七成以上，约100万户，水田耕作人数达六成多，约132万人。总之，耕种大米的兼职农家占了大多数。

再看水田耕种农家的收入明细，更加浮现出问题点（参见图表27）。他们平均所得的458万日元当中，农业所得只占14%。其他则是养老金所得（46%）和农业外所得（40%）。农业就业人口为226万人，其中64%，即144万人超过65岁以上。之所以呈现如此模样的所得比率，在于合计了专业农家和兼职农家的数字。由此得知，兼职农家的农业所得比例还要更低。养老金所得远超农业所得的这批人来种植大米，面对这种现状的日本农业，在TPP的惊涛波澜中，是难以生存的吧。

图表27　日本稻农收入的八成以上是农业外所得

◆ 国内农家平均所得的构成比率( %)




不过，在另一方面，工作繁重的肉鸡养殖、乳制品、牛肉养殖的农家所得，占了农业所得的八成以上。而且，就平均所得来看，肉鸡养殖为615万日元，乳制品为794万日元，牛肉养殖为1326万日元，均属高收入。这也就是说，同样是在日本，在稻米以外的领域，已经形成附加价值高的优质农业。日本应该加快朝这方面的转换与发展。

另外，基本上还必须要有专业农家从事农业，兼职农家只能限于一代。而且应该降低大米的关税，让日本的大米与进口米竞争。如果

农业也成“产业”，唯有提高附加价值，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但问题在于，农林水产省也好，农协也好，并没有进行改革。不必说提升附加价值了，甚至还干着保护那些生产性极低的兼职稻米农家，墨守778%关税的蠢事。这除了“献丑”之外什么都不是。而与日本对极的存在，则是前述的荷兰。

## 荷兰农业的惊人之处在哪里?

为什么荷兰能成为农业出口大国？这在于为了强化农业的竞争力，荷兰政府断然实施了三大变革。

第一是“自由化”。随着取消农业保护，荷兰政府同时也解散了农业自然食品安全省（相当于日本的农林水产省），并将其统合在经济省（相当于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下属农业部、酪农部、水产部三个部门。这里的亮点在于将农业归属于经济省。在农业也是产业的观念支配下，这样调整也是理所当然的。对照日本的现状，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设想。

第二是前面稍有提及的“选择并集中”。荷兰政府专注于高附加价值的温室园艺，并集中利用农地。如今，西红柿、彩色甜椒、黄瓜这三个品种，就占了栽培面积的八成，从事农业的实体数也从1980年的15000家，减半至2010年的7100家。

第三是“技术革新”。荷兰政府在活用IT技术，推广智能农业的同时，以瓦赫宁根大学（荷兰农业领域的研究教育中心）为核心，形成了叫做“食品谷”的农业和食品产业集团，推进多样化研究及事业化项目。虽非硅谷，但荷兰的食品谷聚集了食品关联企业约1400家，科学

关联企业约70家，研究人员约10000人。日本的龟甲万、日本水产、三得利等企业也有进驻食品谷。

其结果，荷兰农业在特定产品方面，拥有了显著的优势。纵观主要农作物出口前几位的国家，种植量产型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及大豆等，都是被拥有广大农地，追求经济规模的国家占据了优势。如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相对照的是，在追求附加价值的优质农业方面，荷兰的土豆和花卉类是世界出口第一，西红柿是世界出口第二位，仅次于墨西哥。

而且，荷兰“狡猾”之处在于，他们不仅出口国内生产的农产品，而且还将从海外进口的农产品，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从事“加工贸易”；或是将进口的农产品，原封不动地再出口，从事“转口贸易”；再或是农产品不直接进荷兰，而是从产地直接发送给客户，从事“电子商务”。

比如，以可可粉出名的食品生产商Van Houten，从世界各地约50个国家进口可可豆，加工成可可豆粉或巧克力，然后再出口。牛奶也是从价格低廉的国家进口，加工成比牛奶的附加价值高出14倍的奶酪出口。花卉的种子与花苗等，也是从非洲进口后再加以栽培，出口到德国等欧盟诸国。牛肉或大豆渣、熟食等，则是进口后就直接出口海外。

## “优质农业改革”30年远景

荷兰的温室园艺，在国内仅有六处被称之为“绿港”地区。在那里聚集了栽培公司、拍卖业者、商社、出口业者、园艺供应商、金融机

构、顾问服务公司等，并且推行大规模的发展。植物工厂的面积平均为10公顷，大型工厂的面积则达到了60—100公顷。

而且，这些工厂的设施也是非常先进的，全面采用热电冷三联供系统（利用太阳光热源产生热能来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也能有效活用的能源供给系统），提升了能源效率，多余的电力还可用来销售。在日本，虽然各地也都有叶菜的植物工厂，但规模小，且完全人工光照型栽培的居多。相较于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的热电冷三联供系统的荷兰，在生产性和燃料成本方面有着巨大差距。

荷兰的温室园艺农家，与其说是农业生产者，还不如说是能力很高的农园经营者。也就是说，他们主要的业务就是劳务管理、成本计算、生产管理、缴纳期管理、贩卖管理等，所以坐在办公室电脑面前监察数据的时间，要比在温室园艺里干活的时间长得多。他们用电脑管理气温、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作物生长状况、出货状况和收益指标等。这与平均年龄都已达领取养老金的日本农民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农家形象。

农业国际化和先进化到如此程度的荷兰，不仅是农作物，还有为数不少的农业关联企业拓展全球市场。举例来说，世界级的温室设备制造商Van der Hoever，世界领先的温室环境控制系统开发公司Priva，开发牛奶自动榨乳系统的Lely公司，食品领域的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和喜力公司（Heineken），在肯尼亚或中国栽培花卉类的Levoplant公司，专门对种子品种进行改良、加工、分析的盈可泰（Incotec）公司，从事蔬菜品种开发及蔬菜种子生产、销售的苗圃公司瑞克斯旺（Rijk Zwaan）等。

虽然日本能够模仿各个设备机械、控制系统、IT以及农场经营的窍门等，事实上也已经导入部分设备，但还无法完全做到像荷兰那样产学官一体化，从研究开发到生产销售，建立一气呵成的连贯化的流程。

因此，当下日本才更应该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为良机向荷兰学习。也就是说，将农业自由化的同时，解散农林水产省，并将其纳入经济产业省旗下，设置“农产业部”，“畜产业部”和“水产业部”。并以“选择并集中”为原则，从传统的谷物（特别是大米）生产，转换成日本特有的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比如在海外有人气的日本牛肉、苹果、草莓、桃子、樱桃、柑橘等。

这里重要的是，不是将这些分散在日本全国各地进行，而是集中在特定的区域进行。具体而言，首先在面积几乎与荷兰同等大小的九州作试点。或以九州的某所国立大学为核心，构筑日本版的“食品谷”，并以福冈、佐贺、长崎、大分、宫崎、熊本、鹿儿岛各县有意愿的地方农协为中心，形成“日本版绿港”。

另一方面，新设我在30年前提倡过的“粮食省”（掌管国民胃），并将其打造成这么一种构造：能从世界最强、最便宜的国家进口商品，以及能长期稳定供应安全安心、优质价廉的粮食。对有想在海外扩展市场的农民，政府要在投资及技术面作后盾。从农民到“农场经营者”——这才是日本应该瞄准的农政改革30年的远景目标。

## 作为增长战略的“教育改革”

正如我在第二章里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真正应该实施的最重要的增长战略之一，就是教育改革。

虽然美国有许多制造业外移，但依然是世界上创造就业机会能力最高的国家。其主要理由，就在于美国教育让思维奇特的“突出人才”辈出，也因此能够连续诞生高度专业的新兴产业。比如，苹果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Steve Jobs），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共同创办人以及特斯拉汽车（Tesla）的执行长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推特（Twitter）与Square公司（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代替信用卡支付服务）创办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等。这些新兴产业并不是靠“天才”或“偶然”就能诞生的，它是培育这类人才的教育以及社会的产物。

反观日本的教育，还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时代的原地踏步，培养整齐划一的人才。学校教育只是要求学生一味地记住老师给出的“答案”。而老师的“答案”，则是来自文部科学省的指导要领。这样的教育，就算能提供传统产业的基础劳动力，却也无法培养出“突出人才”，更无法诞生高度专业的新兴产业。

安倍政权如果还强调“增长战略”，就不应该被眼前的股价、财界（过去学校教育下的优等生）和大学教授们的意向所左右，而应该认真研讨教育的根本变革。

## 失去“大志”的内向年轻人

根据产业能率大学的调查，2016年新进公司的员工当中，最终人生目标是想当“总经理”的在9.5%与10%之间，只想当“部长”的比率为

21.1%，想当科长的比率为10.7%，都有增加的趋势。从结果看，他们整体缺失以企业领军人物为目标的气魄。相对于在公司出人头地，他们更注重“长期且安心的工作”。

该大学在2015年还以公司人数超百人的上市公司担任科长职的651名科长为对象，实施了一个调查。从调查看，99.1%的科长一边担任现场的管理职，一边还要处理具体的一线业务。也就是说既是普通职员又是管理员。而在回答最终想寻求的职位时，有14.9%的人想“恢复成普通的职员”。与上回调查相比，高出1.4%，创调查以来的最高纪录。相比较辛苦多劳的中层管理职，还是看得见业绩又相对轻松的普通职员来得更实惠一些。有这种想法的人增加了不少。

而在另一方面，如今日本年轻人当中的尼特族、宅族、单身寄生族，也成了家常便饭到处可见。周刊杂志还以“不工作，不结婚，不出家门的小孩”为社会问题而加以系列报道。日本的年轻世代会如此的“向内向下向后”，我认为，这个现象的背景原因是日本的教育制度。

为了让日本人重拾以往的雄心大志，为了让日本社会和企业再次腾飞，我认为只有彻底变革高中和大学教育。

## 培养能挑战世界的杰出人才

迄今为止，日本在“追赶欧美，超越欧美”的口号下，战前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战后是加工贸易立国。规模和速度成了成功的关键。为了培养与社会化大量生产模式相符合的均质人才，我们实施的是只顾提升平均值的教育。另外，只要在工作中经历过晋升与加薪，

或者积累了相当实务经验，就能成为一名像模像样的上司，因此，也就没有过多的负担。

但是，如今的均质人才在世界上已失去挑战力。在许多企业内，职位升迁越高的人，越是以“新构想”、“海外”、“撤退”等所谓的新“科目”为重点。也就是说，人均GDP已超4万美元，步入发达国家的日本，如果还是和从前一样，为了“追赶与超越”，继续采用适合工业国家的教育模式，那就无法战胜包括中国在内的工资低廉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日本为了日后取胜，在教育上不应再量产均质人才，而必须培养能挑战世界的杰出人才。50名学生的一个班级，哪怕只冒出一到两名也行。为此，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其实，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在音乐和体育的世界里早已司空见惯。如作为结果来看，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上，諏访内晶子、佐藤美枝子、上原彩子、神尾真由子获得过优胜；在网球世界，锦织奎选手是世界排名第四，在跳台滑雪方面，高梨沙罗作为日本选手首度亮相世界杯，并以史上最年轻的16岁4个月，成为个人综合冠军。

总之，普通教育也不能依据文部科学省指导要领，实施全国一律的均质教育，而是要像音乐和体育一样，对将来有希望有潜力的孩子，必须施以“英才教育”。

## 日本的大学过多过滥

根据文部科学省2015年度的“学校基本调查”，目前日本全国共有779所大学，其中国立和公立大学有175所，私立大学有604所。依我而

言，原本国立公立大学只要有10所就够了。现在有这么多大学，真是毫无意义。国际竞争力强劲的瑞士和新加坡，国立公立大学也分别只有12所和4所，而人均GDP都超过日本，还能诞生世界级企业。

此外，来日本的大学留学的众多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了一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留学生（即便是用日语授课的课程）比日本学生要来得优秀。其实，来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已属二流的学生。一流的学生都去美国的一流大学留学了。连二流的中国留学生都比不过，这就是日本大学生可叹的现状。

欧美的大学校园，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比如，芬兰从小学开始就推进英语教学，其结果就是现在的大学授课，大半都是用英语。这一举措吸引了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大批留学生来芬兰留学。简言之，大学变成了全球化社会的一个缩影。虽然想在其中取胜存活难度会很大，但能够提供学生与国内外优秀人才接触的机会，提供在竞争中互相切磋琢磨的环境。这对培养杰出人才是极为重要的。

为此，日本应该减少大学的数量，缩小班级的人数。为了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留学生，应该不断增加英语授课。与此同时，在小学或中学阶段，对于显示出自己兴趣或才能的学生，必须配合其程度，请专业指导老师进行个别辅导。特别是进步快速的学生，让其升到高中或大学，甚至让其学习实业等级方面的知识。总之，必须导入量身定做的教学方法，而那些全国统一的指导要领等，应该直接扔进垃圾箱。

虽然日本的教育想培养不“瘸腿”的通才，但如今已是“单项”决胜负的时代。“全部满分”的秀才没有任何意义，报考国立公立大学，中

心考试[9]要考七个科目，这也是奇怪的。作为最高学府的大学，要让在一个科目上杰出的学生也能入学，并设法无限提升该项能力。

## 如同制作“显像管电视机”的教育

为了让日本企业能在21世纪的经贸新大陆生存下去，自不待言，最为重要的就是确保优秀人才。但是，要说日本的大学教育为此能做出什么贡献的话，其现状则非常令人担忧。

在这样的状况下，安倍政权也正式开始启动了“大学教育改革”。由安倍首相主导的“教育再生实行会议”，建议将目标设在五至六年后，改革现行的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制度，并且以“重视笔试的分数主义转向以人为本，重视面试”，“可以挑战多次”为主要内容的新制度。

但是，这些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改革”，只不过是玩弄小聪明的“变更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将日本的大学教育问题淡化为“入学考试”的问题而已。我认为，即使高度评价该会议建议的安倍首相也好，文部科学省也好，他们都完全没有理解（或故意视而不见）如今日本的大学，教育的本质问题就在于“教育内容”。

1979年，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导入全国统一的一次性考试制度，并从1990年开始更改为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然而，本质的问题并不是入学考试制度，而是大学的教学内容“不符合21世纪的世界”的问题。尽管如此，在该会议的建议中，只字不提对现状的反省。若用制造商作比喻，就像不首先讨论“究竟需要制造怎样的商品为好”的“项目设计”，只议论如何修改制造流程，追求“品种管理”的关键点或改变使用次数等。

换言之，明明这个世界已经成了液晶电视机的时代，工厂却还在拼命地持续生产如今谁也不会买的显像管电视机，好像还在为消弥其产品缺陷而作不懈的努力。如今日本的大学，其问题的本质也在于，明明培养不出适合21世纪的人才以及在世界舞台上具有竞争力的人才，但政府则对此毫不知情，所以才会说出“从分数主义到以人为本”的愚蠢之言。

## “毕业生的工资”决定学校的名次

不对。或许会有这样的反驳，教育再生实行会议的建议，为今后所要实施的教育，融进了培养新型人才的理想。如全球型人才、理工科人才、能兼顾技术和经营的人才、创新的人才等。不过，恕我直言，这是不知经贸最前线的现场状况，只是“桌上空谈教育”的人们作出的摘要罢了。

不妨尝试当着教育再生实行会议或文部科学省官员的面，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什么叫以人为本？”或许会有这样的回答：“和谁都能干得很好，有协调性的人”，或“有日本人的品行，会英语，做事认真之人”。问题在于，如是这样，日本根本出不了像创立苹果的乔布斯或创立亚马逊的贝佐斯那样的“突破型人才”。

这个世界并不缺乏有协调性的人或只是很认真的人，缺乏的是能与乔布斯或贝佐斯匹敌的震撼社会的变革之人。

安倍政权甚至还设有这样的目标：“今后10年里，要让10所以上的日本大学，挤进世界大学排名的前100。”但据我所知，至少在美国，大学的排名是以“毕业生的工资”来决定的。依据投资（学费）带来的

回报（毕业生的工资），基于能回收多少金额这个“投资利润率”的纯粹想法，来决定学校的名次。

这也就是说，毕业生是否具有“赚钱力”，是否具有“价格品牌”，将会决定大学的“级别”。除非提高大学生的市场竞争力，否则排名就上不去。反过来说，只要日本企业不是按照每个人的能力发放初次任职的工资，日本的大学就进不了世界前排。

话说回来，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哪一位大学老师，带着“赚钱力”或“价格品牌”意识，向学生进行灌输的。或许像庆应大学湘南藤泽校区的优秀学生，会有企业即使出双倍工资也是愿意的吧。如是这样，我倒建议让这些企业都成为“破坏者”。但从结果看，是否有企业或个人冒出来，打破全国统一面试这个经济界的“潜规则”呢？这又归结于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由于18岁人口减少，各大学将不再以学科考试的形式来录取学生，而是采用面试或小论文等形式来选拔考生的推荐入学。或招生办自主收集考生的综合成绩来选拔考生的AO（admissions office/入学事务局）入学考试。也因此，如今有半数学生为推荐入学者。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都不会的“低能儿”进了大学。

## 选拔考生的教授，有慧眼吗?

其实，由我担任校长的日本第一所在线大学“商贸突破大学”（Business Breakthrough University，BBT），在通过网络网线，向合作的高中提供远程教学课程。这期间我们也收到来自于东京都内一流大学的请求，希望我们能提供类似的教学课程。一开始我们还感到纳

闷，试着问其理由才明白，原来以推荐入学或AO入试进入大学的学生当中，很多人连高中毕业程度都还未达到。特别是高二数学、高三数学以及前述科目中需要学习的微积分，这些都是学物理的基础。而对大学理工科的学生来说，物理又是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现在则沦为无法上课的状态。因此，实际状况就是用我们的补习教材，让理工科的学生作为高中教材先补上这些课，然后才能正式开始“大学课程”。

另外，按照“从分数主义到以人为本”的说法，不仅是推荐入学或AO入试，若就连一般的入学考试也变得偏重面试成绩的话，显而易见，各行各业都将充斥低学力的大学生。当发达国家重新回归数理学科之际，万事都晚一步的日本，要想从中培养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才”，那是不可能的。

再说那些用“以人为本”来面试挑选考生的教授们，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物”呢？在缺失国际竞争力的大学，他们十年如一日地照本宣科。如果走出世界，他们不就是一批没有“赚钱力”的老夫子吗?

借用前面的比喻来说，如同完全落后于时代的制造商一样，闭眼不看市场畅销的液晶电视机，还在继续生产滞销的显像管电视机。只是将在欧美的大学里学到的研究成果或理论，翻译引进到日本，这些只考虑保住饭碗的大学教授们，他们有发掘与21世纪相符的新型人才的慧眼吗？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 文部科学省缺乏改革的锐气

日本高中教育的现状也很凄惨。

前面提及的高中远程教育用的教材内容，我们与伙伴学校共同投下巨资，将其影像化。这是一套能真正提升学力水准的影像化教材。我们还设想向日本全国提供这套教材，甚至还想提供给派驻海外的日本商务人士的子女使用。

但是，我们的这个设想还是被文部科学省的“土墙”给挡住了。基于学校教育法的学校设置基准，即便是网络远程教育，也被限定在一定的教育区域内，只认可在当地县市招生，不认可县外市外的招生。其理由是基于“抢地盘”的逻辑，这样做会减少县外市外的高中考生。

若是这样，那我们提供给海外的高中生总是没有问题了吧。但他们说也不行。这是因为按照学校设置基准，学生的附近必须要有设置运动场、图书馆和设置保健室的合作校。在认可网络教育或函授教育的同时，又要求学生的身旁必须要有运动场地等设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表明他们完全搞不懂远程教育是为了什么。

另外，文部科学省甚至规定，高中若采行函授教育制度，每年必须实施40天的集中教学。显然，海外居住者的集中教育是困难的。好不容易制作了跨越国境的远程教学用教材，但限于这些规定而不能使用。

采用网络教育的BBT大学，却面对相反的情况。我们有时倒是想多多召集学生，举办研讨会等的集中教育，但文部科学省的官员们又说，这也不行。因为多次召集学生又超出利用网络实施函授教育的范围。甚至他们还提出要求，若想实施对学生的集中教育，那就设置因线上大学而得以免除的校址与校舍。不过，目前的BBT大学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职业教育推进特区”，如果按照学生人数来计算，在千

代田区内需要拥有约2万平方米的大面积校地及校舍才行。真是毫无道理。

总之，文部科学省还是依据1947年制定的落后于时代的学校教育法来捆绑学校。他们只想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点也不思考如何应对世界的变化，如何认真地改革教育体系。

这次大学教育改革，如果按照预定在五至六年后实施，这就成了在1990年导入中心考试以来，时隔30年的最大改革。不过，新提案制度实施后，若再等个30年，日本可真的要完蛋了。“向内、向下、向后”的程度远超现在的日本年轻人，能力低下。特别是在理科方面，尽是无法与世界决胜负的大学生，我们可以预见今后日本的绝望状态。

所谓真正的教育改革，就是要去除已经深入骨髓的病根。其方法就是重建教育体制，或仿制“在无答案的世界里发现答案”的北欧型教育，或采取瑞士、德国型教育，将大学的入学率从现在的五成下降为二至三成，取而代之的是扩充职业训练学校。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只是变革更容易考取大学的入学考试制度，“从分数主义到以人为本”或“可多次考试”，而不触动教育内容的改革，毫无疑问，这是让日本和日本企业“衰弱死”的起爆剂。

## 削减大学数量，增加职业训练学校

如前所述，日本大学的数量过多过滥。所以，我认为应该削减大学数量，替而代之的是多增设培训具体职业的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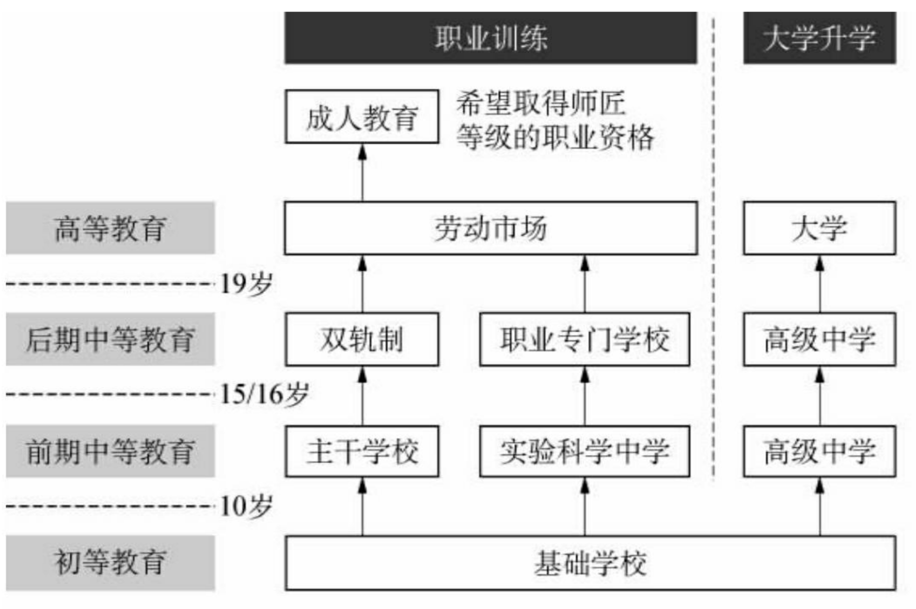
目前在世界上较为强势的是德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的大学录取率都在四成左右，其他学生则是从高中时代直接迈入职业训练专门学

校。比如在德国，许多职业训练专门学校都是“双系统”制。也就是说，每周有两天是在学校学基础理论知识，另外三天是去公司实习。即便大学毕业后，22—23岁就业，基本上要有个五至六年的时间，才能具备实战能力。但如果是毕业于职业训练专门学校，20岁就养成了靠自己本领吃饭的技术力（参见图表28）。

当然，进入公司时，也不全是工业类别，包含事务类在内约有350个职种，自己可以在其中选择一门作为个人专门领域，更好地磨炼自己。假如在350个职种中，选择了A这个职种，该职种又依能力分一二三四等不同等级，随着排名的提升，薪金也同时提升。

图表28　德国分为“职业训练”与“大学升学”

◆ 德国的教育制度




资料来源：《德国双轨制的实际状况(1)——关于技能训练的日德比较》
林悦子(神奈川大学，国际经营论集No.39 2010年)
©BBT综合研究所

最高等级是“师匠”。一旦成就了师匠，不但可以去其他公司教学徒，也可以独立开业。这就是德国公司里的师匠制度。在社会上，职业训练和高等教育具有同等价值。毕业于职业训练专门学校的学生毕生所得，与大学毕业的学生毕生所得并无差异，因此社会非常安定。而且，即使失业也有再雇用制度。为了让失业者能在其他职种上岗，政府提供18个月的免费职业训练。

这是德国前总理库尔特·施罗德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其结果，德国成功地将原先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转向了灵活多样，尽管其薪金属于世界最高水准，但仍具有国际竞争力，失业率也大都保持5%不到。

而美国的情况则是，虽然公立教育制度遭到崩坏，但私立学校作了很好的填补。特别是在美国的中西部，有很多水准很高的人文学院（一般设有基础教养课程，学校规模较小）。美国的精英在这些学院学习哲学或历史，养成广泛的人文修养，然后再进入研究生院，打磨专门知识领域的“赚钱力”。研究生院的排名由学生工作时的起薪来决定，从这意义上说，研究生院又成了专注于赚钱力的“职业训练场所”。

这样来看，无论是哪一个欧美发达国家，也并非公平地对待每个人，而是让有能力的人赚取他们能赚取的钱。然后让他们对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形成能够应对信息化社会、知性社会的21世纪教育体系。与此相比较，从工业化时代至今还未有任何变革的日本教育，是如何落后于世界，是如何成了今日日本现有问题缩影的，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了吧。

“不工作、不结婚、不出门的孩子”是其理所当然的归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树与过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高等教育，应

该尽可能早地把孩子放置于世界的荒波洪流中，感受冲击。

## 没有“雇佣不均衡”问题的德国

就德国的“双系统”制，稍许再做些说明吧。

这是一套在企业实习培训占三分之二时间，在定时制的职业学校学习占三分之一时间，二者并行实施二至三年的二元（双系统）化的职业培训。以一个星期为五个工作日来计算，在固定的课程计划之下，三天用于企业实习，两天用于学校上课。招生对象是完成了义务教育（15岁为止）的年轻人，或是毕业于“文理中学”（7年制或9年制的普通中等学校），并取得大学入学资格的年轻人。前者在18岁之前至少有两年时间，可以得到专业人士的实地指教，磨练技术。

双系统职业教学种类，并非都是汽车机电整合工、商业机械工、电气设备工、涂装工等蓝领工作，也包括信息工程技术人员、旅馆专职人员、商业事务性专职人员等白领工作。大约有350种公认培训职种，由国家、州地方政府、企业、工会等组合而成的公共机构“职业教育培训研究机构”（BIBB），进行具体而细致的运营管理。

在德国，孩子们的将来前途，从小学4年级的阶段，就开始观察其能力及适应性，并加以指导。孩子们从10岁左右开始考虑，自己是进文理中学然后考大学，还是进双系统制或全日制的职业培训学校，习得一技之长。到12岁时，就必须择其之一。

最为受欢迎的是双系统制职业培训学校，与选择文理中学的人数相比，比例是7:3（采用同样教育制度的瑞士是8:2）.虽然从状况上

看，选择哪一条求学之路，其毕生所得并没有太大差异，但实际上相较于大学生，18岁就习得一技之长的人，似乎更能拥有安定的生活。

再来看日本。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资料来看，2012年3月毕业的毕业生，其3年之内的离职率，大学毕业生为32.3%，高中毕业生为40%，初中毕业生则达到了65.3%。但在德国，由于有双系统制的职业培训学校，就业后立即辞职的事例极少。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孩子在10岁时，学校就指导其将来的发展，并让他们学会自己思考。进职校后，又用上二至三年的时间，在企业进修（最后会有六成年轻人在进修公司就业）。这也就是说，年轻人与企业之间的“相亲期”较长，因此不存在像日本那样的“雇佣不均衡”或“黑心企业”等现象。毫无疑问，德国或瑞士正因为拥有这套职业教育系统，中小企业才能确保优秀人才的稳定。

战后日本一味地仿效美国。但是像美国那样活用优秀移民，打造用创造力决胜负的硅谷，日本又是学不来的。这样一来，日本又只能模仿德国或瑞士，重拾古已有之的“匠人养成”制度，并以此来决胜负。

但问题在于，仿效美国，“滥造”大学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进入了每两人中有一人进大学的所谓“大学全录取时代”。以往的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毕业后进入城镇工厂，由此支撑了日本“造物”技术力。但现在的这个结果导致原本的技术力难以维持与传承。由此，日本的匠人技术，不久也将走向消失的命运。

支撑国家的是人。对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才培养。尽管如此，日本还是量产了一大批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连今后靠什么吃饭都不思考，就直接踏入了社会。还有不少人到了三十多岁，还在

摸索自己的人生究竟想做些什么。无法传承“吃饭技能”的日本大学，如果不彻底实施一次打破一切的重大改革，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就会消亡。对此，我抱有深深的危机感。

---

(1)　一种品种最为丰富的便当。

(2)　指在借地契约满期后不再更新契约，将土地归还给所有者的制度。

(3)　指的是围绕日美两国新签署《日美安保条约》而引发的战后日本大规模反战社会运动。

(4)　社会救济。

(5)　日本政府办公地。

(6)　减少耕作面积的政策。

(7)　指现行日本宪法第九条。

(8)　指处于最基层的市町村农协。

(9)　全称为“大学入学中心考试”，是日本各个大学独立行政法人与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联合举行的考试。



# 第四章
# 统治机构改革
# 现在就要改变国家构造

## 不幸言中的今日之闭塞

先于世界各国进入“低欲望社会”的日本，为了应对新的经济社会，必须改变国家的组织构造。

不过，现在被视为日本主要课题的超高龄化、人口减少、经济规模的缩小等问题，都是早已预料到的事情。

我出版《平成维新》（讲谈社），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1989年6月，距今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已经在书中写道：“在里库路特事件[(1)]中逮捕的犯人，是默许该事件的国民自己”，并进一步指出“中央集权国家的终焉”和“世界的地域化”将是今后主要潮流，批判中央官厅是上下都充满特权的国家组织。我对轻浮于泡沫经济的日本社会，发出警告的同时，还预言日本难以应对成熟社会的变化。

即便如此，本书并没有起到盛世危言的作用，白白浪费了时间。如今已印证当时的预言，整个日本“向下沉没”，进入了“人人皆贫”的时代。这样下去，真的没有问题吗?

本书的最终章，还想讨论一下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统治体制的问题。

## 自民党主导的“超肥胖体质”国家的末路

首先应提出讨论的是战后日本自民党政治难以救治的宿疴。

回首历史，2009年民主党政权诞生，完成了历史性的政权交替。1955年保守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自民党以来，连续执政长达半个世纪以上。面对事实上的一党独裁的自民党，这次民主党政权取胜，就是国民对自民党的制裁。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出现了类似“阿拉伯之春”的现象。民主党自摆乌龙，失误连连，呈露出执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对此大为失望的国民，不再将政权重担委任给民主党，自民党又夺回了政权。

为什么日本政权交替难以实施？恕我直言，这是因为自民党“不是政党”，没有一个作为政党应有的大政方针。

这就与美国不同。在美国，共和党是主张小政府，偏向经营者；民主党是主张大政府，偏向劳动者。政策对立鲜明。英国及澳大利亚的保守党和工党，亦属同样的结构。

再以日本的自民党政权来说，虽然自民党政权相对而言是偏重经营者，但实际上干的又是“大政府”的事，实现了连北欧都没有达到的高度福利社会和对弱者或失败者的救济。之所以形成这种矛盾状况，在于自民党原本就是自由党与日本民主党杂凑混合而成，是先天政论薄弱的政党。若以美国政党为例，就是既满怀拥抱接近共和党的派系，也满怀拥抱接近民主党的派系。而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政党角色。

这也就是说，所谓的自民党，就像商业大楼的“PARCO”[(2)]或“109”[(3)]风格一样，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成了“包罗万象的投诉咨询台”或“囊括所有票务的综合百货店”。每位议员就像在自民党的商业大楼里，租借地盘营业的招租者一样，肥水不外流地将利益招引至自己当

地的选区，不分好坏，来者不拒，藉由声音大的少数人，掌握丰厚的财政资源，维持政权的运转。

因此，自民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大政府的手笔：保护世界上最无竞争力的农业，用钢筋水泥加固全日本的海岸和山地，在所有领域大笔砸钱。

实际上，只有“小政府”能与之抗衡。小政府的主旨必须以财政均衡为目标，要求国民发挥自主努力的精神。

问题在于日本人明知道财政均衡的必要性，却又不情愿减少向村镇交付地方税金或补助金。年金问题也是这样。依据人口统计学的推算，这样下去到2035年，国民每3人中有1人，到2060年国民每2.5人中有1人是65岁以上的高龄者。因此，再怎样地思考，国家都难逃破产的命运。这是连小学生用“鸡兔同笼算法”与“时间与速度算”都能明白的问题。尽管如此，国民还是容忍了政府延后养老金发放的年龄，加重下个世代的负担，并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时间往后拖延。

## 为什么允许“预算提前执行？”

更令人吃惊的是，政府为了防止经济景气的滑落，将2014年度预算的三分之二，以及2013年度追加预算的九成，合计超过10万亿日元的金额，做出了在2014年度的4月—9月集中使用的方针。对此，媒体也好国民也好，没有发出任何愤怒之声。

提前执行预算，虽然看似是以港湾或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具购买为主要对象，但实际上这分明是一方面紧盯调高消费税带来的影响，同时为秋季以后制定新的经济对策，编制大型追加预算作准

备。毕竟，剩余的半年不可能仅靠三分之一的预算就能挺过。也就是说，如今的安倍政权成了一个无止境的“乱撒钱的政权”。

所谓预算，就是要均衡使用才有意义。因此一开始就提前执行等是不可理喻的。即便如此，日本的媒体则将其视为好事一般，毫不在意地加以报道。而且国民也早已习惯成癖地向愚蠢的政府不断提出所欲所求。比如，明明有很多不守规矩的人把救护车当出租车来使用，却不能建立收费制度。照理说，叫一次救护车就应该收取1万日元服务费，经医院诊断确实是必须使用救护车的疾病或伤势后，返还已收取的费用，这才是理所当然的做法。

从结局看，自民党这种对国民无理取闹的要求一应再应的服务大战，任何一个在野党都不可能从中取胜。这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呢？国家负债突破1000万亿日元，达到了GDP的两倍以上，陷入巨额负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来得严峻的状况。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完全没有放缓抑制的迹象。

政府如同患了超肥胖症，就算胆固醇或血糖值都创下吉尼斯纪录，医生再三警告这样下去不久会丧命，却依旧不断地大吃大喝。这是明明已经是必须暂停心脏跳动实施大手术的状态，却无视检查的结果。

虽然我长期提议的道州制（不依赖中央政府，打造自立自强的地区），正是我所形容的这场大手术，但站立前头加以推进的大阪维新会代表、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则难以看见前方，呈现出迷航的状态。而曾经想追上桥下市长的跃进步伐探讨道州制的自民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如今则假装完全视而不见。

正步步朝向自我崩溃的自民党，其“超肥胖体质”的身躯，就是映照日本人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们不能只是责备自民党，或许谁也无法阻止沉溺于快乐假象中的日本吧。直到被股票被国债市场“制裁”的那天为止——

## 从“俺们村”选出议员的选举制度

2014年年底的国会大选后，执政党从475个议席中取得了326个议席。媒体开始反复报道“有三分之二的选民，信任安倍政权和安倍经济学”。

但是，这次投票率创下战后最低，小选区仅为52.66%，比例代表仅为52.65%。均比2012年59.32%的投票率，还要低出6.66个百分点。况且，这次投票率还包括白票，填写非候选人姓名及政党名称以外的无效票。换言之，几乎半数选民对这次投票表示了“NO”的意向。只有“三分之二×二分之一”的选民，也就是只有三分之一的选民，对安倍政权投了信任票。

为什么投票率如此低下？这种投票行为真的可以说是充分反映了选民的意向吗？我认为，现在应该重新探讨日本的选举制度。

首先，本质的问题在于“小选举区制”。众议院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行制度，是在1994年由当时的细川护熙首相和引咎辞职的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同意后导入的。然而，河野在2014年因病去世的原社会党党魁土井多贺子的追思会上说：“必须向土井女士道歉，我犯了一个大错”。河野承认，是导入小选举区制招致今日政治劣质化，以及国民

对政治不信任。而当时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土井多贺子，则对小选举区制持有很强的警戒心。只是事已至此才反省，为时已晚。

原本我是大选举区论的主张者，因此从那个时候就反对导入小选举区制。但是，当时以小泽一郎为首的自称“改革派”的政治家们以及电视台名嘴、政治学者们，他们都一致提倡导入小选举区制，媒体对此也加以迎合。为此，像我这类反对导入小选举区制的人，就被称为“守旧派”，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我为什么要反对导入小选举区制呢？因为我认为，导入小选举区制，单一选区（相当于众议院议员一人）的选民平均约有35万人，成为“市长级别”的选举，其结果会出现两个弊端。

一个是议员“长期在位”。若是小选举区制，新的候选人很难战胜现职议员。市长连任四期以上并非稀罕，与此相同，众议院议员选举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实际上，前面提到的国会大选，当选者中的85%都是再次连任者。

另一个弊端是，从市长级别的小选举区选出的议员，怎么说都会以向自己的选区实施利益输送为其政治活动的重点。那种纵论天下大事，站在国家政治的高度，致力于外交、防卫、经济等日本长期课题研究的议员，会变得越来越少。之前采取中选举区制（应选议员3—5人）的时候，专门从事外交、防卫、经济等的政治家，会第三次或第四次的当选，但自实施小选举区制以后，这样的众议院议员几乎没有了。

比如，在东京23区里，分为17个选区。这就意味着东京都区部众议院议员管辖地盘的大小，几乎与一个区的区长相同。或者说，横浜市有8名众议院议员。然而，无论是区长级别的众议院议员，还是选区

范围比横滨市市长来得小的众议院议员，都不可能纵论从日本到全球的事务。

由此，我曾敲响警钟：如果导入小选举区制，就会使得日本政治陷入无可挽回的胶着状态。我并主张，众议院选举倒不如以道州为单元，每个选区平均选出10人，实施全日本100名议员左右的大选举区制，并让这些议员能够纵论从日本到全球的事务。

另一方面，小泽一郎等议员们则对中选举区制持批判态度。认为会"形成派系"以及"形成同党议员为争夺服务大战而将政策讨论弃置不顾"。并主张导入小选举区制，认为"能像英国或美国那样，借由两大政党实现政权轮换，形成健全的议会政治"。

不过，事实上导入小选举区制之后，既没有消除派系，也无助于政策讨论。此外，细川联合政权诞生的1993年，是在中选举区制之下实现了政权轮换。虽然新生党、社会党、公明党、日本新党等8个党派联手，暗算自民党，但在第二年的1994年，自民党、社会党及先驱新党联手组成联合政权，再度实现政权轮换，并由社会党党魁村山富市出任首相。

总之，小选举区论者所主张的事，没有一件被证实的，当然这之后也没有实施政策讨论。

## 无法改变制度的致命矛盾

岂止如此，1996年国会大选开始导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行制以来，还没有等到河野的反省，日本的政治越来越朝着混乱恶化的方向发展。加上小选举区制容易发生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大胜的"摇摆现

象”，让原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及安倍晋三首相这类独裁型领导人，更易加速暴走。

另外，即便是多么无能的议员，即便是如何厚颜无耻的失言，只要在“俺们村”有人气，就能当选。2014年年底国会大选的冲绳选举区，藉由比例代表并行制，原本在小选举区落选的候补者，宛如僵尸般复活，这简直连选举的意义都荡然无存。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行制，是具有上述致命缺陷的系统。更进一步说，比这更大的缺陷，是我们现在陷入了无法改变这种选举制度的矛盾之中。这是因为在小选举区制之下，为巩固其地盘而当选的295名议员们，即不会赞成返回有失议席危险的中选举区制，也不会赞成实施大选举制。

那么，今后该如何改革选举制度为好呢？首先，作为削减议员定额人数的一个方策，应该废除比例代表制。但这会招致几乎只会利用比例代表获取议席的公明党和共产党的猛烈反对，所以，法案的成立是困难的吧。

实际上，有可能改革现实选举制度的是参议院。比方说，从现在的参议院选举区的146人，比例代表96人，改为以道州为单元选出100人左右的议员。我认为，这样就能像美国的上议院，能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致力于国际问题等的国家长期课题，就能发挥与短视近利的众议院不同的作用。至于参议院选举制度的改革，如果在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即使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只要众议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员同意，达到再次通过即可。

如果这种程度的选举制度的改革都难以实施，国民对于政治的不信任感会越来越强烈，毫无疑问也就失去了选举的意义。

## “无用之物”地方议会，有存在的意义吗?

相比于国会议员的改革，目前当务之急则是丑闻频发的地方议员的改革。在挪用公务活动经费的记者会上，嚎啕大哭，最后辞职的兵库县议员；在东京都议会上，对女性议员性骚扰，并发出奚落声而道歉的男性议员；挪用73万日元的公务费给女友，委托其海外视察的爱知县议员；因扒窃而当现行犯逮捕之后，又因使用毒品而遭再逮捕的山口市议员。这些所犯事例程度之恶劣，简直让人难以启齿。为什么这等低素质的地方议员能横行其道呢?

说到底，这是因为所谓地方政府的议会，是个“无用之物”。

日本国宪法第8章第92条到95条，就“地方自治”加以规定。第92条的内容是：“关于地方公共团体组织及运营事项，基于地方自治的宗旨，以法律加以规范。”这也就是说，都道府县及市镇村是“地方公共团体”（得到国家认可，在地方实施行政服务的团体），而非“地方自治体”（拥有自治权能的团体）。

第93条的内容是：“地方公共团体依据法律之规定，设置议会为其议事机关。”而地方自治法也在第6章里就议会加以相关规定。但实际上如今的“地方自治体”，并不拥有三权（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由国会把持，地方不得擅自制定法律。地方能做的只是在国会规定的法律范围内，制定条例。而拥有司法权的法院，虽然各地都有，但都属于国家机关。拥有行政权的是内阁，都道府县及市镇村作为政府的下属机关，只不过是为政府执行“在地方的行政服务”而已。总之，日本的地方并没有“自治”，而没有自治的地方，不需要以立法为要职的地方议会。

反之，拥有上述三权是地方“自治体”的必要条件。比如在德国，16个联邦州都有各自独立的州宪法、州政府、州议会、州法院。各州不仅拥有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自不待言，甚至还拥有课税权，还要选举出外交部长以及财政部长等，俨然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所以，一个州的州长被称之为“大臣总统”（minister president）。联邦政府的总理（现为默克尔女士），负责将16个联邦州决定的事项加以协调统合（是一个统合者的角色）。因此称之为“总理”（chancellor）而不是“首相”（prime minister）。

在美国，各州也拥有高度的自治权，除缔结条约、联盟或铸造货币之外，大部分的事务都能自行决定。因此，各州对离婚、同性婚姻、色情、毒品、性交易等合法与否，都有不同的规定。消费税（营业税率）也有所不同。

加拿大也同样如此。比如，国家明明规定英语和法语为共用语，但太平洋沿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数学校则废除法语，改以英语及日语或中文为共用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些国家相比，日本“还算什么地方自治”，这点恐怕连小学生都明白的吧。虽说国家不同，其地方自治制度也有所不同，但世界上地方自治体最为落后的国家之中，就有日本了。

## 在海外，“无报酬”的议员也属正常

尽管日本地方议员连功能及权限都界定不明，薪资却比想象的高得多。如都道府县的议员或大都市的市议员，包括报酬及公务活动

费，一年可达2000万日元左右的人不在少数。尽管议员工作的性质属于“打零工型”（在议会会期之外，干什么都行，有很多议员还兼有其他工作），但还给予高薪，实在毫无意义。

我们反观海外其他国家的地方议员，无报酬或仅拿低报酬津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比如，在瑞士，地方的权力高于联邦政府，地方的事务全部都由地方来决定。相当于日本的市镇村规模的，瑞士共有2889个，居民代表无报酬地担任议员工作，决定地方行政诸事务。由于这些议员的身份都是农民或工匠、公司职员、商店主等，白天从事普通的工作，在周一至周五的某个晚上，召开议会。在议会上通过的决议，居民必须遵照执行不得有微词。这就是“市镇村的法令”。

在美国，地方议员的一年薪资收入为50万日元左右，与瑞士一样，在晚上召开议会。英国、法国、瑞典等地方议员，原则上也是无报酬。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地方议会，相当于公寓大楼的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角色。地方议员为了地区社会，为了当地居民，以义工的形式参与工作，这是常识。

日本只是在形式上仿效美国地方自治，然而统治机构的实际状态却依旧停留在江户时代的中央集权。既然地方政府没有自治权，被选出的领导者只要能发挥指导力，并基于方针政策，有个能行使行政服务的公共场所就足够了。没有必要由全职议员构成议会。

其实，地方议员在需要制定条例或修正预算时，只要有议员总席位的十二分之一议员的同意，就能提出议案。不过，实际情况则是，议员提出的议案件数与地方自治体的领导提出的议案件数相比，却是

出奇地少。这也就是说，日本所谓的地方议员，大部分并没有认真地工作。即便如此，也坐领从天而降的高薪。议员成了“轻松赚钱业”。

想要成为这种地方议员的人，其水平高低便可察知。地方议员选举被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当作“就业活动”，或被退休后“每天星期日”的老人当作“临终活动”，而这些人成为议员候选人的例子也不少。由于他们的目标是“薪金”、“安定的职业”和“填补有空缺的养老金”，自然而然地就把地方议会当成特权的“巢穴”。在地方官员的指导下，分享优惠与特权，挪用公务活动经费中饱私囊，或以视察为名目，一年两回海外旅游。由于原本就是游手好闲之人与贪图公共工程项目等特权之人凑合在一起，不做好事是肯定的。因此，就算出现一年内当天往返出差高达195次的县议员（包括未经核实的长年持续的实际状态），或是吸毒的市议员，也没有任何不可思议。

这种地方议会，若用人体脏器作比喻，就如同盲肠。不待赘言，属于不需要的功能。

我从以前就开始主张导入道州制，推行德国型或瑞士型的联邦制度。地方如若不实现拥有三权和课税权的地方自治，衰退中的日本就无望复活并展示其活力。不过，如果今后依旧还维系着“这算什么地方自治”的话，我认为至少这些地方议员都应该是全无报酬的义工。

## 由各地提出“旗舰企划”

正如先前所论证的那样，地方并没有得以创生，安倍经济学还在主宰一切，日本经济将会破产，恶性通胀不期而至，国民生活会被卷入大混乱之中。

为了不招致如此恶况的发生，我想提案的是“旗舰企划”。虽然我一直提议导入道州制，但若要实现（这也与大阪市长桥下彻迷航有关），看来还需要时日。这个“旗舰企划”简言之，就是让现在的47个都道府县和20个政令指定都市，由每个地方自治体提出一个对日本未来非常重要的“真正的成长战略”构想，并集中加以实施。就其格局而言，并不是“特区”那种小规模的样式，而是以所有都道府县和政令指定都市为对象，募集该地方独具特色的企划案。

比如，以离岛较多、烦恼于医师不足的长崎县为例，可以允许持有其他国家医师执照的人，在长崎县内医师不足的地方开业（这种做法在美国或英国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就语言及生活等方面，县政府也要建立相应支援机制，以促使外国人医师的定居。

就以近年来以“国际教养大学”为中心，致力于培养国际人才的秋田县来说，只要母语是英语，并同时持有本国语文教师证的人，就可以成为正规的英语教师（他们目前只能担当叫做ALT“Assistant Language Teacher”的外语指导助手）。如果秋田县这样做了，那么秋田县儿童们的英语能力就会飞跃向上，未来能活跃于全球的人才，也定能辈出吧。

另外，若能让北海道成为“航空特区”也是很不错的。从北美飞越太平洋面向亚洲的航线，必然通过北海道上空。为此，如果北海道能自由打造航空路线网，包括新千岁机场在内的北海道其他机场，就能成为北美—亚洲航线的中心。深受亚洲人喜爱的北海道，会成为“东洋的瑞士”，带来观光产业的发展必定是有目共睹的。

而对于养老护理人员不足的县来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这些已被日本认可的国家，如已取得相关资格的人士，就可以让他

们在限定的县市，从事护理工作。而县市的任务则在于建立传授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教育机制。即便是由于难懂的汉字而没有通过日本相关资格考试，但他们依然具备足够的工作能力。这从迄今为止的外国人研修实习当中，足以明白这个事实。

## 让都道府县成为“增长的引擎”

重要的一点在于，必须彻底以都道府县及政令指定都市为主体，让他们亲自思考并提出一项专门提案。由中央政府随意决定这个做法必然会失败。因为这样做并没有反映都道府县及政令指定都市的需求及战略。

各种专项企划试行5年左右时间，其中若有成功案例冒出，可用其成功经验向其他5个都道府县及政令指定都市进行推广，再实施5年后，可波及全国。

这个“旗舰企划”的关键，在于打破全国一律的规则，如“英语教师必须持有日本的教师资格”等。如今，国家捆绑手脚的规则，剥夺了地方的自由，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关于这点，如前所述，拥有16个州的德国，各个州都有独自的州宪法，拥有立法权（议会）、行政权（政府）、司法权（法院）、课税权。并与国家体制一样，设有首相、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与国家并无连带地自由地从事各项活动。现在德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其原因就在于并不像日本只有中央政府单个引擎，而是有“16个引擎”。各州都有各自特色的机制，如“我们致力于汽车产业”，“我们致

力于观光产业”等。就其结果来看，各州的独自发展，也为整个国家带来财富。

如果日本47个都道府县以及20个政令指定都市也都能意识到各自特色，渴望拥有各个不同的“增长引擎”并同时启动，未来的都市风貌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吧。反之，如不这样做，就不能打通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通风口，并且由于经济增长的引擎驱动力不足，世界就无法走进日本，日本也无法走向世界。

## 学习德国地方分权（州）的竞争力

从原本上说，让人痛感德国与日本显著不同的一点，就是国家的“统治机构”。

作为联邦国家的德国，13个州再加上柏林、汉堡、不来梅三个城市州，合计以16个州所组成。可以说德国与美国一样，属于合众国（合州国）。

各州拥有高度的自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权自不必说，也拥有课税权。包括招揽企业在内的产业政策在内，也不受国家限制，各州自行主张。实际上，日本曾经有70位经营者去德国考察了各州。各州的有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柏林（中央政府）是绊脚石。如遇有问题，我们直接与欧盟交涉。”德国的州政府超越国家直接以整个欧洲，甚至以世界市场为对象，直接交易往来。为此，各州都发展成独自的产业和企业，并为拥有高度的竞争力而自豪。

那么，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什么德国能与中央集权的日本有180度的不同，建立了地方分权的统治机构?

根据政府智囊团成员，参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4)]制定的维鲁纳教授所言，这是因为战败后占领军的统治政策不同所造成的。

这也就是说，在德国，为了不让纳粹主义再度兴起，占领军彻底地规避了中央集权，并且制定了各州拥有高度自治的地方分权的宪法。之后，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修订宪法多达58次，但地方分权的基本原则完全未有更改。

再看日本，由于盟军最高司令部（GHQ）不作为的态度，完全没有洞察到什么才是日本最本质的问题，宪法里只有不得再以用武力作为解决纷争的手段这种表面化的叙述。而就统治机构而言，并不存在"地方政府"这个概念。而且，在德国占领军中，有为数不少的逃亡美国的犹太裔德国人，他们用德语很容易地起草了宪法，而日本占领军则是通过日本人口译起草宪法。据认为，那位口译者则是在非常主观的推测下（比如一旦废除天皇制，统治就难以维系等）解说宪法条文。

因此，原先盟军总司令部明明是想定罪并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但从结果看，现行的昭和宪法（日本国宪法）也沿袭了明治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采用天皇总揽统治权的绝对君主制，并在宪法第一章里就让"天皇"登场说事。此外，在宪法第八章的"地方自治"中，还出现了"地方公共团体"等用语，这与地方自治和地方政府，是两个相去甚远的概念。

换言之，宪法制定者并未明察从江户时代开始延续的恶性中央集权是如何发展至集权主义的，而只是在宪法条文里植入表面化的美式民主主义的气息，骨子里仍是维系中央集权体制的昭和宪法。

## 自民党《宪法修正草案》的缺陷

目前，自民党发表了《宪法修正草案》。但是，从其修正草案的内容看，第一章一开始仍然保留“天皇”的文字（拙著《平成维新》展开的论述中，我认为天皇不必写在宪法里，因至今已延续2000年之故，顺其自然维护其地位即可），而在第八章则是将“地方公共团体”改为“地方自治体”等，昭和宪法只不过是字句修改的程度而已。与德国相比，日本社会停滞、经济低迷的原因，明明就在于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但自民党对此就是缺乏基本认识。

不过，日本能迅速赢得战后复兴和高度经济增长的局面，也有中央集权建功奏效的一面。德国虽然是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国家，也取得了不比日本逊色的经济复兴与增长。况且，如今的德国经济还在持续上扬，因此，我认为日本也应该在取得某种程度增长的时点上，将中央集权转换为地方分权。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德国宪法和统治机构优于日本的一个理由，就是企业能轻易地跨越国境。在日本，地方如果没有国家出面协调，则是一事无成。但在德国，各州都有自己的外交部长或产业部长，企业的全球化活动，都会得到州政府的全面支持。

德国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是，16个州在国际化程度、教育程度及招揽产业等所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援助，因此要在特色上与其他州有所差异，就必须用战略思维推动产业政策。不同于地方政府始终处于中央预算抢夺战的日本，德国的州政府则是创造财富与企业全球化的有力推手。

比如，我去德国考察的时候，在巴伐利亚州会见了该州的产业部长，聆听了演示简报，给我的感觉是与日本地方自治体相比，其水准要高出很多。在巴伐利亚州，有从事国防的航天航空空中巴士集团（Airbus Group），汽车领域的宝马（BMW）和奥迪（Audi），保险产业的安联公司（Allianz），制造业的联合大企业西门子集团（Siemens），体育用品的阿迪达斯（Adidas）和彪马（PUMA），还有制造客车、卡车和机械的曼恩集团（MAN）等。闻名世界的超优良企业都蜂拥至此，而且不受国家的限制，自由自在地推进国际商贸。

此外，巴伐利亚州大约有100家德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日本企业也有大约330家公司进入巴伐利亚州。巴伐利亚州与日本的贸易交易额一年约为7000亿日元，对该州而言，日本是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之一。

总之，德国的繁荣，是通过州政府从国家脱开自立并实施对当地企业的后援来达成的。

## 中央部厅才是浪费的象征

进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改变国家等级的结构，目前霞关正在推进中的资讯系统的改革，则握有成败的关键。

自1959年，气象厅为了预测气候数值，导入美国的IBM电脑以来，许多资讯通信设备商或IT巨头等，不断扩充使中央部厅的资讯系统庞大化。如今时隔55年，要进行替换作业了。根据2013年年底的统计，包括计算差旅费、人工费、薪资系统等在内，21个部厅所使用的系统总数竟然有1363个之多。看来部厅确实就是浪费的“象征”，并到

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担任政府资讯通信政策总监（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的是前理光公司副社长远藤纮一。在他的指挥下实行系统的废弃统合改革。预计在2018年度为止，将系统总数削减到六成即871个（这其中约三成252个系统，转移至云端环境的“政府共通平台”），并计划到2021年度，削减年度为1200亿日元（三成）左右的运用成本。怎么看都是国家级的大项目。

不过，我认为这些“系统数削减至六成，运用成本削减三成”等的说法，本身就是废话。因为从IT巨头来看，就算系统总数减少，维护保养业务也在缩减，但还是能以开发新系统的方式照样赚钱。远藤总监最先应该着手的工作，其实并不是对现有的系统加以零散小幅的修正，而是要重建全新的行政系统。极端而言，只需一套系统，便足够了。

我在1993年出版的《新·大前研一报告》中，就倡导“公共数据库”这个概念。这也就是说，每一位国民在出生之日起，就将个人资料全部数据化，然后国家统一加以管理和保护。若能建构这套系统，行政成本就应该能降至百分之一，不，千分之一以下。

不仅如此，2013年度约341万名公务员（其中国家公务员约64万人，地方公务员约277万人）也可大幅削减，政府机关的人工费，也会惊人地减少。

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做法呢？在后面我将细说。

## 必要的是“日本人数据库”

迄今为止的日本，无论是中央部厅还是地方自治体的政府机关，对IT巨头唯命是从，分门别类地建立了各自的资讯系统。霞关的行政中枢，就其建构的系统而言，不只是依部厅分类，而且还依功能分类、部科分类、分支机构分类。而地方自治体也是依都道府县、市区镇村分别建构系统。所以各系统之间并不兼容，无法横向连带提携。

比如，A市为了将迄今为止模拟式的居民登录等数控化，电脑系统的更改，就委托IT巨头的X公司。于是X公司就向A市提交系统更改的提案书。但是，提交的提案书其实与隔壁B市导入的系统几乎一样。尽管如此，A市的系统与B市的系统并不兼容。系统开发费明明是不用再次烧钱的，但业界的恶习却还是有缝必钻地按人口比例收费。

我们必须将这种高价且使用不便的系统全部舍弃，代之以建构全新的系统。具体而言，首先制作系统核心的"国家数据库"，并以数据库为中心，在设置上让所有的个人资讯，都能得到纵向、横向甚至斜向串联的运用，不论中央和地方，所有的行政服务也都能利用。

这种新型的国家数据库，不妨先假设称之为"日本人数据库"（Japanese Database/JDB）。JDB汇集了每个国民从生到死，与国家关联（签订合同文书）的所有资讯。从行政系统的观点来看，人的一生当中，包括从生到死的"时间轴"与"活动轴"，都应该有完整的收录才是。

比如，设定纵轴为时间轴，横轴为活动轴。于是，日本人C从刚出生的时点上，就被JDB系统的纵轴进行了出生登记，电脑在记录"籍贯"的同时，也记录了户籍及现在的居住地。而横轴则是记录这位日本人C的婴幼儿健康诊断、各种预防接种、托儿所或幼儿园，甚至以后

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再之后的就业、结婚、缴纳税金、养老金、保险等相关资讯。

换言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将每个人一生的时间轴和活动轴这两部分所构成的范围（次元），建立起数据库，那应该说一网收尽了所有日本人，并成了所有日本人都能适用的资讯系统。

## 只有一套系统也就足够

相对于各州法律和行政服务都有不同的美国或德国，日本由于采用“垂直绳帘式的行政”，地方分权无法推进，反而成了世界上用最为简单的资讯系统就能提供行政服务的国家。即，各都道府县也好，各市区镇村也好，到处都做相同的事情。换言之，日本国民能感受到的这个国家的服务魅力，不会因为地方不同而有所变化，而是日本全国哪里都一样。

这样来看，让都道府县或市区镇村设置各自的系统，形成巨大的浪费，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如果一开始国家就藉由云端电脑，构筑以JDB为核心的基本系统，再将各种行政服务植入应用程序，那么只要有一套系统，所有的管理都能达成，各都道府县及市区镇村就不用再设置任何的系统。

我虽然不知道远藤总监所定义和设计的系统，是否涵盖了上述的概念，但若没有这种能力，就不应该担任行政中枢的资讯总监吧。

总之，无论怎么说，如今的行政系统缺陷可谓满视野。比如，户籍还没有完全数据化。再比如，为什么户籍主要是记录出生地，这与居民登录的居住地有何区别？谁也不能给予说明。有人将籍贯登录在

富士山或皇宫等地，但这样也能登录本身就很奇怪。问题在于户籍登记根本没有根据。

另外，许多人都很重视登记后的印章，但在办理印章证明的时候，对是否是本人的确认却很马虎，谁都能去办。保险证或护照也都能冒用。显然，排除这些矛盾或缺陷，用划时代的低成本，建构以使用者为本位的全新系统，才是当今所要追求的。

## 选举、政府机关和医院都能“零窗口”

日本各政府机关的资讯系统之间互不兼容，也无法横向连带协调。由于这种系统存有根本的缺陷而导致国民的不便及成本的浪费，真是不胜枚举。

比如选举。在有些市区镇村，依据2002年2月实施的电子投票法（根据公职选举法的特例法律规定，关于地方公共团体议会议员以及首长的选举，采用电磁记录式投票机进行投票），导入“电子投票系统”。这就如同银行的ATM机器一样，画面会显示所有候选人名单，然后选定想要投票的候选人名单，按下“投票”键。这对选民而言，只是原本用铅笔填写候选人姓名的方式，改为触碰显示器而已。这种电子投票具有开票迅速、可以撤销选错候选人或无效票、精简开票人工等优点，但选民还是要到投票所投票，所费功夫与时间和以前一样。

而且，问题在于电子投票的成本，要高于纸式投票的成本。如以三重县四日市为例，2004年11月的市长选举及市议会议员补充选举，就是用电子投票方式进行的。系统租借费及开发费等电子投票所需要的费用高达4950万日元，而成功削减的经费只不过是投票用纸的印刷

费和开票人工费等约600万日元，但还是比纸式投票多出4350万日元的费用。

再加上这些电子投票系统也是以各市镇村为单位，分别委托IT巨头制作的，说来也只能各自为政各自使用，无法使用在都道府县的知事选举及议会选举上。而且就法律规定而言，也不能用于国政选举。用税金打造这样的投票系统，真是岂有此理。

再举看病之例。第一次去医院看病，要在问诊调查表上填写姓名、出生年月、住所、电话号码、过往病史、慢性病、有无过敏等。诊疗结束后，持处方签去医院“门前药局”取药时，还要填写同样内容的表格。有时真搞不懂，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示健康保险证?

日本的行政系统到处显现着惊人的浪费，但如果建构上面提过的“日本人数据库（JDB）”，并以此为中心，由纵向、横向甚至斜向连带地使用个人资讯，无论中央或地方，所有的行政服务也都能利用，就能一次性解决问题。

JDB包括日本人的户籍，现住所（居民证），也包括养老金、健康保险、税金、护照、汽车驾照等各种证件及国家资格等。由于储存了全部的个人信息，个人的一些行政手续，如登录、申请、变更、更新、公证等，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电话、手提电脑，就能简单明了地加以完成。因此，国家也好地方也好，就无需再开设政府机关的窗口，办理这些业务的公务员，也都能全部削减。如果采用声纹、指纹、眼球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来确认本人身份，即可防止“假冒”，信息安全也得以能万全确保。

只要有了这套系统，就选举而言，当国民年满20岁[5]，JDB系统就会自动筛选出有选举权的国民，包括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利用电话、智能手机、电脑、电视等就可投票。国会大选花掉的约750亿日元，东京都知事选举花掉的约49亿日元的成本，就可无限降低直至归零。而医院和药房对患者身份的确认，也应能瞬间完成。

## 沿用世界上效率最低最糟糕的系统

而且，在我看来，JDB系统还可附加民生部门的诸项服务。如支付电费、煤气费、电话费、NHK电视收视费等。假使有人搬家，只要变更JDB系统里储存的现地址，新住所的登录也会自动完成，不需要自己一处处跑这跑那地提交地址变更申请。

我个人认为，慢性病或过敏史等也应存放系统。但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JDB是否妥当，数据库是否有使用权限等，预防这些问题，则不妨配置“第四权力”的政府投诉调查官，让其判断即可。倘若能建构以JDB为核心的综合系统，我们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就有了质的飞跃。

但问题在于，目前在日本一本正经推行的“个人番号制度”，正好与JDB概念截然相反。这项制度是分摊给每一位国民12位数的号码，一元化管理姓名、地址、出生年月、收入、税金、养老金、健康保险等个人信息。2015年秋季开始寄发号码，并于2016年1月开始实施。

其实，正如我在很久之前就费尽口舌说过那样，个人番号制度是以“住基网”（居民基本台账网络）为基准，是属于世界上效率最低最糟糕的行政系统。之所以这样说，则是因为“住基网”也是以市镇村为

单位制作的系统，即便是同样的都道府县内的市镇村，系统也是各管各的。对此，为了连接各个市镇村设置的住基事务用电脑与都道府县的全国住基网系统，就必须在每个市镇村新设服务器。而这套服务器的成本大约需要365亿日元，一年的维持管理成本大约需要130亿日元。问题是花费这些钱，只是为了管理住基网数据库里的姓名、性别、地址、出生年月这四种信息以及管理更改的履历。而且，住基卡在全国只发放了约834万枚（至2014年3月31日止，有效发放枚数约666万枚）。

可以想见，这种粗糙至极的住基网系统当成基础数据库，不可能用上数十年的时间。换言之，以住基网作为基础数据库的设想，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根据有关报道，个人番号系统的导入成本，初期费用为2700亿日元，运用开始后的维持管理成本，每年大约是300亿日元。另外，为了导入系统，大企业的每家公司也必须以5000万日元的开发费，投资IT设备。官与民投资加起来，系统开发的关联费用超过3万亿日元。不过，我认为这些钱就如同扔进了臭水沟。之所以会演变成愚蠢之举，则是因为原本推动方案的议员以及政府机关，几乎无人懂IT技术。再加上这些“高高在上”的业务提供者与IT巨头商谈利益均分所致的结果。尽管如此，国民也根本没有发出愤怒之声。明明是要打造21世纪的系统，但如此“恬不知耻的国家”，就算世界如此之广大，但也只有日本是这样的。

## 值得关注的爱沙尼亚的“e化政府”

有实际例子足可以说明个人番号制度的系统，是怎样落后于时代的。对此，我想在最后介绍。

安倍政权为了阻止地方人口减少及高龄化加剧，打出了向地方注入活力的“地方创生”这一最为重要的政策。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国策”是错误的。理由如书中所述，能看到的结局就是和以前自民党提出的“故乡创生1亿日元”或“地域振兴券”一样，以乱撒钱而告终。安倍首相如果真的想要“创生”地方，就应该导入道州制，从根本上改造现在的中央集权统治机构，让地方自食其力，以打造“品质国家”为目标（关于具体的构想，详见由小学馆出版的拙著《打造品质国家的战略》）。

品质国家的典型，在欧洲是瑞士或北欧诸国，在亚洲是新加坡。这些国家的人口虽然只有数百万人，但却是21世纪“国家”形象的最好典范。

为了研究最新情况，2014年秋季，我以“向研会”研修旅行的名义，考察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向研会是我主导的一个面向经营者的学习会，立志于新时代商业模式的创造。目前共有420家日本企业的经营者参与。这次考察有65人参加，用了大约一周时间访问了四个国家。在这些国家，我们再次感受到尽管国土狭小，但拥有竞争优势的品质国家的强势之力。

波罗的海三国，顾名思义，就是面临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位于欧盟阵营和俄罗斯独联体阵营边界上。从北延伸依次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国土面积及人口如下：

爱沙尼亚：45000平方公里（约为日本的1/9），人口约131万人（相当于岩手县人口）。

拉脱维亚：65000平方公里（约为日本的1/6），人口约219万人（相当于长野县人口）。

立陶宛：65000平方公里（约为日本的1/6），人口约297万人（相当于茨城县人口）。

虽然这三个国家的人种及语言都不相同，但都是在1991年从苏联那里独立出来的国家，并于2004年加入了欧盟及大西洋公约组织。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已采用欧元，立陶宛也于2015年1月1日起导入欧元。要想使用欧元，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收敛基准"。这些基准包括"财政赤字按GDP比，必须在3%以下；债务余额按GDP比，必须在60%以下"，或"在过去的一年内，消费者物价上扬率不得超过欧元区最低三国平均值的1.5%"等。这就表明波罗的海三国都通过了这些严格条件的审核。

另外，在波罗的海三国中，最应大书特书的是爱沙尼亚。这是因为包括我在内，参加研修旅行的其他人也都发出惊叹："真有这样厉害的国家吗？"究竟是哪里厉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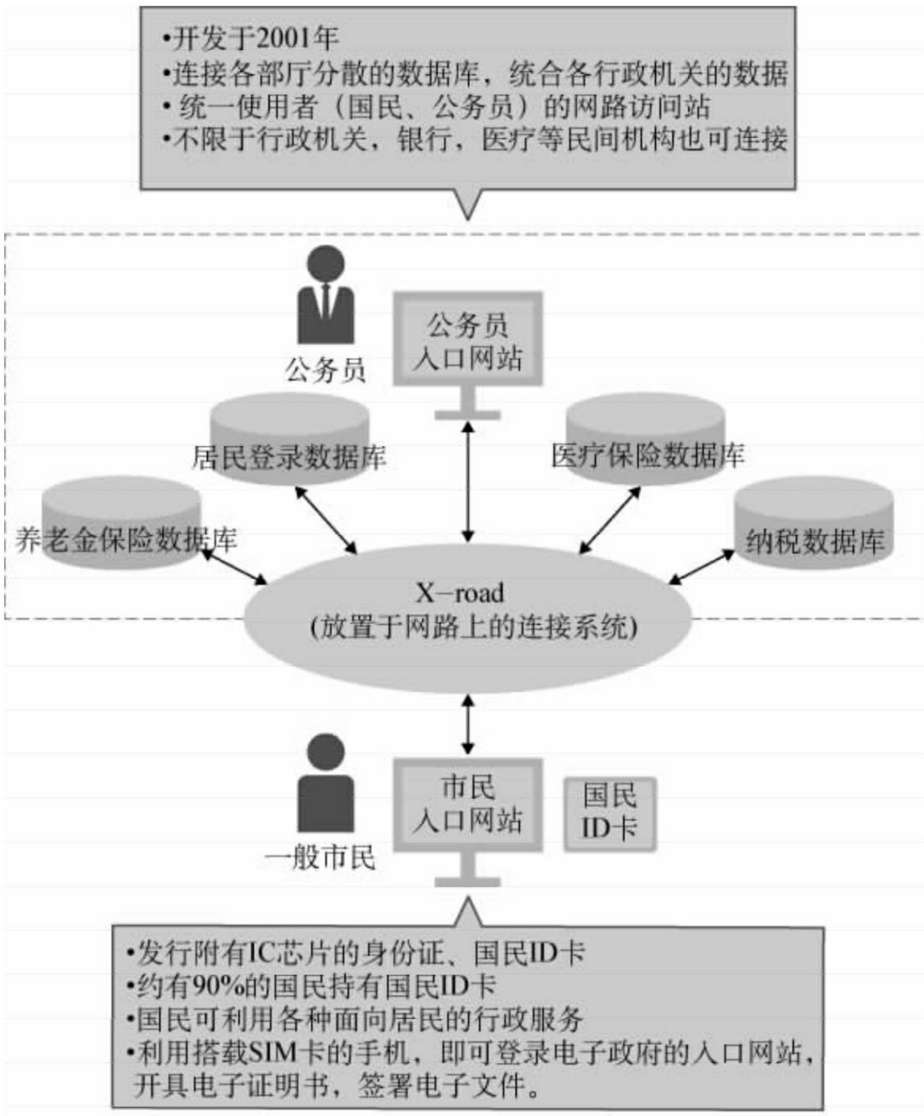
## 国家就连银行账号交易也能掌握

如前所述，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三国中，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由此故，却也是三国中整合得最好，最为稳健的国家。人均GDP约为19000美元，属三国之首。政府的财政收支及债务余额占GDP比，也是表现"最优"。

爱沙尼亚特别有名的是"e化政府（电子政府）"。他们在因特网上建构叫做"X-road"的系统，将各行政机关各自拥有的数据库（DB）连

接在一起。这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民数据库（参见图表29）。国民只要持有含有IC芯片的ID卡——身份证（目前持有率约为90%），就能通过国民数据库接受所有的行政服务。

◆ 爱沙尼亚行政机关的数据库连动体系及使用国民 ID 的电子行政服务框架




资料来源：《国民ID在海外的动向—导入日本的考察—2010年12月(株)国际社会经济研究所》©BBT综合研究所

图表29　爱沙尼亚的“e化政府”果真名不虚传

如今更进一步的是，将储存国民ID芯片的SIM卡，放入智能手机里，就可登录e化政府的门户网站，也可签署电子文书。而且只要有智能手机，无论在世界何处，就能提前一周完成选举投票。

其实，事先我们就得知邻国的拉脱维亚，也在打造e时代政府，因此也就顺访了该国。但前去仔细考察后，发现拉脱维亚和日本的做法一样，各部厅及各地方自治体都拥有自己的独立系统。这就表明，从最初的构想阶段开始，拉脱维亚就与爱沙尼亚有着天壤之别。

爱沙尼亚的国民数据库，是我构想的国民数据库的升级版。就连银行账户的交易，国家都在悉数掌握之中，这是我构想中缺失的部分。也因此，从银行账户可将家庭收支情况自动地加以组合，并能自动地计算税金。这样，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就没有必要再去纳税申报。也因此税务师或会计师也就变得不再需要。据说，这些职业在爱沙尼亚已经消失。政府负责人对此加以说明道："人口只有130万的小国，如果不削减不需要的职业，国家就无法发展。"

## 都纳入电子化的内阁、纳税及健康管理

爱沙尼亚先进的行政服务，其实还有很多。

● 电子内阁（e-Cabinet）：于2000年导入的网络内阁会议，乃是世界上第一个IT系统。政府将内阁的议题上传网络，并就事前达成合意，在网络上决议。而且内阁审议的内容和经过，所有的国民都能在网络上直接看到。也因此，内阁成员及各部厅的工作情况，100%都在国民的监视之下。国家的运营达到了完全的透明化，类似日本那样肥

水不外流的利益政治，或是乱撒税金的做法，在这里是毫无空隙可钻的。

● 电子投票（i-Voting）：前面也稍有提及，政府还开发了选民可通过国民ID卡（身份证），或将储存了ID芯片的SIM卡植入智能手机，就可以投票的系统。2005年，爱沙尼亚政府在世界上首创先例，将这套系统导入地方选举。2007年，再将这套系统导入国会议员选举。在2011年的大选中，占票数的24%为电子投票，其中包括来自世界上105个国家，于截止日前的投票及缺席投票。

● 电子纳税申报（e-Tax）：与前述的电子内阁相同，也是在2000年导入的系统。目前约有95%的国民在利用该系统纳税。在日本极为麻烦的纳税申报，在这里最少只需点击5回就能完成相关手续。以前需要数月才能返还税金，现在则是3—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退税，因此，据说利用者大幅增加。

● 电子警察（e-Police）：在警车内装置系统，如因违反交通规则等被拦下盘问时，警察就可将盘问记录植入独立管理的数据库内。这个数据库同时也能连接国民数据库，可以查询驾驶人的信息。

● 电子健康管理（e-Health）：导入电子病历系统，整合保管患者的以往病历及过去诊断结果等数据。另外，医院还搭配“电子处方签（e-Prescription）”，患者若持有国民ID卡，即可在药房拿药。

● 电子教育（e-Education）：在系统上可分为“电子学校（e-School）”和“电子学习（e-Learning）”两种。电子学校汇集学生成绩、课外作业、上课旷课情况等，编程在数据库上，学校、学生和家长均可上线阅览。电子学习是指教师提供自编教材的系统。

● 电子公司登记（e-Business）：即便成立公司申请登记时没有资本金，于日后提供均可。拥有类似系统的芬兰和葡萄牙的创业者们，可用自己国家的ID在爱沙尼亚申请成立公司。该网站也可查询企业信息或财务决算信息。

● 电子停车场（e-Parking）：这是事先预测停车车位不足，及时且适当地变更停车费，防止过多汽车集中于一处的系统。驾驶员也可用智能手机搜寻有空位的停车场及支付停车费等。

由于爱沙尼亚有如此先进的e化行政服务，听说每周都有从日本来的参观访问者，而“个人番号制度”的相关人员，甚至常驻于此。

## “国家小，反而好”的魅力所在

爱沙尼亚民族构成中，爱沙尼亚人占69%，俄罗斯人占26%，乌克兰人占2%。约有90%的国民都持有植入IC芯片的ID卡，剩余的10%，主要是俄罗斯裔的居民。

据爱沙尼亚政府首席信息技术长官塔维·科特卡（Taavi Kotka）介绍，这些俄罗斯裔居民缺乏爱国心，不愿意学习爱沙尼亚的语言和历史，所以也不给他们发放国籍。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没有护照的无国籍者。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或许觉得这样做很过分，但政府为想学爱沙尼亚语的人提供免费教学，让想成为爱沙尼亚国民的人，随时可以申请入国籍。然而这些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表示，因此国家认为也就没有必要发放国籍。

爱沙尼亚正在考虑将目前的130万人口增扩至1000万人口。其方法就是增加“e-Nation”（e-国民）。这也就是说，即便是移居海外的爱沙

尼亚人，只要办完相关手续，就可领到国民ID卡，同时就能享受所有前面所述的便利的e行政服务。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思考呢？这是为了防备俄罗斯的“再征服”。最近俄罗斯以乌克兰问题为借口，在爱沙尼亚国境一带纠集军队。不过，即使遭到俄罗斯的攻击，只要有国民数据库和国民ID卡，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爱沙尼亚政府及国民也能作为e化政府和e国民而存在。为此，据说爱沙尼亚政府将系统服务器，分散在世界三个地方，加以分别设置。科特卡为此自豪地说：“假设国土被占领，一直到收复国土那天为止，我们通过服务器，照样能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从这一意义上说，爱沙尼亚将永不灭。”

总之，国民数据库是以民族性的身份契约为基础，再搭配智能型国民ID卡，这些都成了爱沙尼亚人“心灵的故乡”。有“血浓于水”一说，而爱沙尼亚人则是“国民ID卡浓于水”。或许，这才能称之为21世纪互联网社会新型的国家形象。

此外，由于爱沙尼亚从苏联时代开始就是软件开发的一个据点，因此，如今进入高等教育学习的大半是理科学生，而且有很多高水准的IT技术者。为此，受到重视的IT产业，甚至被称之为“北欧的硅谷”。比如，免费打电话的应用软件“Skype”开发据点，就是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

就是以这种进取方式，在波罗的海三国中，面积最小的爱沙尼亚，成就了人均GDP最高、财政基盘最稳固的国家。换言之“国家小，反而好”。这对日本而言，就会带来非常多的启发。日本地方自治体与爱沙尼亚人口相当的县有：青森县、岩手县、福冈市、京都市、川崎市、埼玉市等地。“地方创生”并不需要国家主导，纵使类似规模的地

区或都市，只要拿出智慧和气概，就能延伸国家的外延。像日本这样智能手机发达与普及的国家，若能从零开始打造类似爱沙尼亚的国民数据库，恐怕也会在很短时间内，只要一台智能手机，就能接受所有的行政服务。

## 巨大邻国的“利用价值”

若要总结这次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的考察，这些国家的一个共通点就是“芬兰化”。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芬兰为了确保自己国家的安全，与邻国大国苏联，签订了友好协力相互援助条约，采取中立路线。条约基本内容为：不提供自己国家的领土给威胁苏联的国家，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从而换取苏联保障芬兰的政治独立性和自主性。这就是说，打个比方，芬兰好像既是哺乳动物又是如鸟般飞翔的蝙蝠一样，表态不参与东西方冷战的任何一方。

这就给波罗的海三国一个启发。他们也反向思考，在产业政策的潜在课题中，植入所谓的“芬兰化”。虽然非常讨厌俄罗斯，但大部分国民都能说俄语，对俄罗斯的情况也很了解。所以他们对其他欧洲国家或美国以及日本人这样说：“若与俄罗斯有关的事务，请拜托给我们。因为俄罗斯是我们的后花园。”

比如，用IT立国的爱沙尼亚会“活用俄罗斯IT技术人员”，经营波罗的海最大港湾的拉脱维亚则会“结合俄罗斯的物流产业，与日本无缝对接”，他们以此来推销自己。换言之，用务实的态度“利用俄罗斯的价值”。实际上，这就是其他欧盟诸国所不具有的波罗的海三国的强势所在。

而且，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为了能在世界各地生存，都在拼命学习技能，展现勇气。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为生存而奋斗的紧迫感。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应该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

---

(1)　发生于1988年的日本战后四大丑闻之一。房地产企业里库路特公司向政界官员赠送其子公司未上市股票，受赠者卖股总获利约6亿日元。

(2)　经营时装的日本企业。总店在东京都丰岛区南池袋。

(3)　经营百货的日本企业。东京涩谷是其1号店，其大楼也成了涩谷的地标。

(4)　也称“欧洲联盟条约”。

(5)　2016年，日本通过“公职选举法”，将投票年龄从原来的20岁降为18岁。



## 后记

# 改变日本的最后机会

## 独身子女加速了“低欲望”化

我在2007年撰写了《大前流　心理经济学》（讲谈社）一书。在书中我指出：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掌控国民心理与掌控经济视为同义语的国家。当然，国民心理和舆论动向，不问古今中外，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手中明明握有“金钱、土地、人口”这些“带来繁荣的武器”，却由于完全不想加以利用，这个日本固有的心理，使得经济日趋衰退。对此，我在书中敲响了警钟。

当下日本人的家庭收支特征，若用一句话概述就是，尽管个人金融资产约有170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三倍，但就是不投资配息率达3%的股票，而对几无利息的定期存款却情有独钟。当然，从经济学角度看，再怎么想，这种做法都属于非理性行为。这或许是因为泡沫经济时期，在投资股票或房地产方面，有着背负高额债务的惨痛经验所致，因此只要是有关投资方面的，就有惩羹吹齑的习性在身。总之，许多日本人只是热衷于持续存款。

另外，本书论及的日本人低欲望这个倾向，我认为，与其说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还不如说是日本在各方面表现出的社会现象。比如，从统计来看，日本全国空巢率高达13.5%，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而就

算推出超低利率房贷，也不见房贷申请者有所增加。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日本人的想法：“不想有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扩大自己的责任”。为此，即使进了公司，也不想出人头地，将结婚视为重荷，将买房贷款视为一生被套牢——这些想法成了日本年轻人的主流想法。为了演讲或参访，我至今还在世界各地奔走，放眼望去，不曾看到类似日本的国民性。

确实，在1980年代的欧洲，曾经有过类似的光景。葡萄牙、西班牙、北欧诸国及瑞士等国，笼罩在忧郁和颓废的氛围之中，与当时正处泡沫鼎盛期的日本或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让我们窥视到了“斜阳”国家的现实一面。

不过，欧洲国家在成立欧盟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之前彼此竞争、互相仇视的邻国，结成共同经济圈。其结果，欧盟拥有的巨大经济力，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甚至对世界也具有影响力。虽然欧洲各国财政状况并不容乐观，但曾经有过的那种忧郁氛围，现在几乎感觉不到了。

从欧盟的现状来看，当年日本在亚洲具有压倒性领导地位之时，没有乘机打造“伟大亚洲”或“日元经济圈”，但现在想来也是时不再来。由此故，如今的日本问题，也只能由日本自己来解决。

## 为什么不变不行?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日本能够克服目前所抱有的“低欲望社会”这个问题。克服的关键，则在于如本书所说的实现真正的移民社会。

现在，日本劳动人口每年以40万—6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这些减少的人口若用移民作填补，10年间就可以接受400万—600万人的移民。若用这样的规模来增加数百万想法、感觉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人，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景象就会陡然一变。

当然，要转变到移民社会，也并非如此简单。

虽然欧美国家已经接受了众多移民，但各种社会问题也同时爆出。比如法国，就发生过针对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发生在巴黎的其他多起恐怖事件。法国仅伊斯兰教人口就增加到了接近总人口的10%。对此，国家要事先充分考虑这些问题。为了移民，必须提供必要的学习环境和住宅环境，或是设立雇佣及资格制度。总之，这些绝不是用一般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便如此，日本若在移民问题上不做到这等程度，我认为，当下的“低欲望社会”，就不会有所改变。

为什么非改变不可？或许我们能听到这么一种说法：“金屋银屋不如家里的草屋”，即使人人皆贫，但只要能平等生活，不也很好吗?

但问题在于，日本是个岛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岛国更容易形成同质性社会。在这个社会，由于来自于外部的刺激非常少，因此很难培养出走向世界、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国民。而且，如本书所描述的那样，今后“向内、向下、向后”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少子化的持续发展，独生子女的家庭也在增加。由于独生子女们无需竞争，因此在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喜欢的事情自己干，好吃的东西自己吃，一个人独霸游戏机或玩具。可以这样说，“低欲望社会”的缩影，就存在于独生子女的家庭中。战前战后的日本人之所以还有活力，则是因

为兄弟姐妹多，不争抢就吃不上饭。此外，也受长子继承家业的环境影响，长子以外的其他人，必须外出谋生。

另一方面，在同质内向型社会里，宅男宅女们虽然整天封闭在家中，但也感觉良好。然而，人也渐次变得幼稚化，甚至退化。如果人人都这样向下沉沦无作为，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弱体化。而且，突然有一天，原本感觉良好的“摇篮”，一下变成了“墓地”。这就是所谓的“温水煮青蛙现象”。

与同质内向型社会相对应的，是奇人异才不断聚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充满了各种刺激，上进心成了支撑人们勃发向前的动力。直率地说，如果社会能将接纳菲佣（菲律宾人家政妇）变得理所当然，并让她们担任部分的育儿工作，那么即使在日本，双语儿童也会不断增多。毫无疑问，到那时他们就会毫不费力地越过国境，活跃在世界各国。

## 用“18岁成人”制度改造日本人

除了移民，能较大改变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关键就是教育。

在国会上通过并已经实施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规定，选举年龄的下限从20岁下调至18岁。其实，我在20多年前就主张，不仅是选择权，成人年龄也应同时下调[(1)]，包括驾照、喝酒、抽烟、刑法适用上的成人年龄，全都应该集中统一至18岁。

这里重要的是，不要只是单纯地把投票年龄下调至18岁这个表面化的修正，而是要到18岁或高中毕业为止，让他们接受义务教育，国家有责任把18岁之前的国民，培养成在日本应称之为“成人”阶段的人

才。我的提议是，让学生从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学习社会常识，包含动作举止或行为样式、价值观。在21世纪的日本，这些才是培养肩负责任感的大人，为今后生活所必备的知识。而且，在上完这些全部课程的基础上，让仅仅只有在相关考试中的合格者，才能填写“宣誓书”，领取成人卡，认可投票权。这些做法，完全不同于安倍首相主张的道德或修身等的教育改革。我的主张包括培养学生与不同文化、民族和宗教的人共存的智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和地理教育，甚至是具备自主地收集资讯，并从中能加以识别判断的能力，灌输他们作为社会人的责任感。

具体而言，由于目前的义务教育中的初中课程及之后的高中课程，有不少内容是重叠的。由此故，若能实施一贯制教育，将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为止，就能多出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就能更彻底地实施社会人教育的课程。

通过这些教学方式，彻底教育年轻人作为一名社会人的责任所在，不仅要自食其力，而且还要养家糊口，培育下一代。这种社会人的课程教育，仅仅依靠现有的专职教师来完成，是有其难度的。要动员包括医生、消防员、警察、IT工程师、企业经营者，甚至是多子女的母亲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幼，加入该教育的行列，从各自立场出发与学生分享社会人的心得体会。

另外，利用前面说的借由初中高中一贯制后生出的多余时间，让学生去海外短期留学或去做义工，这也是宝贵的教育机会。我估计，或许在被送往海外的学生当中，大多数会在哭泣恋家中度过最初的三个月。如果无法与他人交流沟通，不仅不能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许还得体验总是饿肚子的感觉或懊悔的心情吧。然而，这正是为了能

够长大“成人”的非常重要的体验。亲身体验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人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茁壮成长。

以上为培养“18岁成人”为目标的义务教育。我认为，它导出的一个结果就是，为今后的日本人带来非常大的变革。

## 总之，要“放宽心”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论述了安倍经济学在日本难以有效地发挥功用。这是因为日本的“低欲望社会”，连支配20世纪的凯恩斯经济理论都无法发挥功用。换言之，我的论点在于，对货币供应量或利率变动有反应，只有在“欲望过剩社会”才有可能。为此，无论是保罗·克鲁格曼教授，还是曾在美国等国学习过经济学的安倍政权的经济顾问，都无法理解日本的特殊国情。虽然必须改写经济学原理，但几乎看不到在这个领域里令人信服的研究。为此。我出版了《心理经济学》一书，试图从人的心理上解读经济学。但恕我孤陋寡闻，推进这个领域的研究、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导国民的学者，有吗?

不过，只要观察个人生活和微观经济这一面，就不难明白，今日的日本人至少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为此，经济政策的推进，必须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天线”（指敏感度）。原本，被组合了以往经济政策的“三支箭”，即便以总动员的形式加以实施，国民却也几无反应时，政府就应该考虑这一奇怪现象的根本原因了。

结果，问题出在学者或政治家使用的经济对策（道具），都是过去百年来欧美经济学家们提出过的。而在低欲望社会，新的经济对策如果不针对日本人的心理加以诉求，就难以行得通。消除面对未来的

不安，追求更享受的人生。倘若能对国民不断反复地传递这一信息，总有一天，已经冻结的心理也能得到润和。以日本而言，如果17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即使从中拿出1%投向市场，经济景气就可以冠以一个“超”字。

不同于从其他国家借款的希腊等国，日本的解决方策就藏于国民沉睡的怀中。政府没有必要祭出这个那个政策，盗取我们的财产。只要让我们大家得以安心，取消捆绑手脚的多余规定和税制，个人的金融资产自然地就会流入市场。“放宽心”——对日本来说这才是最为良好的政策。

本书的最后，想讨论一下“人”的问题。

对20世纪的企业来说，成功的关键就是“人、物、钱”。如今的社会，到处充满了物与钱，即便是专利等项目，只要有钱就能取得使用权。身处21世纪，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是“人、人、人”。而且，拥有多少“顶尖人才”，则变得至关重要。

读《坂上之云》可以感到，与胸怀大志、远渡重洋的明治时代及战后第一世代相比，如今在低欲望社会培育出来的人才，缺乏竞争心。而且目前有超半数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个背景的改善也非一蹴而就。

不过，日本自古就有“疼爱孩子，就让他外出锻炼”的格言。这就要求放弃把孩子的教育完全交给学校、老师或私塾的做法，而能够对孩子进行胸怀全球的“憧憬教育”的，只有父母。

阅读本书至此的读者，如果是身为父母或祖父母，我想恳请你们务必量体裁衣，尝试着培养拥有“憧憬精神”的下一代。如果是身为学生，我想转告你：“你就是有志之人。没有问题，唯你能成功。”

(1)　日本政府在2018年3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民法》及相关法律修正案，将成人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并于2022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